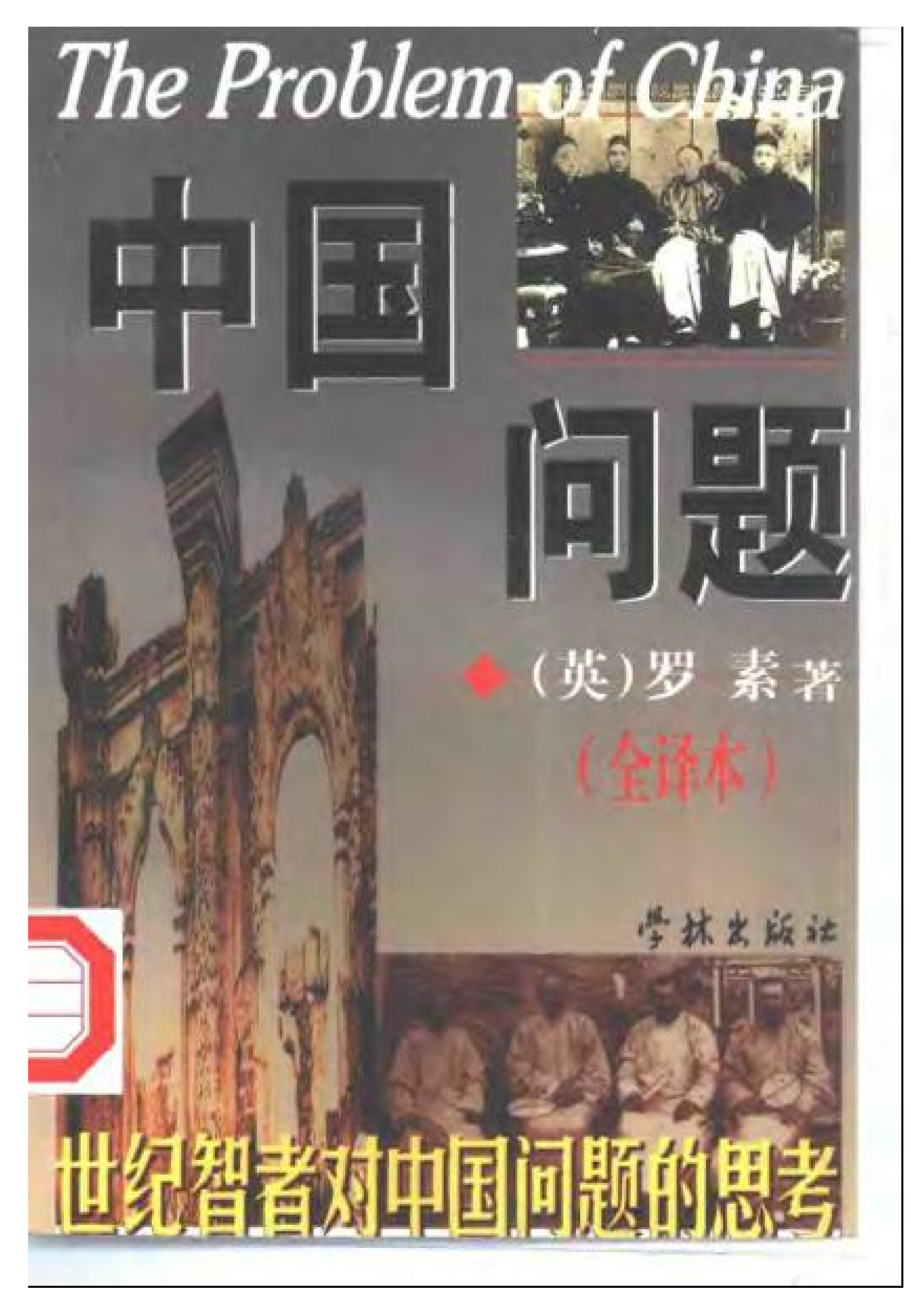

The Problem of China
中国问题
（英）罗 素著
（全译本）
学林出版社
世纪智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中国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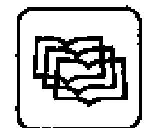
〔英〕罗素 著

秦悦 译

学林出版社



中国问题



作　　者——[英]罗　素
译　　者——秦　悦
责任编辑——曹维劲　李晓梅
封面设计——早早工作室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120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75
字　　数——130千
插　　页——2
版　　次——1996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3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16-263-1/G·48
定　　价——12.80元



上：孙中山与宋庆龄、廖仲恺等在日本合影，庆贺中国帝制取消。
中：1917年夏，孙中山在广州被选为陆海军大元帅。
下：中华全国学联总会成立。



京城古董摊。

富人烧香，穷人算命，急事问神仙。

赌徒各态。

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上演了一场闹剧。



剃光头，北方俗称「刮葫芦瓢」。

颇见功力的拉大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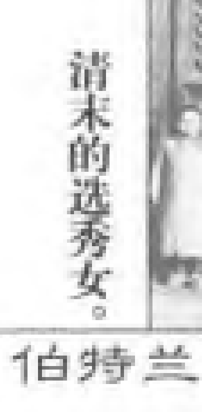
夏日的清凉饮料摊。

住无居所的灾民。

北京名妓小凤仙。



吸食鸦片和狎妓是旧时公子哥儿的消遣去处。





清末的选秀女。



作者像

出版前言

伯兰特·罗素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著述丰富，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社会、教育、历史、宗教、政治等广泛领域，尤以数学和逻辑研究上建树突出，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成果宏大，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一位对人类进步事业十分关切和拥护的人文学者，罗素不仅深切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且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特殊的真诚而友好的情感。《中国问题》就是罗素在这种背景和情感的驱使下，经过到中国的实地考察，于1922年撰写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专著。

《中国问题》是罗素的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它集中了这位"世纪智者"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思考，系统地反映了一个西方进步学者的中国观。尽管，时过境迁，书中所谈到的当时的中国时事早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但作者

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及中国人的性格等问题的许多分析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令人觉得历久弥新。

罗素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感与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的，他看到了当年这个闭关锁国的文明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困境，但又指出：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重温这具有超前性的深刻见解，对正经历现代化进程、致力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来讲不啻是金玉良言。唯其如此，尽管由于地域、时代及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罗素对中国种种问题的论述仍不免有偏颇之处，但它毫不影响我们今天出版此书的现实意义。

学林出版社

1996年12月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

前　　言

此次重印未作任何改动，尽管本书写于1922年，其间43年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还保持原封不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时事问题的，若想使书中所言符合现今的情况，就必须完全修改。因此，看来更好的办法是：不作任何修饰，尽力保持历史的真实。不过，这段记录所真实反映的诸多希望与忧虑都已不复存在了。我觉得，书中不是谈时事的部分，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的中国人与西方各民族之间性格的鲜明对比。然而，如今的中国已经与那时的中国大相径庭。那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野心勃勃的日本，但日本的勃勃野心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灰飞烟灭了。现在，别的原子弹威胁着中国，中国人必须寻求别的保护办法。中国人曾经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伯特兰·罗素

1965年11月9日于普拉斯彭林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的种种问题

最近到中国的欧洲人，如果善于接纳和思考，就会发现许多无从解答的疑惑，这是因为西欧的情况没有给他心理上的准备。虽说俄国也有一些与中国类似之处，但不同点还是很多，并且中国的问题更为复杂。中国的人口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所发生的问题即使对中国以外的任何人没有影响，本身也具有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中国问题应该有明智的了解，这一点对欧美、对亚洲都同样重要，尽管目前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显而易见，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能单独加以讨论。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只要

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然而，不幸的是，当政者往往视金钱与权力为自身与国家的根本，而置文化问题于不顾。艺术家在当今商业社会里走投无路，这已成了小说家和道德说教者的老生常谈。画家穷困而死，收藏家则收购他们的遗作，却自夸为慈善之举。中国也许可以视为一个艺术家的国度，她具有艺术家所具有的所有善恶之德：其善主要有利他人，而其恶却足以危害自己。中国人的这些美德能留传下去吗？抑或，中国为了生存下来，反而不得不去选择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德。如果中国真的照搬她正在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外国的模式，这个世界又将会变得怎样呢？

中国的古老文明如今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试图寻求某种平衡是徒劳的；因为从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文化与17世纪的传教士所看到的天朝帝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任何一个谨慎的人都不敢妄加断言，但在不同的方面各有短长却是肯定的。若要使西方各国与中国的交流产生良好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自命为高等文化的使者；更不应该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而自以为有剥削、压迫和欺骗他们的权利。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而且大多数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也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在比较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时候，人们提出的问题会比国家大事更为根本。人们会问：我最珍重的是什么？为什么说一种社会制度较另一种社会制度更为可

取？当前世界上最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会作出不同的回答，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论证可以说服那些答案与我不同的人。因此我也只能谈谈自己的一家之言，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在我看来，知识、艺术、人生乐趣、友谊或温情，不仅是实现某些目标的途径，而且本身就是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我所谓的知识并非指所有的知识，有的知识仅仅是罗列一些枯燥无味的东西，虽然不能说没用，却没有太大的价值。尽管通过科学所得到的自然界的知识至今尚不完善，但由此却能了解世界的真理，这才是求学者最为珍视的。其他如传记、历史等也有相同的价值。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展开，否则，将会使我离题太远。我所谓的艺术，并非专指造诣很高、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们的佳作，尽管自然，这些佳作的地位最高。我同时也指人们在俄国的农夫、中国的苦力身上发现的那种下意识的美感，这种美的冲动创造了在清教徒时代之前就流传在我们中间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至今仍传唱在木屋和花园之中。至于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这也是我要赞美中国文化的一大原因。

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而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

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像这样道德上的泛泛而谈，与中国的实际问题并非毫无关系。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某种无意识的信仰而产生了今日的工业和商业文明，反过来又由于工业文明而更坚定了这种信仰。这种信仰决定了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但在中国，人们只有在看见自己正受到一个不知不觉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上的社会的挑战时，才会领悟到这些信仰。例如，进步和效率，中国人除了受过西方教育的以外都不以为然。正因为重视进步和效率，我们变得富强了，而中国人正是由于忽视进步和效率，从总体上来看，直到我们骚扰他们之前，还保持着国泰民安。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价值标准的话，将很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就；而且这种价值标准还必须或多或少是自觉的，否则我们将低估外域文化的价值，因为我们对他人的短处往往印象深刻，而对自己的缺点却会习以为常。

中国的文化正发生着飞速的变化，这种飞速的变化无疑是必需的。追根溯源，现在主要的变化还在于赶超西方的军事技术，但不久西方经济的优势也将会受到重视。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看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样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现在中

国。未来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而这两种危险则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产生的。

中国需要应付的有两个大相径庭的外国势力：一是白种人，一是日本。日本受西方影响很大，应视为西方在远东的弟子，所以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它的白人老师也应负有责任。然而，日本又在很多方面与欧美国家不同，并且对于中国，日本也有其自己的打算。中国的前途，有如下三种可能：(一)中国可能会被一个或几个西方国家所奴役；(二)中国会为日本所奴役；(三)中国恢复和重新夺回自由。目前还有第四种可能，那就是白人强权与日本共管中国。但我认为，日本不可能与英国和美国长期合作。从长远看，日本人不是成为远东霸主就是走下坡路。如果日本人是别的性格，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但他们生性野心勃勃，卧榻之侧岂能容许他人酣睡。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讨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时再详细叙述。

要理解中国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白种人人侵以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其次还应该了解中国文化的现状及趋势；此外，还应该对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以及1840年至义和团兴起这段时期内的军事和外交略知一二。尽管中日战争也是在此期间爆发的，但我们可以暂且或多或少不去提及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而看一看如果没有日本，西方列强在中国将会推行如何不同的制度。然而，从那时起，日本对中国的事务就有了发言权。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是怎样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闭关锁国时的日本是什么样的，西方给日本带去了

怎样的影响。由于对日本缺乏了解，使得英国看不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无法觉察到日本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

仅仅从政治上加以讨论，不足以解释正在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情况，因为经济上的关系更大。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不发达地区，它的工业相当落后。所以，中国的自然资源是由中国自己开发，还是由日本人或西方来开发，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也关系到世界力量的平衡、世界和平的前景、俄国的命运甚至发达国家向更好的经济制度发展的机会。

列强一向自诩担保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但华盛顿会议却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为争夺中国而产生的分歧欲盖弥彰。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得远东问题的前景更为黯淡，尤其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在不大规模发展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情况下保持独立？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以对。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如能幸免于战争，那么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垮，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如果

强权者们再不学一些节制和宽容的话，我看结局未必不是如此，甚至更糟糕。

我们的西方文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我们的工业主义、军国主义、热爱进步、传教狂热、扩张势力、控制和组织社团，这一切都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西方人向来崇尚效率，而不考虑这种效率是服务于何种目的，但自"大战"[①]以后人们对这种做法开始有异议。他们认为，欧洲各国如果在此事上稍稍懈怠一下的话，那么战争就不会发生。但在美国这一信条仍为人们普遍接受；日本也是如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一样，他们的目的是要让俄国全盘美国化。俄国同中国一样，也可以看作艺术之邦，但不同的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就掌握在对西方文化不论好坏一律照单全收的人的手里。以前，我也许会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些人是对的。中国的归国留学生也与这些俄国人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冲击和推操是求之不得的事。现在，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我认为，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

① 译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1920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西方思想中的弊病是多么的严重，而布尔什维克正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切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的做法与日本和西方正在中国着手进行的做法别无二致。我们的船日复一日地在河面上飘荡，穿过了一片未知而神秘的土地。我们的旅伴热闹，快乐，喜欢争吵，满脑子都是些简便易行的理论，凡事都有其自圆其说的解释，时常想说服他人没有他们弄不懂的事，人类的命运无一能够超出他们的系统。我们的一个朋友整天昏昏欲睡，靠做爱和时常发出的干笑来打发光阴。我们被死一般的沉寂和天堂般深不可测的静谧包围着。似乎没人有闲心去聆听这份寂静，然而这却使我很坚决地对那些宣传家的高谈阔论和那些消息灵通人士源源不断的传闻置若罔闻。一天深夜，我们的船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房屋建筑，只有一片空旷的沙洲，沙洲的尽头是一排白杨树，枝头挂着初升的月亮。寂静中我独自离舟登岸，发现沙洲上聚集着一群奇怪的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为了逃避饥荒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来到这儿。每家人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旁边是他们所有的家当，有些人在睡觉，有些人静静地围坐在用树枝点燃的火堆旁。摇曳的火苗照亮了那些在外奔波、饱经风霜、胡子拉碴的男人的脸，女人的脸上则显出刚强和忍耐，孩子的面容也同他们的父母一样镇静而呆滞。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些人，然而，一条狗、一只猫甚至一匹马也比他们更容易使我感到亲近些。我知道他们将在那里日复一日，也许周复一周地等下去，

直到来了一艘船让他们搭乘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曾听说过——不过也许是误传——那个地方的土地比他们离开的这个国家更加肥沃丰饶。有些人也许在途中就会丢掉性命，其他所有人将忍受饥饿、干渴和正午骄阳的暴晒，但他们对这一切磨难都麻木了。对我来说，他们代表着典型的俄国人：在绝望面前没有表情、反应迟缓，不为那些组成进步和反抗团体的西方人所注意。俄国是一个大国，失去区区几个人就犹如人类和他们的星球迷失在广袤的星际之中。我当时就认为，理论家完全有可能增加许多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强迫人们采取那些违背他们原始本能的行动，但我认为靠传播工业主义和强迫劳动的福音是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展开讨论，继续那个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和一个真正受欢迎的政府应具有的美德的话题。参加讨论的那些人没有看到那些熟睡的流浪者，即使看到了，他们也不会对此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在空谈理论时并不关心实际利益。然而我却感受到了忍受一切而不置一辞的痛楚，那种无法言传的孤寂在整个熟悉的谈话中一直萦绕在我心间。我终于开始领悟到所有的政治都是由咧嘴而笑的恶魔造成的，他教唆那些精力旺盛，头脑灵活的人去折磨那些逆来顺受的广大民众，以夺走他们兜中的钱财、手中的权力和脑中的思想。我们继续旅行，一路上我们的食物是由那些农民提供的，保护我们的军队也是从那些农民的儿子中征招来的，我暗想对他们应该有所回报。但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时地听到他们哼唱一些忧伤的歌曲或是旋律久久不散的波莱卡音乐；但是这些声音同草原的静寂混在一起，

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的痛苦；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

第二章

19 世纪以前的中国

对于中国人的起源，我们只能完全靠推测。即便是他们最早的史料记载中也已无从查考。儒家的传世经典之一《尚书》相传为孔子所修订，它与李维[1] 所著的史书一样，记述的是关于远古皇帝为政功过的传说，供后世的帝王借鉴。尧和舜是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两位贤明的君王，那个时代被称为"尧舜之治"，意思和西方人所说的"黄金时代"差不多。中国人最初聚居在只占现今中国一小部分的黄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文明程度相当高，东亚的其他民族根本无法望其项背。黄河汹涌湍急，不便航行。而且河水里满是泥沙，淤积在河底。经年累月，河床长高，高出周围村庄。它一旦突然改道，便会造成泛滥。在最初的农业文明中，像这样的河流，往往造成民众的迷信，认为用人来

① 译注：李维(Livy，公元前 59 年—公元 17 年)，罗马历史学家。

祭祀可以改变洪水泛滥的局面。但《尚书》中却没有这种记载。尧舜禹都把平息水患视为头等大事，但他们治洪的方法是大兴水土改造，而非搞迷信的那一套。这至少反映了孔子时代人们的信仰状况。从下面这段描写尧的性格的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期望什么样的皇帝：

> 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①

第一个能确定中国历史的时间是公元前776年的

---

① 原注：理雅各的《尚书》第15页。转引自夏德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11年）——该书提供了许多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十分有用的信息。

评注：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1839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3年返英。1875年在牛津大学设汉文讲座直至去世。在香港期间，他在大鸦片贩子查顿、颠地等的经济支持下，又得王韬的帮助，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于1861—1886年间出版。他关于中国的著作还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孔子的生平和学说》（1867）、《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等。

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德国汉学家，1870年—1886年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历任九龙、淡水等地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和税务司职。曾任1886—1887年亚洲文会主席。1897年辞职回德。1902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1917年回德。死于故乡。其著作还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古代的瓷器》（1888）、《中国研究》（三卷，1890）、《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胶州湾及其内地贸易》（1897）、《中国的公共机构》（1903）、《一个收藏家笔记的残篇——清代画家略记，附录若干古代大师和艺术史家》（1905）、《中国的铜镜》（1907）和《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等书。此外还与人合译赵汝适的《诸蕃志》为英文。

那次日食[1]。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并非不可信，只是因为无法确定其确切的时间，并且当时的周朝（公元前1122—公元前249年）王室衰微，不敌名义上附属于它的诸邦，其中最后五百年周天子犹如中世纪时的法国君主那样徒有虚名。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每个王朝都是由盛而衰，做臣子的渐渐地不听王命，政府几乎瘫痪，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状况有时可达数百年之久。等到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中央集权又再次得到巩固。历史学家常常把一个朝代的衰落归因于宦官滥用权力，但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学传统。

皇帝尊严的维持主要靠的是神权，而不是靠政治方面的权力。这是因为政治方面的权力把持长久与否常与各人的个性坚强与否有关，而神权却是长久不变的。皇帝称为"天子"，在冬至这天要祭天。中国人所说的"天"与西方人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同一个意思，都是一神教的"上帝"[2]。翟理思[3]教授认为"天子"应该译为"上帝之子"。中文里的"天"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地的天，一是上天的天。后一种意思用得较少。"上帝"这个表达法

---

① 原注：同夏德前引书，第174页。常误为775年。

② 原注：参见夏德前引书，第100页及以后。

③ 译注：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一译为翟理斯，1845—1935），英国汉学家。1867年来华为使馆担任翻译。后历任中国各英领事馆翻译、副领事、领事。1891年离开驻华领事界时为驻宁波领事。1897年继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文教授，1928年退休。编著有《中国概要》(1876)、《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1882)、《中国的共济会制度》(1890，上海)，《华英字典》(1892)、《古今姓氏族谱》(1898)、《中国绘画史导论》(1905)、《中国和满人》(1912)、《中国和汉人》(1912)、《耀山笔记》(1914)、《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1915)、《中国的文明》(1911)、《有关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1878)、《关于鸦片的一些事实》(1923)及《中国文学史》(1928)等书。此外还译《聊斋志异》、《洗冤录》、《佛国记》等为英文。

意思实际上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大致属于孔子以前的时代的用法，但是这两种叫法肯定都代表着《旧约》中所记载的人神同形的上帝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个名称渐渐消匿，而“天”依然存在，所以祭天的仪式也保留着，只有皇帝才能祭天。祭天的仪式一直持续到 1911 年清朝灭亡。近代的祭天仪式在北京天坛进行（北京可称得上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天坛供奉祭品可以说代表着孔子以前的宗教所幸存下来的唯一得到官方认可的东西。这也是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唯一可称得上的宗教，因为佛教、道教等都从未与国家政权拉上关系。

孔子所著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是鲁国的一个官员），因此从公元前 722 年开始，中国的历史就记载得较为详尽。

王位代代相传了两千多年后出了一桩奇闻：有人号称始皇帝。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死于公元前 210 年。除了征战南北，他还有三大值得一提的成就：第一，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第二，废除了分封制；第三，焚书坑儒。我们可以不加掩饰地说：分封制的彻底废除还有待后世历代皇帝加以巩固，而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中，每当君王懦弱无能、中央政权不稳时，分封制就屡有抬头。中国历代皇帝中能使全国服从号令的当首推秦始皇。虽然到了秦二世秦朝就灭亡了，但我们如今称中国为 China，其实来自秦始皇的姓（Tsin 或

---

① 原注：有关这个讨论请参见程理思教授所著《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1915)第一讲，尤其是第 9 页。

Chin)[1] 的读音（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从中也足以看出秦朝对后世的影响。秦王朝当时的版图几乎大致相当于现今的中国。

焚书一事，实在很少见。秦始皇自称为始皇帝，不愿让人回想起在他之前的中国历史，因此他憎恨历史。此外，当时文人学士已是国内一支强大的力量，他们像孔子一样尊古崇古，而秦始皇则是个精力旺盛的改革者。再者，秦始皇似乎没受过多少教育，而且也不是纯粹的汉人。出于虚荣的动机和激进的想法，秦始皇颁布了以下敕令：[2]

>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高第，前引书，第 203 页）

---

① 原注：比较高第所著《中国通史》(1920，巴黎)，第一卷，第 213 页。
译注：高第(Henri Cordier，一译高亨利，又译考狄埃，1849—1925)，法国汉学家。1869 年来华，1876 年回法，任日意格驻法中国教育团秘书。1881 年任巴黎现代东方语学校教授。后任法国地理学会会长、亚细亚学会会员、法兰西学院会员。高氏是《通报》创办人兼编辑。著有《法国在远东两个租借地的起源：上海、宁波》(1896)、《1860—1900 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三卷，1901—1902)、《1857—1858 年远征中国记》(1905)、《1860 年对中国的远征，外交文书和文件史》(1906)、《中国通史》(四卷，1920)、《中国》(1921)、《西人论中国书目》(五卷，1904—1924)。此外，他还把英国汉学家裕尔(H. Yule)在 1866 年编译出版的《东域记程录丛》一书四卷加以补订后于 1915 年出版。

② 译注：经考证，本段引文系李斯的上书，罗素误。

由此看来，秦始皇好像还有点俄国的激进分子的味道。文人学士对他毁谤有加也是很自然的。而现今中国那些受保守派排挤的改良主义者，对于秦始皇这一摧毁臣民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的做法，倒颇有几分同情。李文彬所著的《中国历史纲要》(上海：商务印务馆，1914年；第61页)中有如下文字：

> 中国发生的激烈变更无一不遭到儒家学者的强烈反对，从秦朝至今莫不如此。一举废除封建主义确实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但无论这变更是往好的方向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文人学士都无暇过问考虑；他们只知道先辈认为有益的事必对自己和后代有益。他们在经书中找到无数祖宗的经典陈规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们随时随地引用这些古代先例以佐证始皇帝废除分封制是错误的。他们继续攻击政府，结果政府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禁止他们崇古的聒噪……至于焚书之敕令实行到何种程度，我们很难推测。可以断言，这道敕令还规定政府的所有图书馆与官员阶层(谓之“博士”)手中的藏书不得焚烧。如果这道敕令真给中国文学带来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其受损程度没有后世设想的那样严重。但是，由于这一极端手段仍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许多在都城咸阳的书生后来被活埋了。

这段文字与“少年中国”[1] 持同样的观点，表现出用西方文化取代陈腐的旧学的迫切之情。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中国也有些阻碍进步的传统习惯，但中国更长于维持稳定而不是进步和变革。所以，“少年中国”认为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是存国之本，他们自然就用赞赏的眼光来看待秦始皇当年收拾那些老学究的反动行径。现在看来，先秦的古籍为数不少，由此可见，焚书的敕令并未发生多大的效力，而且该敕令在颁布二十二年之后（公元前 191 年）就被废止了。

始皇帝的王朝只传到他无能的儿子手中作短暂停留就被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取代了。这中华帝国的辉煌年代，恰好与罗马帝国同处一个时代。在征服北印度和中亚的过程中，汉朝同印度，波斯甚至罗马帝国都有过往来接触。[2] 与印度打交道的最大结果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对日本产生影响，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罗马人喜爱中国的绫罗绸缎，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持续到回教兴起。大约在公元前 164 年，还曾有过一种天文的论著从罗马传入中国。[3] 不过这些交往对中国并无太大的重要性。汉史记载中提到的安敦王，其实是罗马皇帝马卡斯·奥里欧斯·安托涅斯（121—180 年）。所谓安敦大概是安托涅斯的译音。

中国在远东具有相当大的威望，从汉朝开始，一直

---

① 译注：这是罗素的特别用语，专指“五四”时代的中国新青年。

② 原注：参见夏德所著《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莱普依格与上海，1885 年），这是一本令人钦佩和令人着迷的专著，在维吉尔与霍勒斯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中国人。比较高第前引书，第一卷，第 271 页。

③ 原注：高第前引书，第一卷，第 281 页。

到 19 世纪欧洲的陆军和海军入侵，历时颇久。有时候人们禁不住会认为，现在白种人侵略中国，就好像当年匈奴人对秦汉边境的骚扰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一样，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自己也会时常认为欧洲的兵力也不见得永远强过亚洲；而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文明也只不过是虚妄的念头。我们的种种历史记载认为地中海是世界的中心，这给了我们一个大错特错的观点。高第是这样描绘汉朝所作的陆上探险和海上航行的[1]：

> 西方人对那些开通中国海和印度洋航道的航海家，对那些穿行于广袤的中亚北上至波斯湾的马队闻所未闻，所以他们简单地把世界历史的范围缩小到以色列、希腊和罗马诸国，丝毫不知人类拓展的情状。这地域是世界的最大部分，同时它的文明又与西方的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它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一样发达，只是不为那些撰写自己的小世界历史的人们所知，他们还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在自己的笔下。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脱胎于我们整个文化的褊狭见解将给政治和人类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如果我们不打算惹恼亚洲，让其逞威风的话，我们的头脑里必须有亚洲的地位。

汉朝以后，各朝更替频繁，社会时有动荡，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618—907 年)。唐朝最昌盛的时候，

---

① 原注：高第前引书，第一卷，第 237 页。

版图也达到顶点，诗歌和艺术也取得了最高成就[①]。后世的成吉思汗（卒于 1227 年）曾一度将中国的疆域拓展得更为庞大，但成吉思汗并不是汉人。他统率部下，从蒙古起兵，一路攻克中国、印度、波斯、俄国。在整个中亚，成吉思汗每克一城，则一律屠城，不论男女老幼。在梅伏（Merv），70 万人被杀，整个城市一片废墟。但据说仍有不少人躺在死尸旁装死而拣得性命。其后不久，尼萨帕（Nishupur）被克，上面下令所有的居民一概斩首，男人、女人和小孩的死尸堆成三座山。即便如此，还担心有人躲进地洞，为此还特意留下一队兵士随时砍杀那些钻出地面的人[②]。在莫斯科、基辅、匈牙利和波兰，情形也大抵如此。成吉思汗的大肆屠杀，让圣路易和大主教有同盟先例可资援引。成吉思汗时代令人想起今日的世界，只是他的杀人方法与停战以来使用的方法相比更人道一些。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卒于 1294 年，他的名字至少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柯勒律治的诗歌而为人们熟悉），灭宋（960 年—1277 年）建元，他是第一个被认

---

① 原注：默多克在其所著《日本史》（第一卷，第 146 页）中这样描述唐初期的鼎盛：

“次年（618 年），太子李渊建立了显赫的唐朝，这个朝代左右中国的命运将近 300 年（618 年—908 年）。李渊在位 10 年，政绩辉煌。之后，他让位于儿子太宗（627 年—650 年）——中国少见的伟大的贤明君主。无疑，这个时期的中国站在文明的前沿。中国不仅是五洲，而且也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最开化的、最进步的和治理得最好的帝国。在太宗统治下，中国的版图远至波斯、里海和吉尔吉斯草原的阿尔泰山，沿着这些山脉向北延及戈壁沙漠，向东伸至兴安岭内侧，索格迪那、呼罗珊以及印度喀什周围地区也都承认中国是其宗主国。尼泊尔和印度马加丹的君王都向中国派遣特使；643 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朝廷的特使也出现在中国。”

② 原注：高第前引书，第二卷，第 212 页。

可为中国皇帝的蒙古人。此时，同汉人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或抑制了第一批征服者的野蛮行径。忽必烈决定将都城从蒙古的喀拉·昆仑迁至北京。当时所筑的城墙如今还在。城墙上的天文台也还在。直到1900年，人们还可以看到忽必烈所造的两台天文仪器，但在德国人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它们就被掠到了波茨坦[1]。我知道《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应将其归还中国。如果真的实行，这或许是《凡尔赛条约》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了。

忽必烈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同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1527—1598年，1556—1598年在位)在英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菲力浦二世曾派遣“无敌舰队”征讨英国；而忽必烈则接连两次派舰队东征日本，结果由于飓风以及日本人的抵抗，元兵大败。

忽必烈之后的蒙古皇帝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汉人的风俗，渐渐地失去了以往的强暴本性。1370年，元朝被汉人建立的明朝取代。到1644年，明朝为满族人所灭，清朝建立，采用汉人的风俗。1911年，清朝被革命推翻。清对于中国文化毫无裨益，只有它的辫子是一大特点，但也随着清的覆灭而消失了。

中华帝国延续至今，并非依靠军事，而靠的是它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相反，在大多数时候，它在战争中都表现得软弱无能。它南面的一些国家版图较小，且天性不好战；北面、西面的邻国则大多处于沙漠地带，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口。匈奴在与汉人打了几百年的仗之后终于败落；而鞑靼和满族却战胜了汉人。但这两个民族人

---

① 原注：高第前引书，第二卷，第333页。

口太少，文明程度又低，难以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汉人，结果被同化了，仿佛他们的风俗习惯根本没存在过。罗马帝国如果只有哥特人这一个敌人那还不至于灭亡，但异族入侵如同波浪一般接连不断，来不及一一同化，这就是罗马最终灭亡的原因。而中国则由于戈壁、沙漠、西藏高原这些天然的屏障而免于此种命运。但由于白人是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过去的这些地理优势便不复存在了，要想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非殚精竭虑不可。

虽说有地理上的优势，但中国文化从佛教传入之后就再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也称得上是奇迹。埃及、巴比伦也同样历史悠久，但现在却已灭亡，无从比较。最大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又同属一种文化。据估计，8 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在 5000 万以上。其后经过 10 年的战乱，下降到 1700 万[①]。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过人口调查，但大都是户籍调查，而不是人口调查。以户籍数约略计算而得的人口数不足为凭。而且，每次的统计方法不尽相同，据此而作的比较也不十分可靠。辛博森写道[②]：

---

① 原注：高第前引书，第一卷，第 484 页。

② 原注：《中日两国真相》，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第 13、14 页。
译注：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英国人，曾于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任总司录事司。1902 年辞海关职，任英国报纸驻京通讯员。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1916 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1922－1925 年兼任张作霖顾问，并创办《东方时报》。1930 年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9 月因阎反蒋活动失败而将海关交出。是年 11 月遇刺死。著有《满人与俄国人》(1904)、《远东的新调整》(两卷，1905)、《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1906)、《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1907)、《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1908)、《几天的故事》(1913)、《为中国的共和政体而斗争》(1917)、《中日两国真相》(1919)、《来自太平洋的一则欠审慎的记事》(1922)、《为什么中国看中了赤色》(1926)、《消逝了的帝国》(1926)、《张作霖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1927)、《中国的苦难》(1928)等书。

清政府第一次人口调查是在1651年。当时，社会秩序已逐渐恢复，中国人口又回升到5500万，这个数字比汉朝在公元元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调查还要少，与忽必烈1295年（罗素注：这一年代可能有误，因为忽必烈死于1294年）初建元朝时相当。这件事情着实令人惊讶。中国在公元前后，边境上屡有战争，死伤者众多。此后，历经一千六百多年之久，版图虽大有扩大，而人口数量却保持稳定。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类似的记载。然而，后来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德高望重的满族皇帝康熙死后3年，即1720年，人口增加到12500万。1743年，乾隆（其政绩也毫不逊色）即位不久增加到14500万。到乾隆末期，1783年，人口数为28300万，增加了一倍。嘉庆年间（1812年）达36000万；在太平天国运动前（1842年）增至41300万；那次起义后人口骤减至26100万。

这些人口调查不足为信。1919年的《中国年鉴》第一页（这是我见到的最新版本）上写道：

西方国家所采用的人口调查方法从未在中国实施过，因此，各次统计所得的总人口数出入甚大。最接近于真实的可靠的统计数字大概要算1910年民政部所作的人口调查，这

> 次调查的结果还写成了报告，通过北京美国公使馆的见习翻译雷蒙德·P.丁尼先生转交给华盛顿的国务院……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人口调查也只能视为大略之数，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调查还是按户口而不是人口来计算的。

根据这次调查，中国的人口(西藏除外)为329,542,000。西藏人口据估计为1,500,000。下表是中国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作的人口统计：

公元		公元	
1381	59,850,000	1760	143,125,225
1412	65,377,000		203,916,477
1580	60,692,000	1761	205,293,053
1662	21,068,000	1762	198,214,553
1668	25,386,209	1790	155,249,897
1710	23,312,200	1792	307,467,200
	27,241,129		333,000,000
1711	28,241,129	1812	362,467,183
1736	125,046,245		360,440,000
1743	157,343,975	1842	413,021,000
	149,332,730	1868	404,946,514
	150,265,475	1881	380,000,000
1753	103,050,600	1882	381,309,000
		1885	377,636,000

我们仍然无法从这些数据确切知道中国的人口数量。不仅同一年的统计大不相同(例如1760年)，即便是不同年份的统计也无法使人相信。辛博森先生也许会争辩说，人口从1580年的6000万骤减至1662年的2100

万，完全是清政府为征服中原而进行的无数征战造成的。但1711年到1736年间人口数从2800万骤增到12500万；1790年到1792年不过两年光景，人口又骤增了一倍。没有人知道中国的人口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一般老百姓是几代同堂还是组成小家庭各过各的日子，也无从知道这些数据意欲说明的其他的一些重要事实。有关这些方面的说法，虽然言之凿凿，也只不过是些臆测而已。即便是北京的人口也只知道大约是90万，但也有可能在80万至100万之间的任何一个数量，至于全国的人口大约在3亿至4亿之间，或者说在35000万以内。至于中国历朝的人口数恐怕没有一个数据是可信的。所以，万万不可相信那些提供此类数据的作者。

中国文化有几个普遍的特征。在这里我只选择最重要的几个：(1)文字由表意符号构成，而不是用字母；(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3)政府掌握在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而非世袭贵族手中。家族制度也是中国与近代欧洲的区别，但它代表着大多数其他文明都经历过的阶段，所以称不上是中国的特点。我上面列举的三点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过去都未曾有过而为中国所独有，所以下面就一一加以讨论。

一、中国人没有字母，只有用符号作为文字，这有许多不方便之处：第一，学习写字时，必须先学会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不像我们只有26个字母；第二，没有字母顺序，因此字典、目录等都无法排序，更无法操作铸造排字机；第三，汉字无法准确地表音，对于专有名词、科学术语的翻译无法像欧洲语言那样按发音写下来，必

须特意造出个词来代表。[1] 基于上述三种原因，中国最近有人提倡使用表音文字。我认为，如果中国要想同那些认为自己垄断了所有优势的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那么这件事非成功不可。由于学习汉字要很长时间才能会读会写，所以初等教育不易于普及，成为实行民主的障碍。就这一点而言，文字改革的理由就很充足了，更何况还有其他理由。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拼音文字改革应该得到支持。

然而，表意文字也有它的好处，只不过欧洲人对这些好处不甚明了。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我们是一字代表一音，而中国却是一字代表一义。西方的数字也是采用汉字的制度，如“1922”，英语、法语或别的语言都可以读出来，音不同但义相同。同样的道理，中国各地的方言不同，无法沟通，但汉字却全国都能读懂。日本人虽不会说汉语，却能用日语读懂汉字，就像他们能读懂英国人所写的数字一样。中国现在的口语从古至今变化肯定很大，就好像法语从拉丁文变更而来一样。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可以读懂最古老的经书。

文字胜于口语之处就在于它能存在得更持久，可以沟通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口语因为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表意的文字自然要比表音的文字更能显示其优越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字代表了所有文字可能都经

---

① 原注：例如我的名字，汉语中发音最接近的是“罗素”。“罗”是一个字，“素”是一个字，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组合来拼写我的名字。

历过的一个阶段，不足为奇。世界各地的文字，最初都是些图画，而不是谐声文字。就我所知，人们可以研究出埃及的象形文字从表意到表音的发展顺序。中国的文字之所以比较特别，历经数千年，或许是由于汉语都是单音节的、没有形态变化、同音异义的字太多，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此。

至于中国书体与心理的关系，《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巴尔的摩，1922 年 2 月号)中李济(音译)先生《中国人类学诸问题》一文颇有参考价值(第 327 页)：

> 欧洲科学家一向把语言看作是一大堆发音的集合，而非什么比发音器官更内在更深层的东西。语言—符号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日积月累的影响还是未曾发掘的领域，若以此为标准划分现今人类的世界文化，可以看到一类人使用字母文字而另一类人使用象形文字，两种文字虽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却各有短长。坦率地说，使用字母文字的文化有一个严重的内在缺陷，那就是缺乏稳定性。大多数善感易变的民族都居住在字母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这样的故事在西方大地上屡见不鲜。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这些使用字母文字的人种，其文化无一不由盛极而衰。古代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也是使用字母文字，他们的文明也同希腊和罗马的一样缺乏坚固持久性。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自然是字母语言的过分流动性，因而不能保存具体确切的

> 思想观点。这些人的知识内容如奔涌的瀑布而非浩瀚的海洋。其思想之丰富无他人能比，而放弃有价值的观念速度之快也令他人望尘莫及……
>
> 从任何意义上讲，汉语与字母文字都是对立的。它没有字母文字的种种便利之处，但是它所体现的简朴和终极真理却牢不可破，不受狂风暴雨和艰难时日的侵袭，保护了中国文化达四千年之久。它坚固、方正而优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然而，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文字，还是这种文字反过来升华了这种精神，还尚无定论。

我们不必去深究这篇贯穿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宏论。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并不习惯认为自己所属的“字母文化”仅仅是文化中的一种这样的观点。至于以符号构成的汉字与中国特殊的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研究，不敢臆断。但我相信，正如李济先生所述，有极大的关系。

二、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对于社会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几乎与一些宗教创始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相同，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孔子完全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的生平事迹广为流传，没有释迦牟尼和耶稣那样纷纭的神话传说。他与其他宗教奠基者不同，其最大特点是灌输给人们严格的伦理道德准则，永为后世尊崇，但这些准则却无半点宗教上的武断意味。这使得后世无数崇拜圣人治国安邦

的儒家，对神学持怀疑态度。

孔子不是宗教家，他与斯巴达的莱克尔加斯[①]、雅典的梭伦[②] 一样都是政治家，而不是宗教家。他是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所讨论的都是治国之策，他所追求和培养的美德，不是个人的得道升天或者企求来世的幸福，而是希望造就繁荣昌盛的社会。大致说来，他有些守旧，一心想维护前代的种种美德。他承认当时的宗教——一种空泛的一神教，信奉死后有灵魂，作子孙的必须有慰先灵。然而，孔子很少言及超自然的事物。在回答一次提问时，他对“知”下了如下定义：诚实地培养对邻居的责任，“敬鬼神而远之”。除了祭祀祖先，儒家不怎么祭祀鬼神。祭祖也是尽孝道的一部分，因此也就对邻居负有责任。孝道中还有尽忠的义务，忠君就是尽孝。但如果君主暴虐就失去了这项权力，这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点。所以反抗暴政不为罪。翟理思教授援引的一件事可作例证：

> 皇帝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收养的儿子，通常只在滥用王权的情况下才会遭到罢黜……如果君王不能履行他的职责，臣民用不着尽他们的义务，那么君王的神权也同时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左传》的一个例子可查。下面是公元前558年的一段对话。晋侯问师旷：

① 译注：莱克尔加斯：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政治家，斯巴达宪法的制订者。
② 译注：梭伦（公元前638？—558?），雅典政治家。希腊七贤之一，古雅典的立法者。

“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经常被付诸实践，造成了太多的叛乱。

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当今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意图染指中国的人都赞美旧习惯而嘲笑“少年中国”为适合现代需求而作的种种努力。孔子宣扬的孝道有碍公共精神的发展，以下便是一个例证。[①]

叶公向孔子吹嘘他的臣民道德水准甚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汉代的赵岐是这样阐释儒家的孝道的：他认为，因为家里穷、父母年迈而不去做官是有悖于孝道的，因

① 原注：翟理思，前引书，第86页。

为做官可以供养双亲。[1] 不过，这种罪孽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同样少见。

不孝之中最严重的情形就是没有子嗣而断绝了对祖先的祭祀。大概正因为此种信条，中国人的生育才较频繁，多生子女有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希腊人、罗马人也同中国一样注重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国的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自然，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但是，爱国主义是对作战的某一方尽忠，孝道则不然(除了在原始社会)。因此，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则是受贿和要阴谋。所以，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得小。这可以从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得到印证。

儒家学说除了孝道之外，大都是一些道德规范，有时无异于一本社交礼节书，教人自制、中庸，尤其是谦恭。这些道德规范不像佛教和基督教那样严厉，使得只有少数圣贤才能不辜负它的期望；也不是只和个人的超度有关，而与政治制度无法相容。普通人要不负儒家的说教并不太难，只不过需要始终保持自制——这只不过

[1] 原注：高第，前引书，第一卷，第176页。

是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被灌输的“要守规矩”的一种延伸扩展。他必须喜怒不形于色；必须谦卑有礼；必须顾及面子，对失败了的仇敌不可加以羞辱；凡事须做到中庸而不要走极端等等。总而言之，凡事须平心静气，对自己有所约束。18 世纪的欧洲也是持这种人生态度，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浪漫主义、卢梭和断头台扫荡一空。在中国，虽然战争和革命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儒教的平静观起的作用，它使参与者不过于急迫，没有关系的人冷眼旁观。乘天下雨的时候进攻对方，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卑鄙的。有人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吴佩孚就曾这样打赢了一仗，对方认为不合规矩，吴佩孚就退回原地，而选了一个晴天重新发起进攻。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刀兵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孔子的礼教的缘故。[①]

儒教形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当时哲学家朱熹[②] 对儒教所信仰的“天”进行了分析，他的阐释被奉为正统观点。元以后(1370 年)的历届政府也都把孔教尊为国教，而在此之前，孔教还须与佛、道两家分庭抗礼。因为佛、道两家常为迷信的君主所信奉。有不少皇帝因为服用道家的长生不老药而死。蒙古皇帝信奉的是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现在仍盛行于西藏和

---

① 原注：道家非常反对动用武力。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翟理思，前引书，第 150 页)。中国军队中不乏好的士兵。

② 原注：翟理思，前引书，第三讲。朱熹死后他的女婿在棺材旁守灵，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尽管这位贤人一生都在教诲他人奇迹是不可能的，但他的棺材突然立起来，离地 3 尺悬在半空。他的女婿吓坏了，“尊敬的岳父大人，”他求道，“请别破坏我的信仰，奇迹是不可能的。”一听到这话，棺材慢慢地降落于地，他的女婿的信仰重又恢复了。

蒙古。清朝皇帝虽然同蒙古皇帝一样是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但他们却是极端正统的儒教信徒。长期以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儒家的弟子，对于宗教持怀疑态度，而对于道德却不然。至于其他老百姓，则对儒佛道三者都信奉。我们西方人沿袭了犹太人的思想，若认定一种宗教，其余的都为异端，然而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现在，巫术虽然仍通行于中国的底层社会，但其实称不上是宗教。即便以前有过宗教，也远不及欧洲那样狂热。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能引发道德上的怀疑，而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却屡有发生。

三、现在试着来讨论一下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那么文学性的、非迷信的制度比如孔教恐怕就无法维持这么久。现总统徐世昌曾在《战后之中国》一书的第59—60页上发表了对考试问题的意见。他在探讨了周朝的教育制度之后说：

> 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教育制度稍有革新，但良好的道德品行仍然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在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朝廷设立了由四个学术部门组成的国子监，而其中伦理学是重要的。据说国子监有学子三千多，富有才干，各种品德端正，而在学的总人数，算上从高丽和日本来的求学者，则达八千之众。同时，朝廷还实行"推举"制度，通过这种制度许多有才干和品行端正者能被从地方推荐给皇帝，担任公职。高等教育与地方推举相互补充，但在这两者中道德上的完美最受重视。

尽管国子监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但它从没像当时那样享有盛名。对于这一变化，科举制的引入难辞其咎。“推举制”没有明确规定被举荐人必须符合的标准，因而很容易造就出一个贵族阶级，仅从中就可找出可充任公职的合格人材。因此，宋朝皇帝们(960年—1277年)废除了推举制，把国子监晾在了一边，率先以科举制取而代之。这些考试既输送学者又提供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考试定期举行，直至引进现代教育制度。尽管在后来的年代里这种考试形式无用而刻板，但它们也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此外，中国教育的道德传统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因此，尽管这些考试强调纯粹的文学成就，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私塾仍然延续。

虽说科举制度比起任人唯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要优越得多，但仍然有它的缺点。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中国的科举从明太祖朱洪武(1368—1398年)到1905年被废止，其间一直没变。废除科举是近代中国改良家的一个重要目标。李文彬写道：

洪武可赞扬的事虽多，但他与一桩吞噬人们心灵的罪恶却脱不了干系，那就是三年一次的八股考试，这种作文形式第一次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为写作比赛打下了基础。之所

以谓之“八股”，是因为点题之后作者得在四段里破题，而每段由两股组成，其中的句数和字数得大体相等。题目不是选自“四书”就是采自“五经”。作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任何与朱熹及其流派出入的观点。他得按要求引用孔子的话，或不论谁的话，只要顺其口气，与所规定的相符合。名次是通向政府官职的进身之阶，作文最好者即为中试之人。若认为善于此种作文的人同时也能胜任各种官职，不得不说是荒谬的。然而，整个科举制度同样荒谬，自洪武三年起，这种制度就代代相传，直到近几年才被废除。没有一种制度比八股考试能更全面地、更有效地滞缓一个国家知识上和文学上的发展了。正是由于“八股文”，中国早就走到了她下坡路的最低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腐败的制度经久未废，宋代理学家的说教长久为世人尊崇。

这是当今中国一个爱国者的肺腑之言。毫无疑问，若八股作为一种现代体制，则具备了他所说的一切弊端。但在14世纪，若要想出一个取而代之的良策，人们发现这个方案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的好处有：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学者；虽有异族用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但不管怎么说，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形势。我希望

在赶走外国剥削者和那些他们误称为文明的残忍体制的斗争中，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致遭到灭顶之灾。

第三章

中国与西方各国

若要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首先要了解其19世纪的历史。中国历来是远东最大的帝国，拥有广袤的沃土，人民勤劳、开化。我们西方所谓的贵族世袭制度在那里公元前就已不复存在，政府官吏的选拔是看他们文章写得是否流利。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时断时续，且大都是宗教上的往来。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一些学者跋涉到印度研究佛教教理，但后来由于蛮族侵扰，实际已无法成行。基督教的一派“景教”在7世纪的时候传到中国，且颇有些影响，但没多久就衰败了。(1625年长安景教碑挖掘出来，至此，景教流行的情况才为后人所知。)17世纪至18世纪初叶，罗马天主教徒深得朝廷的信任，因

为他们擅长天文，帮助纠正中国历法的紊乱状况。[1]他们制作的地球仪和观象仪至今还保留在北京的天文台。但天主教最终没能顶住其他教派的倾轧而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立足。

1793 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到中国，要求扩大通商，并派驻英国永久外交代表。当时正是乾隆年间，清朝的极盛期。乾隆是一位精于书法，乐于奖掖艺术的文雅君主(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遗墨)。巴克斯[2] 与濮兰德[3] 所著的《北京宫廷的编年史与备忘录》收有他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答复。我很想全文照抄于此，但略摘几段也足以说明乾隆拒绝英国要求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 国王远居重洋之外，然而为分享我们文明的卑微愿望所驱使，派遣使者带来奏折……并送以贵国出品为礼，以表忠诚。朕已披

---

① 原注：1691 年，康熙皇帝下诏解释他对不同宗教的态度。关于罗马天主教，他认为赞美天主的西方教义也是异端；但是因为牧师们都精通数学，政府不妨利用他们——士兵和国人们应该懂得这一点。(翟理思，前引书，第 252 页)

② 译注：巴克斯(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一译白克好司，1873—1944)，英国汉学家。1898 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903—1913 年任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在此期间与濮兰德合写《清室外纪》(1913)和《慈禧外纪》(1910)。1913 年被派为伦敦大学汉文学院主任，但未就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北京致力汉文研究和翻译。巴氏除精通汉文外，还懂日文，晚年任英使馆名誉日文翻译。

③ 译注：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英国人。1883 年至中国海关任职两年。1896 年就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1906 年被派为中英(银)公司驻华代表，先后与清政府缔结四项铁路借款。曾任伦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1904—1905 年日俄战争期间，他替日本搜集情报。濮氏是一个敌视中国的新闻记者，常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除与巴克斯合著《清室外纪》和《慈禧外纪》外，还著有《中国最近的事变和现在的政策》(1912)、《中国、日本、朝鲜》(1921)、《李鸿章》(1917)和《中国：真遗憾》(1932)等书。

览卿之奏折，言辞诚恳，足以表明贵方的敬重和谦恭，应予颂扬。

他以一种对付缠扰不休的孩童的方式，继续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乔治三世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他使乔治三世相信，派遣大使是没什么用的：

虽英国钦慕中国而欲得中国之文化，然二国之礼仪法律，完全不同，英国所派之使臣，即能得中国文化之要旨，但仍不能施行于英国，故外交代表之派遣仍属无益。

虽乾隆驾驭广大之世界，然以施完美之政治，尽国家之责任，为唯一之目的。苟英国能仰体意旨，表明忠诚，而永久服从清朝，则嗣后可享平安，而无派遣代表之必要。

他明白英国想要中国的出产，但觉得他们没什么东西可值得交换的：

"所有物产，中国俱备，而又丰富，无缺少之虞。是以外夷之出品，无须输入。至有茶、丝、磁器等，为欧洲国家所必需者，"这有限的贸易从那时起允许在广州继续进行。

他对马戛尔尼爵士也不太欣赏，但"朕未忘尔地孤独遥远，与世隔绝，独处海之一隅，但朕未曾忽略尔对天朝作用可原谅之无知。"他用这样一条命令作了概括："谨遵此命，杜绝疏忽大意！"

我这里想说明的是，人们只有等到不再认为乾隆所

言甚为荒谬时才会理解中国。试想罗马人自命为世界的管辖者，视帝国以外的世界无足轻重。乾隆治下的版图比罗马更广大，人口也更多。中国与罗马崛起于同一时代，但中国至今仍屹立于世，凭借战争或同化，战胜了所有的异族。它的邻国之中除了日本亦步亦趋地仿效中国而保有自己的文化外，其余的都处于蒙昧状态。亚历山大大帝叹息没有新世界可供征服，而那时他是没有听说东方还有一个中国，孔子都已经去世 150 年了。所以，乾隆对于世界的理解比亚历山大还略胜一筹。而且，他对于与西方通商的理解也不能说错：国计民生所需之物中国都有，西方强迫中国与之通商不过是出于一己之利，而与中国交换的东西只不过聊胜于无。

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天朝相媲美。在北京的博物馆，当初法国路易十四想要以其华丽夸耀于东方而送给中国皇帝的《阳光》至今仍与中国的其他艺术品一同陈列着，两相对照，显得粗陋艳俗。英国虽有莎士比亚、弥尔顿、洛克、休谟和其他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比中国人更优秀。使我们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我们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更熟练的杀人技艺。一个英国人杀一个中国人比一个中国人杀一个英国人要容易，所以我们的文化比中国的更优越，而乾隆大错特错了。我们战胜拿破仑之后就一直在力图证明这个命题。

我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是在 1840 年，原因是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进口，结果以中国割让香港、开放五口

通商而告终。之后不久，法国、美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也获准通商。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火烧圆明园。圆明园是皇帝聚集珍宝之地，其艺术上的价值远胜于法国的雷姆斯大教堂，可与威尼斯的圣马克大教堂相媲美。这场战争让中国人屈服于我们优越的文化，功不可没。因此，中国又增开七处口岸，允许英舰在长江通航，赔款，并割让更多的香港版图给英国。1870年，中国人头脑发热，谋害了一位英国外交官，于是，其他外交官趁机要求赔款，再开通五个通商口岸，固定鸦片税率，他们的这些要求一一得到了满足。后来，法国占领安南[①]，英国吞并缅甸，而这两国本来都是中国的附庸国。再后来爆发了中日战争(1894—1895年)，日本大胜，占领了朝鲜。如果不是俄、法、德三国的干涉，日本还要得寸进尺。英国担心俄国进攻而采取中立，这是英国与日本交好的开始。这场战争也使中国与俄国结成同盟，作为回报，俄国取得了在满洲的种种权利。但后来由于日俄战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俄国所取得的权利全部转到了日本手中。

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害。他们的死使他们名噪一时。因为若他们活着也只不过多几个皈依者，而他们这一死却使基督教道德昭示于世。德国占胶州湾为海军基地，并取得了在山东全省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些权利应照第十四点规定转让给日本。所以，虽然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坚持日本归还山东，但山东已经是日本的属地了。然而，这

---

① 译注：安南，旧时之王国及法国保护国，现为越南的一部分。

两个德国传教士对文明的贡献并未止于中国。在第一次讨论《德国大海军法案》时，德国议会时常利用他们的死来大做文章，认为战舰能为德国人在中国赢得尊重。他们激化了英国与德国的关系，加快了“大战”的来临。义和团运动也是因他们而起，据说这场运动是始于排斥在山东的德国人。列强处处仿效德国：俄国占领旅顺为海军基地，英国占据威海卫并且把长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围。美国人隔岸观火，宣布实行保持中国的完整并要求门户开放的政策。

中国的情况欧洲人知之甚少，但对于义和团却无人不知。我们劫掠了北京城，以此显示了一番我们高人一等的道德之后又索取了一笔巨额赔款，把北京的使馆区建造得壁垒森严。至今，使馆区里仍驻扎着欧、美、日本的军队，周围有一片归公使团管理的空地，中国人不得建筑。任何人一旦进入使馆区则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每当有腐败的和卖国的政府被推翻时，其官员常跑到日本或其他公使馆寻求庇护，罪即可免。在这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域里，美国人还架起电台以便与本土直接联系。乾隆的辩驳就到此为止了。

谈到庚子赔款，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美国人得到的赔款，除了补偿损失外还有富余，就退还中国作为高等教育经费。其中一部分在中国开设由美国人管理的大学，一部分资助出类拔萃的中国学生留美求学。中国由此受益匪浅，而美国则得到了中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友谊，美国由此取得的利益更是无法计算。大家都清楚这种做法对双方都有益，但英国没有半点仿效的迹象。

在一系列的战争和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失去了独立的财政权。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对中国政府目前所处的困难地位也就清楚了。最初中国人没有外交经验，不知道孰进孰退，及至后来有了经验，又不允许把当初订立的条约视为一纸空文，因为撕毁条约是列强们的特权——一种每个列强都要弄过的特权。

最能够表明这种情形的莫过于海关关税。英国与中国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于1842年签约，规定商埠的进口税为百分之五，出口税不得超过百分之五。这个条约为整个海关制度奠定了基础。中英第二次战争之后，于1858年制订了一个协定价格表，抽取百分之五的从价税，价格表每十年可以修改一次。但实际上从1858年后只修改过两次，一次是1902年，一次在1918年。[①] 即使修改也只不过是一些协定价格而已，百分之五的税率保持不变。税率的修改几乎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中国同除英国之外的12个国家订有最惠国条约，所以如果要修改关税势必要13个国家全部同意。

外国列强常把“门户开放”说成是医治中国的万灵药，但千万不要忘记“门户开放”并未给予中国人海关自治，海关仍然把持在其他主权国手中。[②] 海关制度是根据1842年的条约制定的，但这一条约却不像其他的通商条约有时间限制，或是有废除的条款。列强要将中国作为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低关税正合其意，因此没有积

---

① 原注：华盛顿会议曾决定过一次修改。

② 原注：如果你居住在一个盗贼把持着镇委会的小镇，他们极有可能坚持要求门户开放，但你也许还会认为这并不过分。这就是中国夹在列强中的处境。

极性去修改。过去，我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那么强迫中国也实行还算替自己说得过去；但其他12个国家却没有这种借口；并且我们现在通过了《保护工业法案》，已抛弃自由贸易政策，也没有什么借口了。

进口税率是如此之低，中国政府要得到更多的税收，只能对出口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最高税率。这样做自然是妨碍了中国的商业发展，而且很可能是一大失误。但中国政府急需钱款，也难怪会视税收为必不可少了。

中国还有另一种关税体制，主要是继承自太平天国，即在各重要关口设置国内关税壁垒。国内贸易也采取这种做法。但外国商人只付子口半税，那么在条约口岸往来内地的货物就可免去国内关税。子口半税往往较国内关税低，因而外国商品得益匪浅而国货深受打击。国内进口税制自然不好，但沿用已久，且是国家财政收人必不可少的来源。中国主动提出废止国内关税，而全面提高进出口税，对此英日美都表示赞成。但是，其他10国的首肯也不可缺少，而他们未必都愿意点头。因此这种旧制度的存在并非全是中国政府的错。国内关税都被各省当局收取，他们经常截留关税，为私养军队应付内战之用。中央政府欲根除此种弊端，但无力为之。

海关的管理权只有一部分在中国人手里。海关的最高官员称为总税务司。依照条约，如果中英贸易超过任何其他的条约国，那么总税务司就必须由英人担任，而他的下属则都由他委派。1918年海关共有7500人，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各方人士一致认为第一任总税务

司赫德爵士[①]是很尽职的。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海关制度是很值得讨论的。总税务司由中国人委派，当然可以选一个对中国有同情心的人。中国的官吏大都腐败懈怠，要想建设新式的机构，由外国人来管理是必要的。如果外国管理者对中国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外国负责，那么他的管理就能够起到教育作用，而且有助于把中国建设为一个高效的国家。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人那里获得切实而理智的知识，而又不成为其奴隶。效法西方而设立的海关制度在初期是值得大力推广的。[②]

除了受条约束缚之外，中国的关税自主也还有许多限制。大部来自关税的税收都成了各种借款以及赔款的抵押，所以关税的支配不能仅从中国人的利益来考虑。再者，在现在的无政府状态下，海关当局承认或不承认一个事实上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局。（中国的北方没有法理上的政府）。目前，海关税收被截留在南方，而且还人为地制造破产。外国公使守旧成性，

---

① 译注：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字鹭宾，1835—1911），英国人。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旋入外交部，翌年奉派来华。曾在宁波、广州任翻译，后又在中国海关任职，确立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1906年归国。赫德在中国时不仅控制海关且插手中外交涉。清廷授其太子少保的头衔，故有"赫鹭宾宫保"之称。赫德的文章收集在论文集《"这些从秦国来"：中国论集》（1901）里。1975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等编辑出版了他1868年至1907年给金登干的信，名《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两卷）。

② 原注：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威灵顿·葛的一篇文章，作者在华盛顿指出：应该允许中国恢复关税上的财政自主权。葛先生并没有涉及海关的管理问题。然而，《泰晤士报》却推測他的目的是想让中国人来控制海关，因为海关能提供收受贿赂的机会。我致信《泰晤士报》，指出他们混淆了管理和关税这两件事。但他们既没有刊登我的来信也没有登其他人的以正视听，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误言是故意为之的？

形成了国内改革的巨大障碍。这就意味着：政府若想严肃认真地进行彻底的改良，那么它就不太有希望享受到海关税收，而这种财政上的障碍又将给重建带来困难。

盐税的情形也差不多，也是各种外债的抵押品。为了使抵押品能被接受，各有关国家坚持要由外国人担任主要职位。与总税务司一样，盐务稽核所会办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其他情况同关税一样。

关税和盐税成了中国所借各种款项的抵押品，且由外国人管理着，列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指手划脚的机会。至于他们是怎样利用这种局面，读一读 1922 年 1 月《泰晤士报》所载的三则专电就可以知道了。

1922 年 1 月 14 日，《泰晤士报》刊登了北京通讯员的一封专电：

> 中国这个国家能够清偿债务。外国人大笔一挥，政府就能得到一大笔进款，而若没有外国人的挥笔则又会陷入完全的破产境地，这事想来实在奇怪。尽管中国内乱不断，政治纷争无休，但关税收入一直保持增长势头，而去年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100 万镑。华盛顿会议允许的增加关税，这将在几年内偿清全部内外债，政府可以自由地支配那笔丰厚的盐税。现在困难的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政府来托管这笔资金。而要排除这样的困难，目前尚无前景。

我妄加猜想，《泰晤士报》认为如果清朝复辟，这个

困难就自行消失了。

至于“丰厚的盐税”，这里有两份北京通讯员给《泰晤士报》的专电（分别刊于1月12日和23日），从中可得知造成北京政府的破产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第一份专电（发于1月10日）如下：

> 长江边的镇江盐务收税所发生的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中国今日的情形。效忠中央政府的那部分海军——有更好的装备的那一部分早已投降了广东政府——派了一队战舰到盐务收税所，并且通知北京政府，如果三百万元（约合40万英镑）的欠饷不立即发付，他们就从盐税中扣除。同时，长江上的运盐船只也不得通行。有关公使馆致同文通牒给北京政府，警告他们有必要疏理交通，保证外国收税者行动自由。

第二份专电同样有趣。全文如下：

> 干涉盐税的问题日益严重。我10日电文中提到的舰队现在仍然封锁着镇江附近的盐业运输，而在汉口又节外生枝地冒出吴佩孚的代表，竭力为其大权在握的主子攫取此项收入。于是英、法、日三国公使再一次通知中国政府，如果不停止这种不合规范的做法，他们将不得不独立采取行动。因为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借款”是以盐税为抵押，插手由外

国管理的盐务侵犯了借款条约。全中国各地，有的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政府管辖，当地的督军常常截留盐税，实际上造成外国人控制的盐务总收入减少，但两者的差额仍然很大，而且外国人的抗议也无济于事，因此有关各方认为不妨缄口默许。但是，长江两岸外国海军势力所能及的地方，督军不敢染指，这又是另外一桩事了。华盛顿会议采取了一个友善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将来列强似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据此看来，目前的情形是十分有趣的。考虑到梁士诒内阁遭到广泛的反对，以及对目前盐税谈判的干预，以盐税为抵押的 9000 万元（约合 1100 万镑）贷款已经取消了。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渡过这个难关，在 1 月 28 日时仍然不会得到解决。

列强人为地制造破产，然后又对动荡的政局加以干涉，这真是一场高明的游戏。华盛顿会议却意图加以干预，那真要悔之莫及啊！

中国人咎由自取，不能产生廉洁干练的政府官员，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当官的必须供养他的亲属，如果要为官清廉，肯定要放弃孝道。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打破。“少年中国”都知道这一点，或许二十年后，中国官员的廉洁程度不在欧洲官员之下——这不是奢望。但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一定要同西方平等交往。如果我们一味地坚持唤醒中国人

的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在印度和日本所做的那样，中国人会开始认为他们与欧洲有不同的只是比欧洲更好。这种想法比欧洲人的成见更有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而一旦这种想法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想在中国谋取好处的日子就走到了尽头。

本章已简单地提及西方国家脱离日本在中国能有什么作为。但是，日本的入侵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前，需要略述一下近代日本的进程。日本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殊产物，我不愿意中国将来也走上这条路。在讨论日本之前，先要简要地介绍一下现代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状况。如对此不了解则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无从理解了。

第四章

现代中国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颇为特别，以人口和资源来说是世界上头号大国，但以现在的实力来说却是世界上的末流国家。“华盛顿会议”已经将由这种情况而引起的国际问题放到世界政治的首位，将来到底怎样解决，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原则是任何明智的解决方法都无法忽视的。这些将在以下几章详细谈及，但也不妨在此稍作讨论。一、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而我们却大有将它毁坏的危险。二、世界列强大多以中国人管理不善为借口而大肆侮辱中国，但其实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海陆军力量的薄弱。三、世界列强中，与中国最友好的是美国，最不友好的是日本。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美国更远大的利益考虑，既然美国只是支持中国的自由而不侵犯日本的自由，那么我们现

在不再支持日本而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是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四、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列强不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还是在民族之间。但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在这些开场白之后我现在转入本章的正题，谈一谈当今中国内部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帝王制度延续了四千多年，仅仅在十一年前才改为共和制，其中原因很多。中国立国三千七百年之久，到了 1644 年，被满族人攻取，一个从北方来的好战的入侵者登上了龙座。清廷百般利诱汉族服从他们的风俗：男子结辫，女子放足，但没有成功。于是，过了一段时间采取一种圆滑的折衷方法：男子蓄发结辫，女子缠足如故。这样等于在原来的陋习之上再加陋习。这种互相让步的典型做法，中国与英国十分相似。

没过多久，满族被汉族同化了，只有服饰和礼仪还能将他们区分出来，汉族虽被征服，但他们内心仍旧充满了敌意。从 1840—1900 年，清廷屡屡与外国交战，直至最后的庚子年间，皇家威严扫地，有识之士都看到有必要向欧洲人学习。太平天国运动历经十五年之久(1849—1864 年)，辛博森称人口因此减少了一亿五千万，运动造成的惨重损失几乎与“大战”相同。有很长一段时间清政府差点无法平定这场起义，虽然最终平息了(在戈登的帮助下)，但却元气大伤。甲午战争(1894—1895 年)中，中国被日本打败，义和团运动(1900 年)之

后，中国又遭到列强的报复，这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一个更好的更现代化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濒于崩溃的帝王之家。但中国的事情一向进展缓慢，从庚子年后又过了十一年革命才爆发。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较为和平的革命，与 1688 年的英国革命[①]相似。这次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逸仙（现为广东政府首脑）为拥护共和制的人所拥护，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当时北方效忠于皇室的军队很有可能平定革命党，然而其统帅袁世凯盘算着更如意的计划。他以取代孙逸仙担任第一任总统为条件与革命党媾和，承认共和。自然，袁世凯得到了各国公使的支持，因为他是信奉铁血政策的所谓强人，不会被民主和自由的言论引上歧途。在中国，北方军队崇尚武力，而南方军队则更笃信自由。袁世凯将北方军队训练成新式军队。好功名、用权术，凡是能讨得外交使团信任的手段，他都具备。应该承认，从他死后中国政局的动荡来看，他所推行的政策并非一无是处。

立宪会议制定了临时约法之后，就过渡为正式的国会。国会于 1913 年 4 月开幕，制定了永久性的宪法。袁世凯马上就因总统权限问题与国会产生了争执。国会要限制总统的权力，并且多数议员反对总统，但袁世凯手

---

① 译注：1688 年的英国革命即国会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政变的“光荣革命”。国王詹姆斯二世（1633—1701）企图借助法国恢复天主教和专制统治，与国会发生冲突。1688 年，国会中辉格党和托利党迎请詹姆斯之婿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1650—1702）出兵讨伐国王，詹姆斯逃往法国。次年，国会宣布威廉与玛丽二世（1662—1694）为英国国王和女王，并制定《权利法案》，限制王权，巩固国王的权力，确立了土地贵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由于这次政变不曾发生大规模内战，故又称“不流血革命”。

握兵权，制宪派如意料的那样被赶下了台。袁世凯还违背约法，向外国银行借款，对国会宣布财政独立，终于酿成了南方的反叛。但反叛不久即被平定。后来，袁世凯用各种方法使自己成了不受限制的元首，将自己的副官派到各省担任督军，把北方的军队抽调到南方驻扎。他的政权有可能持续下去。只可惜在1915年他想要称帝，然而这一次国人反叛成功，他便于1916年怏怏而终。

袁世凯死后，中国动荡不安，直至如今。大树既倒，他所派往各省的督军拒不听命于中央政府。他的军队在各地扰民。内战此起彼伏，但这些纷争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主张不同，而是由于地盘分配不均。虽然南北政府之间的对抗仍然存在，但这种对峙已经不再有多少宪法上的意义了。

各省或各省区的督军横征暴敛，反抗中央，搜刮地皮，截留税款（除了由外国人负责征收管理的部分，如盐税）。他们名义上受北京政府委派，实际上却在各省地盘上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在经济上陷于崩溃，无力支付军饷。士兵们就靠掳掠维持生计，督军有时也将不义之财分一些给他们。每当两派军队打仗而其中一派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扶持那即将败北的一方，以延长中国的内乱。当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重要的督军正在北京开会分配战利品。他们对总统和总理极其傲慢无礼，尽管后者在外国列强眼中还代表着中国。不幸的是，有名无实的政府还不得不让已破产的财政部筹一笔款，报端声称是900万元，让三位督军离京。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满洲督军张作霖手中，普遍传说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的这笔款子大部分是用来征讨当时还在闹

叛乱的蒙古，但没人认为他会进行这样一次远征，事实上从那时起他根本没有离开奉天一步。[1]

在南方又有一个迥然不同的令人尊敬的政府。广州一向是中国革命的中心，1920年秋，它将北方的军队赶走，组建了以孙逸仙为总统的进步而富有效率的政府。这个政府占有两广，一时似乎有统一南方的势头，但其前进的势头在邻近的湖南省为北方将军吴佩孚所遏制。它的对手称广东政府意欲征服和统一全国。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这是个应该得到进步人士支持的政府。杜威教授在美国的《新共和杂志》中叙述了广东政府的优点以及它受到香港、英国反对的事实。英国人之所以反对广东政府，一来是由于英国人不喜欢激进的革命，二来是《凯索条约》的缘故。《凯索条约》在中国是一项普通条约，实际上给予了英国独占广东的铁路、矿产的特权。这是与前政府签订的，尚待批准，但由于政府变更，无法履约。新政府与美国人较好。美国人香克与新政府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内容大致与我们签署的那项差不多。然而美国政府却不愿支持香克，而英国政府则大力维护《凯索条约》。此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尽管非常不公平却又是非常宝贵的让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而不是美国人，偏好古旧和腐败胜过充满活力和正直诚实。再者，就我所知，香克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而使条约过期失效。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最为可恨，希望中国富强的人们都祈祷这种局面早日结束。但夸大它所造成的祸乱或将

---

① 原注：1922年1月，张作霖来到北京组建一个奴性更足的政府，这个政府现已被吴佩孚下令解散。一场冲突发生在即。

其与欧洲的无序相提并论，都是错误的。不应该把中国比作是欧洲的一个国家，而应比作为整个欧洲。伦敦《泰晤士报》1921 年 11 月有一篇调子很悲观的文章，题为《中国面临的危险：十几个敌对政府并存》。而欧洲远不止十几个国家，竞争比中国更加激烈，并且军队人数更多，杀人武器更为精良。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爆发的小规模战争比同时期的中国要多。如果游历中国，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而且没有欧洲那样残忍，士兵们只为钱卖命，丝毫没兴趣弄明白打仗的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从整体来看比欧洲人更幸福。

很清楚，我认为若中国有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应当采用联邦制，允许各省拥有更多的自由。各省的划分由来已久，省界分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努力实行与我们英国差不多的宪法，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是总统而我们是国王。如果要实行非联邦制的体制，必须要人民同族同源，没有狭隘的地方感。爱尔兰不能与英格兰相容，即是一个反证。据我所知，当今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提倡采用联邦制，中央政府主要管军队、外交、海关。但想要化解军阀的势力是一件难事。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遣散军队。因此，向外举债以遣散、安置士兵的工作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很值得怀疑有哪个国家会借这么一大笔资金给中国而不向中国索取最后的这点独立。所以，人们希望中国不要过分倚助外力来解决这些麻烦。

众多的督军中会有一人成为最高统治者，然后他会走与立宪派交朋友的捷径，以此来巩固他的影响，这种局面并不是绝无可能。在中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要是把一个人的愿望往好里说，很有可能使一

个嗜武成性的军阀走上爱国的道路。目前中国就有两位举足轻重的督军，他们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张作霖和吴佩孚。张作霖是满洲的最高统治者，有日本作他的坚强后援，代表着中国最反动的一派。而吴佩孚则倾向自由，不久前在北京的力邀之下，这位能干的将军在长江和湖南大显身手，破灭了广州的希望。现在很难看出他将怎样与广州达成协议，尤其是因为广州政府已经与张作霖结成同盟，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他也许会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并想摇身一变成为立宪派以永久维系自己的权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尚有喘息的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也仅此而已。

中国除了通商口岸和少数矿区外，都处在工业化前的阶段。北京约有100万人口，占地面积很大，住宅多为平房，并且还留有天井的空地。城里没有电车、公共汽车。就我所见，全城只有三两根工厂烟囱。除了讨饭的、做买卖的、偷东西的和政府雇员之外，剩下的都是靠手艺吃饭的。他们的产品大都很精美，不像用机器生产的那样式样单一。但这些东西耗时长而报酬低。

全国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大米和茶叶是南方的主要产品，麦子和其他的谷物是北方的主要产品。[①] 南方雨量充沛，而北方的降水量只不过是不会让土地变成沙漠。我到中国的时候，正值1920年秋天，北京一大片地区因为旱灾而闹饥荒，情况同1921年俄国的大饥荒相似。由于俄国人对饥荒毫不关心，所以外国人毫不犹豫地加以救济。而中国人则相信这是天降之

---

① 原注：大豆正迅速地成为重要的产品，在满洲尤其如此。

灾，命该如此，就连那些死于灾荒的人也抱着这种想法。

大部分土地在小地主的手中。父传子承，土地分给每个儿子，所以每个人就只有仅供维持家人生计的土地。一旦不幸遇上降雨量少的年份，就会有不少人死于饥荒。如果引进科学的耕种方法提高产量，植树造林防止旱涝灾害，就能减少许多的饥荒。如果再兴建铁路、改善道路，就能促进粮食的流通，农民也就可以有更多的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出生率有估计的那么高，家庭人口还像以前那样多，那么中国人就永远没有解脱的办法了。有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①]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么任何改善的方法都只会使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土地分割成更小的一块一块，结果还是回到一样的贫穷日子。只有普及教育和提高生活水平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但普及教育需要有更完善的政府和足够的税收。此外，合格的教员的缺乏也是普及教育的一大困难。

欧洲文化中改变中国传统习惯的，除了战争，就是商业和知识这两方面。但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依赖武力而奏效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战争中打败中国，那么中国肯定不会开放门户，也不会接受西方的思想。但是我们以武力揭开与中国交往的序幕这一事实已逐渐隐去，各阶层的人们对外国人也不十分仇视了。虽然也有人认为

---

① 原注：然而，我们没有有关中国出生率或死亡率的准确数据。一些作者对出生率是否真的很高抱有疑问。我从朋友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得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伦诺克斯博士曾对 4000 户中国家庭作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每户家庭平均有 2.1 个孩子。该书所引用的一些调查结果也表明北京周围地区的出生率在 30 至 50 之间。在缺少数据的情况下，有关中国人口的推测必须谨慎地接受。

与白种人的交往是中国的不幸，找出这样的例子也并非难事。但很显然，那是些顽固守旧分子，偏执而又无远虑。中国人喜欢经商且好学，我们正是对这两点感兴趣。我们只要以最低限度的适当的态度与之相处，无论于私于公都能获得他们的好感。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就像同他们做生意能使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一样。

在中国的各通商口岸，欧美人住在租界。租界里街道平坦，灯光明亮，房屋都是西式建筑，店铺里陈列着欧美的商品。而在租界旁边往往就是中国人住的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布置得喜气洋洋，空气中弥漫着中国特有的气味。穿过一道大门，眼前又冒出一道；在兴致勃勃地领略了老镇的凌乱美之后，欧洲的清洁和赴宴般的端庄毫无美感，给人一种奇怪而又爱恨交加的复杂感受。在租界里感觉安全、宽敞、卫生；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别有风情，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人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在对造成贫困与疾病的原因作了必要的推断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当然这是指中国的男人，女人就不同了。

上海和天津是白人的大都会。初见上海，会让人想到自己何苦远涉重洋旅行到此。因为，这地方的生活与自己所习惯的没什么两样。通商口岸是洋人的势力中心，不仅在沿海地区有，在内地也有，汉口就是一个正好位于中国中心的港口。中国南北以长江为分界线，东西

以京广铁路为分界线，这两条线的汇合处便是汉口。京汉铁路是比利时和法国建造的，现在归中国政府。与汉口隔江相望的是武昌。不久将有条铁路从武昌铺到广州，但现在只有到长沙，等全线通车后，如果再将码头加以修缮，那么广州的地位将显得更加重要，而香港则将日渐衰败。

商业是各通商口岸的主要产业，但在长江下游沿岸和一些矿区已开始有了工业。中国的棉花产量很大，大多用手工方法加工，但也有为数不多的新式纱厂。如果从以低工钱降低成本这一点来看，英国兰开郡的产纱区的前途颇令人担忧：中国南方的纱厂离产地近[①]，气候潮湿宜于制纱，而且有取之不尽的吃苦肯干的劳力愿意长时间工作，所要的工钱又很低。这样低的工资在英国工人看来根本无法糊口。虽然如此，兰开郡并不担心这些。因为如果中国的工人得不到必要的文化和技术培训，得不到高的工资，那么中国的制纱业将无法对英国造成强有力的竞争。中国的工业处于初创阶段，和别的国家一样，这是一个不择手段和残酷的阶段。知识分子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让中国成为工业国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又不那么残酷，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两全其美的方法。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虽然旧式教育已逐渐为教

---

① 译注：兰开郡的棉花由美国输入。

授现代科目的高等教育所取代，但尊重学问的传统一如既往，博学之士的看法仍然能影响公众舆论。督军包括张作霖在内大多是土匪出身①，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对这些不以为然，但这也正是他们的势力不能强大起来并保持稳定的原因。“少年中国”——在国外或中国国内的现代学校里接受教育的人们——其影响远比不那么尊重学问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广大。这大概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现象。受新教育的学生日益增多，他们的眼光和抱负令人钦佩。或许再过十年，其势力就足以改造中国——如果列强不采取激烈手段而让这十年悠悠而过的话。

了解一下“少年中国”的眼光和潜能是十分重要的。我与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交往甚多，在此对他们的思想作个大概的介绍。依我之见，人们可将“少年中国”分为两代：第一代年龄较长，他们艰难地与儒家的偏见抗争，虽然摆脱了束缚，但难免有孤独感；第二代年纪较轻，新式学校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在他们反叛家庭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许多思想开放的人随时都给予同情与鼓励。年长的一代年龄大约在30岁至50岁之间，他们内外冲突交加，奋斗经历同达尔文、米尔时代的唯理主义者相似。他们历经磨难，摆脱了幼时所受的教育

① 原注：我在此是复述大家——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所告诉我的一切。濮兰德先生把张作霖描述成一个儒雅的孔教徒，这是他在《中国、日本与朝鲜》第104页上表明的观点。与科尔曼在其著作《揭开远东的面纱》第143及第146页的所言两相对比，这种看法只不过是濮兰德先生的一己之见。《泰晤士报》最近刊登了诺思克利夫爵士对张作霖的一次访谈，但是他也不能断定张作霖有多少文学修养。

而投身新科学、新伦理的怀抱。想象一下，若要让古罗马的哲学家浦路泰纳斯去崇拜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其碰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这种设想能让你了解到这些中国人在短短的时间里穿越几个世纪的时光而成为具有西方思想的人，其历程是何等艰难。所以难免有些人形色倦怠、体力不支、缺乏创造力，但实际上他们思想的革命已告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对他们的神情并不会感到惊诧。

我们不要以为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仅仅是在模仿。这只不过是二流中国人尤其是基督教徒的作为，一流的中国人并非如此。一流的中国人虽然已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对此仍抱着批判的态度，为人处世还是中国人的方式。他们心胸坦荡，相信道德感召的力量，而对于工业革命则无动于衷。他们如果觉悟到一种意见的重要性，就会大力宣扬它的可信之理；他们不会买下报纸的头版去登广告，或者在铁路沿线张贴布告，鼓吹某某的观点最有道理。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尤其是美国；他们也从来不会像对待肥皂泡那样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观点。他们既不像西方人那样残忍，也不像西方人那样爱瞎凑热闹。虽然他们抛弃了将自己熏陶长大的种种陈见，暂时也还没有接受新的一套，但他们能保持思想的自由，无论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判别其中的是非曲直。

然而，年纪较轻的一代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更具优点。由于经历的磨难较少，因而他们精力充沛，更加自信。他们同样秉承了前一辈先驱者们的正直和诚实，而且还更加坚定了在社会上发挥效用的决心。这也许是年

轻人的天性，但其实不仅如此。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往往较早就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所以在吸收这些新思想时并不觉得困难，同时不像年长的一代有精神上的冲突。而且他们开始时便从中国老师那里学习到西方的知识，因而这个学习过程也较为轻松。虽说即使是年纪最小的学生也有一个顽固的家庭，也要反抗家庭的苛求，也要对长辈俯首听命，尽管中国人的尊老敬老实在过份，但他们所碰到的困难没有他们的前辈那么艰巨。这些年轻人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如果再有一些经验和智慧，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引导中国人的舆论朝着它应该走的方向迈进。

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在现代工业社会到来之前这或多或少是有点道理的。卢梭或者约翰逊博士，广义地说，在边沁[①] 的学说赢得崇奉者之前，所有的人们都有可能持这种观点。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则毫无用处。战舰也许可以算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比如我们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飞机上投下的炸弹所释放的毒气能毁灭一座城镇，我们虽然感到身上一阵战栗，但这种战栗其实是对科学技术感到欣喜。科学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它说："尽管你会杀死我，但我仍然信任你。"于是，它便杀死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缺点，但

---

① 译注：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道德及立法的原理》、《惩罚与奖励的理论》、《本务论或道德科学》等。

他们有相反的缺点，认为良好的用意是唯一必要的。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的森林顾问——美国人佘佛西[1]于1919年1月在英国大使馆作题为《中国森林的一些状况》的演讲，说中国现在许多荒芜的土地都适宜于种树，完全没有必要从国外进口木材以作铁路上的枕木之用，如果在各大河的源头山坡之上植树造林，那么就可以避免河流泛滥成灾。他要证明的道理即便不是森林学家也都知道。但是，由于植树造林并不能激励中国人道德上的热情，所以要让最愿意改革的中国人对此有兴趣是很困难的。陵墓四周松柏环绕，因为孔子认为陵墓周围应当种上一些树；如果儒教衰落了的话，那么连这些树都会被砍伐。但是，那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学生们在我们的大学里潜心研究政治理论而对于植树造林这样的小问题就比较轻视。他们对议会上下两院间应有的正常关系了如指掌，但等回国后却看见督军解散两院，这种凌驾于议会之上的统治方式在我们的课本中没有讨论过。我们西方的政治理论（如果有的话）只适用于西方，而我们的森林学却适用于全世界。但中国的留学生急切想学的正是我们的政治理论。同样，学习制造方法或许是很有用的，但中国人偏好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而实际上理论经济学只适用于工业已经很发达的国家。幸好在所有这些方面近来已开始有明显的改善。

中、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差别就在于科学的思想。中国人，即使是最先进的分子，也在向白人民族（尤其是美

---

① 译注：佘佛西（William Forsythe Sherfesee），曾于1912年至1928年间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林业顾问，并著有一些关于中国林业的文章。

国）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还没有想透彻一般人民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有多大胆就能干出多大的坏事，却只做非做不可的好事。我们的道德与中国人的道德并非没有区别，区别就在我们的道德更恶，因为我们的精力更充沛，因而每天都能作下更多的恶。所以，我们可以教中国人的并不是我们的道德，也不是治国箴言，而是科学与技术。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真正面临的问题是学习西方人的知识而不要染上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

也许我所谓的"机械的人生观"含义还不十分清楚。我指的是一种同等地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观点；这种观点使得上述种种有别于中国人的人生观，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害的。机械的人生观把人看作一堆原料，可以用科学方法加工处理，塑造成任何合我们心意的模式。在有这种想法的人看来，当务之急是培植个人的意愿，哪怕牺牲感觉也无所谓。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并不为帝国主义所困扰，但却容易成为布尔什维主义与基督教青年会争取的对象。由于布尔什维主义而信仰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专政，由于青年会而信仰冷水浴和哑铃。但西方的共产党和青年会只有在把其他人视为潜在的皈依者时才不轻视他们，认为只有待他们所传播的主义盛行之后人类才会有进步。他们都信任政府而反对自然。我虽然称这种眼光为机械的，但它实际上和宗教一样古老，只不过近代的机器给予了它一种更具毒性的新形式。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在著作中抗议这种观点，他的徒弟庄子则用寓言来描绘：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

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

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

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虽然以老子为创始者、庄子为主要宣传者的道家其地位不如儒家，但《庄子·马蹄》寓言的精神却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残暴人生更文雅、更宽容，更多反省。中国人观察外国人就像我们在动物园里观察动物，看其是否"饮水，翘足而陆"，往往是发现特别的习性就大以为乐。就像我们不会让动物园里的猴子穿衣裤，他们也不会学基督教青年会要改变外国人的性情。中国人对待本国人也是同样的宽容。中国改为共和之后，不仅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把皇帝杀掉，相反还保留其称号和皇宫，每年给 400 万元(约合 60 万镑)。皇帝至今

还保持旧时的官吏、太监和朝仪，但没有丝毫的实权和影响。中国人与人谈话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的言论。他这样的做法也许意味着讥讽或赞扬，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充满了善解人意和淡淡的幽默。我的一位北京友人向我展示了许多幅画。画中各种鸟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苍鹰捕雀，鸷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这些画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你可以发现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如此。这种性格与尼采的正相反。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外国人对此竭尽打击之能事，但这种性格实在是无上的美德，可惜在我们西方世界绝少见到。中国人的这种性格再加上他们对美的敏锐感受，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家。我们恣意而无情地伤害中国的精美之物，只不过供那些粗鄙的资本家以粗俗的快乐而已。所以，我每天都希望西方文化的宣扬者能尊敬中国的文化，韦利先生翻译过一首题为《商人》的中国诗歌，在诗中所描述的生活侧面中，中国人都比我们高明，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比我的准确：

> 商人吹嘘他们的技艺和奸诈，
> 但在哲学上却像小孩一样幼稚。
> 相互吹嘘巧取豪夺，
> 忽视了考虑肉体的最终归宿。
> 对于黑暗的主宰者他们应该知道什么，
> 谁曾在玉盏里看到了广大的世界，
> 通过顿悟看清了天堂和俗世：
> 在变化的战车上驶入不变之门？

我希望我能够期待对“黑暗的主宰者”的尊崇得以进入我们这些西方文化崇拜者的心灵。但由于这不太可能，因此有必要为解决远东问题另想办法。

第五章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与之关系最重要的外国是日本。要明白日本在中国所占的地位，必须要了解一下日本的历史，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日本历史的有趣特点之一，那就是同样一些力量和思想会延续好几个世纪。日本的历史实际上是始于一次与 1867 年—1868 年的明治维新差不多的大化改新。公元 552 年，佛教从朝鲜传入日本。就在同一时期，通过同一个途径中国文化也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其知名度大大超过前几个世纪的零星交往。这两种新东西大受欢迎。608 年，两名日本学生前往中国留学，他们的后继者此后便接踵而至。日本人是懂得尝试的民族。在全国推广佛教之前，先让一两个最显贵的朝臣去信奉，以此验证他们信奉佛教后是否比传统的神道教徒更幸运。几经波折之后，佛教最终被朝廷采纳，而且地位

比神道教更显赫。但神道教并没有受到排挤，直到13世纪它还仍然是农民阶层的主要宗教。值得注意的是，直至16世纪，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仍看重神道教胜过佛教。神道教的现代复兴也许是由于农民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不声不响，却一直信仰神道教。但如果说对历史上的人物的影响，佛教远胜于神道教。

1867—1868年王政复古的目的是恢复公元645年时的政治；645年时政治的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政府制度；那些建立古代的制度的人，其目的究竟怎样，我不敢说知道。然而情形可能是这样的：645年前采邑盛行，内乱不断；天皇徒有虚位。武士专权，致使政府无足轻重。在接触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后，日本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不仅中国的宗教道德，就是中国的政治也应该模仿。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所以天皇就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中国的皇帝不管是否精力超群，都是真正的超人，所以天皇也应该这样。

日本由于受中国的影响而产生了645年的大化改新；其后又由于受欧洲的影响而产生了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詹姆斯·默多克这样描写两者的相似之处：

> 1863年夏天，长州的四个年轻人在善良的苏格兰朋友们的帮助下偷偷登上了英国轮船，这几个苏格兰朋友非常同情他们求学欧洲的志向。这些朋友大概并不知道在这四人中就有数月前在御殿山焚烧英国使馆的首要分子，而且他们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四个

年轻人的真正使命是去掌握西方文化的秘诀，把西方野蛮人逐出日本的神圣国土。伊藤王子和井上胜子爵——他们也是这冒险四人组合的成员——经常谈起他们到伦敦，看到这些自己一向轻视的西方野蛮人后便立刻感到失望。在返回日本途中，他们立刻成为一种新主义的倡导者，如今大日本在世界强国中骄气凌人，这与他们的大力宣扬有着很大的关系。

尽管这样，两位 608 年到中国的留学生的"功绩应该在他们之上。因为在 1868 年的革命中，这次运动的领袖们还回过头，去 645—650 年那段时期找到了大量的启迪，而那时期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就是那两位国家博士。"

从政治的角度说，日本在 645 年时的事件与法国路易十一[①] 和黎希留[②] 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同，都是压制贵族，尊崇皇权，以公正的法律取代纷乱的武力。这场运动因其倡导者而被称为王政复古，这恐怕与 1867 年的明治维新具有相同的意义。1867 年，大政归还，这是复古，但同时引入了西方文化，这是维新。同样，645 年发生的事也是归政于君的复古和传播中国文明的改新。所以，总的来说，两者都兼有守旧和改造的倾向。

此后，日本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有两种对立的力

① 译注：路易十一世(1423—1483)，1461 年—1483 年在位。
② 译注：黎希留(1585—1642)，法国枢机主教和政治家。

量在争夺人心：一种是来自中国的施政思想、文明和艺术，一种是日本自己的封建制度、宗族政府、内部夺权等倾向。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与欧洲中世纪时教会与贵族的冲突颇为类似，教会代表了来自罗马的思想，而贵族却想保留古代条顿人的生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城堡卡诺沙向教皇格列高里屈服，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表示悔过，这些都代表着文明对粗鲁力量的胜利；而在日本的历史上，我们也将不时看到类似的情况。

645年之后，天皇政府真正执掌大权达数百年，但权力渐渐落人武士之手。政府的权力虽然没有了，但仍有一定的财力，仍然代表着日本最先进的文化：研究中国的文学、奖励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朝廷显贵（他们仍然与那些封建领主大不一样）衰败堕落，不堪一击。他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根本无法治理国家。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世纪的教会大不相同。虽然欧洲封建贵族的能力比教会大，但并不是说教会本身没有能力。所以，欧洲的教会总是战胜代表世俗力量的王公贵族，而日本的情形却截然相反，天皇与朝廷的权力江河日下，直到大政归还为止。

日本人有一种偏执，喜欢把政府分离为“真正的”和“名义上的”两种。“真正政府”与“名义政府”的区别在于后者抛头露面，前者大权在握。先是有天皇让位给幼子，自己出家为僧，但仍操纵政权；后有将军手握兵马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夷是指

虾夷[1]，是日本的土著。第一个获“将军”称号的是源赖朝，于1192年为天皇所赐。但不久，将军也像天皇一样几乎成为傀儡。按照传统，将军的称号只为源氏家族所有，但实权却在摄政手中。摄政以将军的名义统治全国。到16世纪末，源氏家族的德川家康成为最高军事首领，源氏这才重又成为能行使实权的将军。德川家康及其后裔世袭将军的职位一直到明治维新时将军一职被废除为止。然而，明治维新并未废除“真正政府”，它仍然隐在“名义政府”之后大司其职。现在的总理及其内阁表面上虽然是日本政府的代表，但真正的政府则是元老及其继承者。我将在下一章详尽讲述这些人的作用。

日本人之利用佛教就像条顿人之利用基督教。这两种宗教原本的主旨都是教人超脱凡世，漠视政治、政府和金钱而看重来世，都提倡温顺平和、逆来顺受，所以都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未开化民族的尚武本性。在日本，许多教派冒了出来，它们所宣扬的教义与正宗的大乘佛教大不相同。佛教成了一国之教并且带上了嗜武的色彩。许多著名寺院的主持成了重要的封建领主，寺院里的和尚组成了随时准备战斗的军队。在日本的历史上，围攻寺院、与和尚打仗成了时有发生的事。

日本人在与西方传教士、商人交往了大约一百年后，决定除与荷兰人保持有限的通商以外，对其他外国人一律关闭国门。葡萄牙人最初是于1543年来到日本的，最后受到排斥是1639年。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很有助于了解日本。葡萄牙人带着基督教和枪炮而来，

① 译注：虾夷，即日本阿伊努人。

日本人由于喜欢枪炮而对基督教采取了宽容态度。当时，日本根本无所谓中央政府，大名之间时有战争爆发。其中地处西南的九州岛更是山高皇帝远，所以就成了葡萄牙人最初的落脚点和最为活跃的地方(长崎就处于该岛)。葡萄牙人从澳门用大船把火绳枪、大炮和耶稣会会员运来，同日本做生意。虽然发现葡萄牙意在传播基督教，但一些大名为了同他们做生意，得到他们的枪炮，允许自己接受耶稣会的洗礼。那时候的葡萄牙人真正热心的是让更多的人皈依上帝，而不是把生意做大。之后，日本人虽还愿意保持贸易往来，但对传教一事却渐渐厌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当然不能对自己的神父坐视不管。然而，如果当初葡萄牙人能保持教皇颁布的特许权的话，一切都会顺利进行。他们独享的通商权与传教权是统一的。然而，从1592年开始，从马尼拉来的西班牙人和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随西班牙人而来的旦米尼克派传教士、圣芳济修会的传教士同随葡萄牙人而来的耶稣会教徒，即使在受到异教徒的迫害时仍不忘互相攻击。他们互相给对方所安的罪状日本人都信以为真。而且当日本人看到西班牙辽阔的版图时，不禁担心西班牙也来入侵而危及自身的主权独立。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从马尼拉航行到亚卡布鲁哥[①]，途中停泊在离日本海岸不远的地方，当地大名坚持要派人将船拖到他们的海港，暗中命令他们将船误引搁浅，他声称要买下这一船价值60万克朗的货物。当时，丰臣秀吉已手握大权，觉得一个大名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钱未免太

① 译注：亚卡布鲁哥，墨西哥西南部一城市。

容易了，于是派了一个名叫增田的人去与西班牙的船长会面。这位船长发现同增田论理是徒劳无益的，他于是就用威吓的方法：

> 他拿出一张世界地图，给增田看菲利浦二世的辽阔版图。增田问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受一个人的统治……他就毫无顾忌地回答说："我们国王派遣传教士到想要征服的国家，等到传教士有所成就后再派遣军队，再加上那些新教徒的里应，我们的国王不费什么力就大功告成了。"

由于当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同是菲利浦二世的臣民，葡萄牙人也因这番话遭罪不少。加上与西班牙人在打仗的葡萄牙人开始同日本做生意了，他们向日本人传授他们对付耶稣会派、旦米尼克派、圣芳济修会和罗马派教徒的办法。伊丽莎白时期，一位名叫威尔·亚当斯的船长由于沉船在日本登岸。日本人向他打听西班牙的情况，他就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无敌舰队的故事。当时日本人对于枪炮及其制造方法已很熟悉，他们认为值得从西方学习的仅此而已。

这个时期，日本三位伟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执政，他们统一了日本，结束了藩侯的半独立状态，效力于国内的和平，一直到大政归还，约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因此，在外国人及其传教这个问题上，日本中央政府这才有能力执行自己选择的任何政策。耶稣会和修道士在日本约有30万信徒，多数集中在

九州(这是丰臣秀吉最后征服的地方)。九州一方面由于信教的缘故,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表现出不忠于中央政府的倾向。1867 年反抗幕府的叛乱就起于此岛。萨摩族是九州的主要民族,从明治维新以来,除了1877 年叛乱时外,一直掌握着政权。所以说,16、17 世纪中发生的多次反叛,有多少是基督教的原因,有多少是仇恨中央政府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德川家康决定在不影响通商的前提下对教徒采取严厉手段。他的继任者更加仇视教会而且更不热心于通商,在 1637 年的那场失败的反叛后,教徒几乎被斩净杀绝,同时政府规定了各种严厉的条件禁止与欧洲人通商:

> 只要太阳还温暖着大地,基督徒休想踏上日本,要让世人都知道无论是菲利浦国王本人,还是基督教徒的上帝,甚至释迦牟尼违反这一禁令,他们都得当心掉脑袋。

日本政府用残酷的手段对付教徒并非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是担心西班牙侵略日本而传教士作内应。即使没有外来干涉,教徒们联合起来反抗中央政府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政治上的控制与经济侵略是合而为一的,如果没有亡国的危险,日本人还是愿意通商的。但他们过高估计了西班牙的兵力,其实不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的军队比欧洲强许多。因为日本人已经学到了枪炮的用法,且又善于用兵。京都的人口大约有 100 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日本的总人口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

家都要多。所以对于欧洲派到日本的军队，日本都可战而胜之。相反，日本能够按丰臣秀吉的计划征服马尼拉。当然，日本看到世界地图上南、北美洲都属于菲利浦二世难免心有所惧，而且他们还暗中派人装作教徒到欧洲去觐见教皇，参加了西班牙最秘密的会议，掌握欧洲帝国主义的所有阴谋。这些间谍回国后将这些情报报告政府，更增加了日本政府的恐惧，于是决定断绝与白人的交往。虽然有很多人对这条政策不以为然，但我始终不认为这是失策。

此后，日本一片太平，国势停顿不前达二百多年。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利率领兵舰到达日本，日本人这才发觉过去的那些枪炮已没有用了，必须再向西方学习，于是不得不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在没有学成之前却又必须经过另一个闭关的时期。

第六章
现代日本

现代的日本不仅在当今时代而且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个民族能把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它那别具匠心的计划完成得如此完满，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现在的日本与1867年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心中所设想的没有什么差别。美国崛起，俄国衰落，中国成为共和制，世界大战将欧洲搅得一团糟。这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多出人意料。但就是在这样的大变迁之中，日本的政治家却更忠实地遵行明治时期定下的政策。日本的目的便是帝国的巩固和扩张，这足以使倡导者和追随者激动不已。要达到此目的，日本制定出了一种新的政策，兼收使现代美国和迦太基战争[①]时

---

① 译注：公元前264—241年，218—201年，及149—146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有过三次战争，最后导致迦太基的倾覆。

的罗马强盛的种种缘由，并且吸收了战前德国的物质建设和科学知识，以及《约书亚书》里希伯来人的生活观。

自 1867 年以来，日本的变化相当惊人，但更惊人的是这种知识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却没使宗教、伦理观念有任何改变。然而，这些变化的趋向却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科学理应朝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科学知识的传播却与崇拜天皇这一日本文化中最古老的特征同步增长。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东西方文化的调和呈现一种特殊的状况。从表面上看，日本这个国家的东方属性远胜于"西方属性"，但实际上却运用着西方一整套方法高效地治理着国家。日本文化中东西融合程度很难说究竟有多少。不过，容易激动却是他们生活中的某种勉强而做作的性格，这或许只是暂时的现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政治为两股潮流所左右。一股与西方各国相似，尤其与大战前的德国相似；另一股起源于封建时代，与 1745 年前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相似。我并不想记叙近代日本的历史，只想粗略地谈一下左右这个国家的局面的种种势力，并加以适当的解释。关于日本政治的书籍很多，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麦克拉伦的《明治时代(1867—1912)的日本政治史》(艾伦与昂温，1916)一书。而就描绘明治时代早期的日本画卷而言，拉夫卡迪奥的《解读日本》自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自从像樱花般灿烂的贸易往来失去其新意后，作者开始意识到日本人性格中的许多阴暗面。

1867 年前的日本是各藩的联合，中央政府为将军所控制，将军是本族的首领，但他对那些更有势力的家

族就未必指挥得动。历朝历代的不同时期，将军经常由不同的家族出任，但 17 世纪以后为德川家族世袭。在整个德川时代，除了最初的几年，日本一直不与西方交往，只同荷兰保持着极为有限的贸易。近代以来，日本有两方面大的变化：一是被迫与西方通商；二是权力从德川家族转移到萨摩、长门两家，他们从那时起一直统治着日本。如果对封建制度下的日本不稍作了解便无法理解日本的政治和可能发展的方向。所以，先要阐述日本的内部情况，然后再谈它在国际上的地位。

从 1867 年开始，从名义上自 12 世纪末以来就被将军凌驾于上的天皇重回权力宝座。在此以前，平民百姓一直视天皇为神圣，但他无权在国家事务中发表意见，将军不把他放在眼里，若行为不当有时甚至要遭到废黜。天皇还经常入不敷出。

> 西方与日本交往的最初时候，天皇显得如此的无足轻重，以致于耶稣会教徒几乎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们似乎把他看作是日本的罗马教皇，除了一点：天皇没有野心追求一时的权力。荷兰人习惯上把将军称作陛下，在他们每年一次从田岛到江户的朝圣途中，京都（天皇住的地方）是他们唯一可以无拘无束地仔细玩味的城市，这大概是德川家族授予外国人的特权，向他们表明皇室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美国海军准将佩利把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亲笔信交给了将军，西方各国的大使都与幕府交涉，没有人因此认为这不是在和天

皇接触。

> 从这些事实来看，日本官方的历史学家所提的在这一时期，天皇为在天之神特别保护的说法似乎不足为信。幕府和皇家的关系也只能借助于其他的解释。

简要地说，许多因素合在一起促成了王政复古运动，史学家以为，10世纪的时候天皇就曾经亲政，因此他想恢复旧制；爱国者认为将军屈服于白人的压力，签订通商的条约；西部各族向来不愿听命于幕府。各种因素合在一起终于促成了王政复古运动。麦克洛伦又写道（第33页）：

> 王政复古运动带有一定沙文主义或者说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也许可以用"尊王攘夷"的口号来概括。因此，荷兰学者在日本倡导科学的结果却是被驱逐。但也不能这样匆忙下结论。"攘夷"的呼声是针对佩利和其他外国列强的公使，并非不愿学习外国的军备和战术。事实上，1853年以前，萨摩、长门以及其他西部各部族制造枪炮、练习枪炮已有多年。由此来看，欧洲的科学发明被提倡复古运动的领袖全力引用。

上面这段文字一语中的地概括了使近代日本奋发图强的实质所在。

王政复古是一场守旧甚至是反动的运动，这一点西

方人还未完全认识到。默多克教授在他的权威性著作《日本史》中写道：

> 欧洲的作者、评论家在谈到日本明治维新轰轰烈烈的情况时，有许多谬误。即使是其中比较明理的，给出的谜底也不过是浮浅而简单的公式“模仿”。但是，日本人仍然保留了原来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家族为本位而不像我们以个人为本位。另外，日本的行政制度，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同欧洲的某些制度都有些相似，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而不是刻意模仿、借用或改编的结果。1868 年德川幕府被推翻，1871 年封建制度被废除，政治家们必须给国家配备一套新的行政体系，但他们并没有到欧洲考察以寻求范本。他们只不过参照了一千一二百年前的历史，恢复了藤原镰定及其助手于 645 年创设并于以后五六十年间完善的行政制度。今天十位大臣所组成的内阁和他们所管理的各“省”及各“省”的官吏，是中国“八部”的翻版，这早在 7 世纪时就确立下来了。现在的行政制度确实是来自国外，但这并不是几十年前才借用和改编的，也并非全借自或改自欧洲，只不过恢复古代的制度，以应付眼前急需。

复古运动的结果是使萨摩、长门两族控制了天皇，将他拔高为他们抵制外国人（将军与之签订了不得人心

的条约)的象征，提倡国家主义，得到了全国的支持。他们的杰出领袖认准一种政策大力推行。到今天，日本已经从一个无法抵御外侮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废除封建，收权于中央，创建强大的海陆军，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吞并了朝鲜，满洲和内蒙古也沦为了日本的保护领地，大力发展工商业，普及义务教育，教师在学校里灌输一些有利于天皇的扑朔迷离的历史传说，宣扬崇拜天皇的思想。

人为地制造对天皇的崇拜是近代日本最有趣的一个现象，这种制止民众变得清醒理智的方法颇值得其他国家仿效。张伯伦教授在东京讲授日文和哲学，他对于日本的知识在欧洲很少有人能匹敌。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作《一种新宗教的发明》，由唯理主义者出版联合会出版。他指出：近代以前佛教几乎排斥了其他所有的宗教而成为日本独一无二的宗教，有一种出自古代日本本国的称为"神道教"的宗教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到了最近四十年，忽然又兴起而成为国教，重新加以改造以适应时势的需要。[①]自然它比佛教更受到青睐，原因在于它产于本国，属于国粹，是一个民族的宗教而不是世界性的宗教。它的真正目的，正如近代政治家们所发挥的那样，在于光大日本与天皇。

张伯伦教授指出在明治维新之前，天皇根本得不到任何尊重：

---

① 原注："从前乡村僧侣们讲诵的神道教何以会大受欢迎，我们无从知晓。我们认真挑选和编辑官方材料，发现其中的神道教并不是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传人前大和民族信奉的土生土长的神道教，许多合乎情理的讨论都没看到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因而没有什么份量。"(默多克，第一卷，第173页)

> 自人类有历史和人们有记忆以来，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人这样慢待皇帝。皇帝有的被废黜，有的被杀戮，每次皇位的更替都是血腥和阴谋的征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百年之久，许多皇帝遭到了流放的厄运，有的甚至在放逐中被谋杀……政府完全被权臣所控制，权臣拥立幼主，等幼主将要成人，就逼其让位。有的权臣对皇室相当苛刻，以致于天皇和太子不得不靠卖字聊以为生。对这样的事，也没有听说有多少人出来反对。就是现在称得上是盛世的明治时期，也有两次叛乱：一是有人要争夺皇位，一是有人要建立共和制。

上面所说的尽管是事实，但对于只知道 20 世纪的日本的人来说，几乎难以置信。迷信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齐头并进。反对天皇在今天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每逢有政治上的纷争，哪怕是最激烈的纷争，只要天皇加以干涉，马上俯首听命。虽说有议会，天皇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比起任何专制的君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文化在明治维新以前都来源于中国。无论是宗教、艺术、文学、哲学还是伦理，都参照中国。日本历史最早的记载约在公元 5 世纪，而中国却远在公元前 2000 年。这令日本相形见绌，所以炮制了古老的历史来遮遮

羞。这与罗马人声称自己是埃涅阿斯[1]的后裔的做法如出一辙。张伯伦教授说：

> 日本确切的历史，最早应从公元5世纪算起。即便是6世纪的记载也不能轻信。这一点不仅我们知道，日本的学者也知道，这是历史研究的确凿结论。但是，日本官僚却不愿让人知道这个尴尬的事实，所以对于本国的神话还并不强制人们相信，但对于本国历史传奇却要求人们绝对信仰。哪怕是大学教授，如果对此有所违背的话，他的妻儿恐怕就要挨饿受冻了（在日本，不论多年轻的人都有妻子儿女）。上自伊藤博文的《日本宪法评述》，下至学校的教科书，都把这些荒谬的日期引以为真。

也许日本历史的伪造并不重要，这好比《圣经》中的故事大多不足为信，但牧师们都信以为真一样无伤大雅。但这只是整个体制的一部分，其中隐含着政治目的。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也都为之作出了残酷的牺牲。还是引用这本小册子里的话：

> 神道教是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它早就湮灭而不为人所信，现在却被从壁橱里拿出

① 译注：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罗马神话中罗马的创建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

来，掸去灰尘。普通百姓仍然倾心佛教；受欢迎的节日还是佛教节日；佛寺仍是他们掩埋尸骨的地方。日本的执政者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坚持神道教，称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是下凡的真神，应该得到臣民的完全效忠。法律、宪法都是天皇的馈赠而不是民众的权利；大臣和各级官吏都是他意志的执行者而并非公仆；神道教由于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应独受推崇。

以上所述并非停留在口头上的理论，而是日本政治的基础。天皇在被德川家族把持朝政数百年之后，又被萨摩、长门两族所把持，萨摩、长门两族由 5 人作为政治上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元老，有时也称为枢密院。现在这 5 人中还剩 2 个。宪法上并没有承认元老的存在，他们也只是普通百姓，只不过能够使天皇对他们言听计从而已。就因为如此，他们无所不能。他们经常无视议会和公众舆论的力量，然而他们的意志总是能得到贯彻执行，因为他们能使天皇开口为他们说话，而天皇的旨意是没人敢违抗的。他们自己不入朝做官，但是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都由他们选择，出什么差错也让这些人担待。元老是日本的“真正政府”。而且如果天皇不被其他党派把持，这种情况恐怕不会结束。

从爱国的角度来说，元老们在处理各种事务方而有着非凡的智慧。如果日本是个民主的国家，那么它政策中的沙文主义比现在更强烈。像濮兰德这样为日本辩护的人士肯定会告诉我们，日本有一个反对军国主义分子

的自由党，不久就可能掌管日本的对外政策。我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无疑，现在有一场运动要求增加议会的权力，迫使内阁必须对其负责，也有海、陆军大臣不仅要对天皇负责，也要对内阁和首相负责的言论。[①]但日本外交政策的沙文主义并不会因为民主的发展而减弱。有一个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反对沙文主义的社会党派，他们的势力将随着日本工业的发达与日俱增。但实际上所谓“自由党”，他们的沙文主义比政府更厉害。而全国的舆论则有比自由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元老们敢于力排众议，多次把国家从错误中拯救出来，而如果政府实行民主的话，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就不可避免了。在这些有趣的事例中，最能说明日本政治的莫过于中日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了。

1905 年，日俄在进行了对马岛、沈阳两场战役之后，旁观者都知道俄国不可能在海上有更大的建树，而日本也不可能在陆上期望更多。但是，俄国政府迫切要继续这场战争，他们在满洲逐步增加人员和供给，并改进了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条件。相反，日本政府认为大致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再要举债继续作战势必困难重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暗地里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出

---

① 原注：然而这场运动的力度值得怀疑。默多克(同上，第一卷，第 162 页)认为：“在目前的 1910 年，在所有部门中陆军部和海军部仍然是帝国最有实力的。若由一党执政的政府偶然在政治舞台上冒出来的话，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官员能做到等闲视之。因为这些政治家们会欣然承认陆军和海军的事不在他们的党务范围内，而是日本天皇陛下的专务。在日本从事公共服务的官员能得到数不清的贵族头衔、高官和厚禄，这比帝国的船长和水手得到的多。而在中国，士兵虽然称不上是贱民，但却非常野蛮而不开化，所以有人建议制订政策让人们放下架子、藏住鄙视，客气地对待他们。”

面调停。于是罗斯福邀请两国召开和平会议。俄国政府怕国内实力不弱的和平党派和即将来临的革命，不敢拒绝邀请，更何况世界上中立国的舆论都倾向日本。日本为了尽快得到和平，故意使俄国作出这样的推测：日本人逼人太甚，会失去世界舆论的同情，而且也会激怒俄国的和平党派。日本人大肆宣扬一定要取得赔款。其实，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并非一定要赔款，但这一点只有极少数的日本人知道，外人一概不知。俄国人以为日本对于赔款不肯放松，所以对日本人的其他条件都很宽容。没想到，正当俄国收起行囊打算退出和会时，日本政府宣布接受俄国的让步，放弃赔款的要求（这正是他们当初预期的）。如此一来，俄国政府和日本民众都大为恼火。因为俄国政府认为对方别的条件都会让步，赔款不会让步，这样一来和谈就会破裂；而日本民众也认为政府对于赔款决不会让步。现在这两方面都被欺骗了。结果造成了俄国国内的革命，日本国内也发生了暴动，舆论一片反对之声，政府被迫更换。名义政府下台了——这样说是因为元老们仍然大权在握。元老决定讲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很正确的，而且现在不用怀疑，如果不是使用诡计，讲和不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好处。

不熟悉情况的外国人只知道日本有民选的众议院组成的国会，以为日本民主的程度不低于大战前的德国，这是大错特错的。虽然伊藤博文以德国宪法为范本颁布了 1889 年宪法；日本除了海军效仿英国的建制，其他都是以德国为参照。但日本宪法与德国宪法也有差别。以众议院的选举来说，在德国，凡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而在日本则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全国有选举权的男

子只有25%左右。这还是小的方面，大的方面比如天皇的权力比德国皇帝要大得多。日本的大臣们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对于天皇也是各负其责而不是集体负责，这同大战前的德国相同。例如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并不受首相指挥，而是各自听命于天皇手下的陆、海军机关。德国的议会有财政权，而在日本如果国会拒绝通过预算方案，那么就继续沿用上一年的预算；日本的国会闭会期间，天皇的敕令可以暂时作为法律，而德国的宪法没有这类规定。

由于宪法是天皇宽容大度的恩赐，批评宪法或提议修改宪法都是大不敬的，因为那就意味着陛下的构想不够完美。若要了解日本的宪法，一定要同时读一下伊藤博文所写的《日本宪法评述》（与日本宪法同时发行）。科尔曼先生对宪法的总结是正确的：[①]

> 日本宪法第一条说，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伊藤的《日本宪法评述》这样解释道：所谓统治，是指在位的天皇集国家的主权、国民政府和臣民权利于一身。
>
> 第三条说，“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伊藤对这一条的解释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他说：“神圣皇位的历史可溯及开天辟地的时代，天皇是天的后裔，神圣而高于臣民，臣民必须尊敬而不可冒犯。虽然天皇应该重视法律，但法律并不能约束他，臣民们不仅应当尊重天皇，

① 原注：《揿开远东的面纱》第252—253页。

而且还不能对他进行议论或毁谤。”

天皇依据宪法行使行政、司法大权。国会由天皇召集，国会的开会、闭会、休会、解散都由天皇决定。国会休会时天皇的敕令可代替法律。海、陆军由天皇统帅，天皇可以对外宣战、讲和、缔结条约，颁布大赦、特赦、减刑的敕令。

关于国务大臣的权限，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各大臣给天皇提供建议并对自己的建议负责"。

伊藤对这一条的解释表明了他的用意："如果大臣失职，那么判断他的责任的权力应属天皇。只有能任命他的人才有权罢免他，然而能够任命、罢免、奖惩国务大臣的除了天皇还能是谁？宪法中已经规定任免他们是天皇的权力，所以对于大臣的评判不经过国会是合法的。但国会有权质询大臣并要求其公开答复，也可以向天皇陈述意见。

"首相向天皇汇报他对国事的意见和施政纲领，以及他负责的各个职能部门的情况，他的责任相当大。至于其他大臣，则对各自权限以内的事情负责，互相不负连带责任。首相和各大臣都由天皇亲自选派和任命，他们座次的排列是由天皇决定的，所以首相对于其他大臣无权管理，后者也并不依赖于前者。世界上有的国家的内阁作为一个整体，成员并不是各尽其职，他们之间负连带责任。这种制

度的弊端是政党的权力联合起来最终会压倒天皇的最高权力，这种情形永远不能被我们的宪法采纳。”

日本国会的权力虽然小，但在成立的最初四年（1890—1894 年）却给政府带来颇多烦恼。伊藤博文直到 1894 年时还控制着日本的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明治时代前半期的政治家大都有兴趣引进新式教育、新式的社会组织形式，目的在于抵御西方的侵略，保持日本的独立，他们没有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意图。伊藤就是明治时期旧派政治家的代表，他们这一类人的治国方针大多参考 1870—1880 年德国的政策，那时俾斯麦不让德国贸然行事，但等到发现国会难以驾驭时，他们就转而模仿俾斯麦早期的政策。那时候，俾斯麦初掌大权，普鲁士议会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于是，他就发动同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制服了议会。同样的道理，1894 年中日战争前心怀不满的国会，在战争结束后马上变得忠心耿耿，从此以后日本政府除了在一些好事上外（如《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尚未遇到较大的反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虽然触犯了国际规则，但这却使他们在国内赢得掌声和响应。伊藤对于 1894 年的中日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虽然后来他也反对掠夺政策，但却没有权力加以阻止。[1] 然而，他的反对是吃力不讨好的。最后他在朝鲜被刺身亡。[2]

---

① 原注：见麦克拉伦前引书，第 277、228、289 页。

② 译注：应为在中国哈尔滨东站为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刺死，伊藤时任朝鲜统监。

日本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大行其道，它的性质怎样，结果怎样，我将在以下两章里讨论。就目前而言，它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国会与英国都铎王朝的议会一样无足轻重。现今的制度能否持久现在还无法预测。很可能由于一场对外战争就会使现有制度甚至国家的基础和民心遭到破坏。我不相信日本比德国更经得起失败。即使没有战争，没有突发的革命，外交上的失败也足以带来一个更自由的政权。然而在日本最具爆发力的是它的工业，所以日本想要成为世界的强国必须大力发展工业，而事实上凡是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日本都大力推广。再者，工业能够消化不断增加的人口，这些新增人口无法移民到英语国家，也不能移民到亚洲大陆，因为中国人为求生计的竞争激烈。所以新增的人口只能吸收到工业中，将工业产品与外国的食物进行交换，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唯一办法。要发展工业，日本就必须控制中国，因为日本国内资源贫乏，而如果与欧美国家公开竞争原料的话，价格太高且来源不稳。再者，依赖进口外国的食品和资源，一定要有强大的海军作后盾。由此看来，日本实行帝国主义和重视海军的动机与英国是一样的。但为了推行这一政策，非得实行重税。而要在中立市场的竞争上获胜，就要靠饿不死人的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为基础。例如大阪的纺纱业工人大部分是14岁以下的少女，每天工作11个小时。1916年的时候，每天的工资平均不超过5便士。工会、社会主义在当今的日本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如果工人的数量增加了，而工时和报酬没有明显的改良的话，工会和社会主义势必会有发展。日本政府的政策极其强硬，这虽然能为自

己增加一些权势，但同时必然难以与政府严厉压制的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调和。另一方面，崇拜天皇的历史神话是日本的立国之本，但这并不为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所接受。[①] 所以，以我的假设，日本能够平安无事发展二三十年，届时，平民和资本家、官僚之间必定会有很深的矛盾。如果农民的不满也一并爆发，那么日本就不是我所敢预料的日本了。

所以，日本要解决的问题颇为棘手。要供养新增人口，必须发展工业；要发展工业，必须得到中国的原料；要得到中国的原料，不得不触犯欧美的经济利益；要触犯欧美的经济利益，必须要维持强大的海陆军，而这反过来势必使得依靠薪金糊口的工人遭受困苦。以工人的穷困为代价发展工业，这意味着民众的日益不满、社会主义的得势、穷人对于天皇渐失敬意，因此更大的威胁是国家的基础就要为之动摇。对于日本来说，外面有日美交战和中国复兴的危险，内部有平民革命的危险。

要免除这种种的危险，只有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个方法。但枪炮下的牺牲品也因之减少，这种想法不仅为军国主义分子所痛恨，而且与日本的宗教道德里忠君爱国的基础势不两立。所以，日本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

---

① 原注：1922年2月7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其驻东京记者的专电，是关于元老院领袖山县有明太子葬礼一事：

国会反对拨款给山县有明太子进行国葬。提出这个决定的是来自大阪选区的一位人士，是去年刚成立的劳动党在议会中的发言人，他声称元老院的领袖并未真正效力国家，尽管他们是最高尊严的接受者，但他们是人类的敌人和民主制度的镇压者。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倡议者能获得必要的支持以便把这个决议列入议程，这是整个事件中令人感兴趣的地方。

须增强对西方的学习。不仅是制造方法，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学习；甚至宗教、人生观也应当西化；此外还应推行思想自由，采用怀疑主义，削弱部落观念。如果不采取这些做法，人口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人口问题不解决，则迟早会有大难临头。

第七章

1914 年之前的日本与中国

在讨论日本的对华政策之前，首先要提醒读者小心自己的一个习惯，即对“黄种人”的看法，以为中国和日本同属黄种人，有什么联系。自然，乍一看，同非洲人、欧洲人相比，中日两国都是黄种人，归于一类。但他们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却很少。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人是比较蒙昧的民族，日本人认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白种人。我没有见过长毛的阿伊努族人，估计日本人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承认这么低劣的民族与我们是同类。就算他们是白人的后裔，也不能证明阿伊努族人与我们的共同之处比中日两国与我们的更大，因为文化上的相似比起种族上的相近更为重要。

虽说日本文化在明治维新之前源于中国，直到今天，日本的书写仍然采用汉字；日本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入；忠孝是日本的伦理基础，儒家的这两种美德是与其他古老的中国文

化一块进口来的。但在西方人人侵之前，中日两国的历史发展不同，人民的性格也不同，虽然他们原来采用的学说是一样的。中国从秦始皇（公元前 200 年左右）开始，一直是统一的大陆帝国，与周边的安南、缅甸、蒙古、西藏、印度等外国交往甚多。与之相反，日本是一个岛国，除了与朝鲜、偶尔与中国有些接触之外，与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往来。藩族的分立与相互争战，造就了武士的美德与恶德，然而却使日本没有经济上的或行政上的大举措。孔子的学说在这样一个国家大行其道，因为在孔子的时代，诸侯林立，孔子就是其中一国的臣子（正如歌德之在魏玛一样）。然而，就是孔子的理论在日本的发展，也与中国的不同，这也是理所当然。

在从前的日本，忠于封建领主是最值得称赞的美德，如今推而广之就是爱国思想。在势均力敌的争斗中，"忠"自然是备受推崇的美德，如在从前藩侯分立的日本和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相反，中国国势巩固，版图广袤、历史悠久，在这样的国家，"忠"就并非必需。国泰民安就产生了谦恭、谨慎、圆滑等美德。但中国再不如以前那么太平了，中国人陷人了一帮好战分子的包围之中，他们不能顺应形势发展爱国思想，便养成横暴残忍、寡廉鲜耻的秉性。日本则没有这种困难，因为长达几个世纪的藩侯争战的混乱局面早已教会了他们顺应时势的本领，所以西方的影响正好使中日的不同性质更加显著：现代的中国喜欢我们的思想但不喜欢我们的机器，而日本则正相反。

从某些方面来看，亚洲，包括俄国，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但是日本不在其中。俄国、中国、印度都有广袤的

平原，容易被成吉思汗之类用武力加以征服。加上现代铁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央集权比以前更加容易。这些国家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不怕外来入侵，无需与他人通商，国力强盛，因此对于进步和发展感到很冷漠。这种情形或许将来真的可以实现，如果俄国能产生一位大战略家，再用上德国的组织能力。但是，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富强的基础就建立在商业之上，这一点和英国相同。可惜的是，日本尚未习惯于商业，所以仍然心存吞并亚洲的念头。这一政策与中国、俄国的利益必然发生冲突，而这两个国家的疏漏，则使日本的野心得以屡屡得逞。但中俄两国迟早能重振雄风，到那时，现在日本实行的政策的缺点自会暴露无遗。

采取这种政策自然是根源于日本人有两个无法相容的野心。一方面，他们希望扮演反抗白人统治亚洲的斗士；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与白人平起平坐，聚餐于欺凌弱国的盛宴。执行前一种政策应该与中国印度交好而容易被白人敌视，但后者却促成了英日联盟，使日本吞并了朝鲜，并事实上吞并了满洲和内蒙古。作为国联成员、凡尔赛会议五强之一、华盛顿会议三巨头之一，日本与其他列强并无二致。但有时日本却以亚洲的霸主自居，想要帮助黄种人、棕色人种（不包括黑人）摆脱白人的欺压，大限伯爵曾在神户商会上发表演说：“印度三千万生灵希望我们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我在远东的时候，曾经问了许多英国人，我国政府与日本联盟究竟有何好处。在我看来只有一个答案能使我们理解政府的动机，那就是减少日本人在印度的反英宣传。但无论如何，日本在印度以反对白种人的暴虐的保护者自居，这一点是

无可置疑的。A.M.普利的《日本的外交政策》援引京都帝国大学市村博士所说的白人的罪恶，列举如下：

> （1） 只认为自己是人类，而其他有色人种的文化都是低等文化；
>
> （2） 自私，维护自身利益而置其所认为的低等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
> （3） 充满种族自豪感，骄傲自负，你退一尺，他进一丈；
>
> （4） 凡事都趋于极端，他们的成就大于有色人种，他们的凶残也胜于有色人种；
>
> （5） 崇拜金钱，视金钱为万能，为了金钱不择手段。

这里所列举的我们白人的种种缺点，我认为是完全公允的。人们也许会认为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我们的民族，他们自己会尽力不学我们的样。然而，这不是日本人的道德观。相反，他们却强调说有必要尽量地模仿我们。实际上，只要是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过，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连做梦都不会把中国视为平等的民族。他们虽然表面上希望白人能将自己视为平等的民族，但实际自以为远胜于所有的白人国家。他们真正的愿望，不仅是与白人平起平坐，而且要凌驾于白人之上。大隈伯爵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把这层意思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

> 白人将全世界视为己有，对其他种族不

屑一顾，认为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整个世界。日本受这种观点所害，很不公平，因为日本人并不比白人低劣，完全可与之平起平坐。白人违逆天意，必有大祸临头。

日本的名流自诩本国为世界最大的国家，这样的言论不乏其例，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厄瓜多尔的名流也都有类似的言论，只不过我们所担心的，不是日本人的言论，而是日本人的行动。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起因是朝鲜问题。中日双方约定，对于朝鲜内部事务在没有相互照会之前不得干预。后来，日本宣称中国违约。双方都难辞其咎。他们为了实现帝国主义而发生的敌对冲突，引发这一场战争。中国人一触即败，元气大伤，时至今日，除了民间的义和团外不敢再以武力反抗外国。但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并没有取得战胜的成果，英国则袖手旁观。俄国早已垂涎朝鲜，欲占为己有；法国是俄国的同盟国，出手相助；德国的一臂之力则可能是由于威廉二世担心"黄祸"的蔓延。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正是由于这三国的干涉，日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如果中国在朝鲜大展手脚，日本并不会在乎，只是俄国人的插手倒成了日本的心头之患。俄罗斯对中国施以援手也并非出于好意。他们租借了旅顺、大连，取得在满洲筑路、开矿的权利，修筑东清铁路经由满洲，把旅顺港、北京与西伯利亚铁路和欧洲贯通起来。这些都得手之后，俄国人就开始打朝鲜的主意了。

如果 1902 年的英日联盟没有结成，日俄战争或许

就不会发生。从英国方面来说，这个联盟在外交上并不重要；从日本方面来说，除了“大战”时担心德国人获胜之外，这几乎是它外交政策的基石。联盟规定缔约一方如果同时受到两个国家的攻击，那么另一方必须对其援助。这一条的用意是为了制止俄国在与日本或英国交战时去求助于法国。1902 年，我们英国同法国、俄国有矛盾，日本也就同俄国不和，这个情况一直到 1907 年的会议解决《朴茨茅斯条约》为止。这个联盟在日俄战争期间较好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法国因此而保持中立，而日本则得以在海上打败俄国，俄国的野心遭受了较大的挫折，这使我们英国能与俄国在 1907 年达成协约。如果没有这项协约，那么，我们与法国 1904 年所缔结的协约恐怕还是不管用，而以后战胜德国的英法俄三国联盟也就无从谈起。

日本如果没有与英国联盟，那么与之交战的就不只是俄国一家，而是俄法联军了。果真如此的话，日本当时的兵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所以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实在是由于我国的提携造成的。

日俄战争，日本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俄国放弃了干涉朝鲜的种种权利。旅顺、大连让给日本，向北直到长春的铁路也让给日本，这条铁路及其几条支线以后被称为南满铁路。从大连到长春相距 437 英里，长春在哈尔滨以南 150 英里。日本人把大连作为满洲的商业性港口，而将旅顺作为军港。日本对于朝鲜的处置完全是参照西方的做法。日俄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日本人签字画押，保证朝鲜的独立与主权；而在 1910 年则将其并入日本，此后就用各种手段镇压朝鲜的民族主义者。日

本人的这一系列做法完全具备了与白人国家平等的资格了。

日本不仅占据了南满铁路，而且垄断了南满的铁路修筑权，这是日本利用铁路专设权而插手中国广大区域的开端。A.M.普利的《日本的外交政策》一书记载了法库门铁路事件，说明了日本是如何得到南满铁路的专设权的，这段文字颇有参考价值：

> 1907年12月，清政府与宝林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将铁路向北从新民屯延伸到法库门，所需资金由中英公司筹措。日本提出抗议，理由有两条：一、根据日本与中国所缔结的秘密议定书（并入1905年12月20日所订的《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不得修筑与南满铁路相近或与之并行的干线铁路，也不得修筑损害南满铁路利益的支线铁路"；二、根据1902年中俄缔结的条约，以新民屯为起点的铁路，如果未得到俄国的许可，不得建造。日本由《朴茨茅斯条约》继承了俄国的权利，所以此项计划中的铁路未经日本许可，不得建造。日本在外交公文中口气强硬，并且采用了通牒的形式，并说如果日本的理由不充分，只有俄国可与之理论。
>
> 中国政府签订此项合同的根据是1899年所订立的"建设从中后所到新民屯铁路"的合同。在这个合同里，中国特别保留了修建法库门铁路可以得到旧承造人帮助的权利。而

且，虽然依照1898年英俄的照会讲明英国人不准参与建造长城以北的铁路，但是根据英俄照会的附加照会，中国政府与中英公司所订立的合同仍然具有效力。

根据1902年的中俄条约与1899年的英俄照会，日本是俄国的财产与债务的承继人。其反对建造法库门铁路当属正常。即使如此，日本并没有履行它在这场交易中的承诺，即俄国在照会中答应放弃在长江流域以外取得租界和其他的特权与权利。日本依据密约力争，这对于英国可以发生效力，而对于其他国家就不行。这可以从华盛顿国务院的记录中判知。后来，日本以《朴茨茅斯条约》第六条来反对："俄国在东清铁路（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利和附属于东清铁路的所有权利和财产"让与日本。中国则引证该条约的第三、第四条加以有力的驳斥。第三条规定"俄国不得在满洲拥有土地上的利益或优先权或独有的特权用以损害中国的主权，或者违背机会均等的原则。"第四条是俄日两国的互惠约定，"中国在满洲所采用的与各国类似的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不加以阻止。"

了解下面的事实是很有趣的：不允许中国在本土建造铁路是否损害中国的主权？中国拟议中建造的铁路是否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的政策"？

法库门事件对中国来说不亚于俄日战

> 争。而日本诡计多端，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也使其信用大损，至今未能重树。英国政府不能为自己的臣民据理力争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其无能与来自东京的抗议同样昭示于天下……
>
> 日本对法库门铁路的阻挠得逞之后，又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放弃修建许多计划中的铁路。比如锦(州)——爱(珲)线，安(东)——奉(天)线[①]。前面所引证的秘密议定书又使其得到了牛庄线，1909年又因之取得了参与修筑吉(林)——长(春)线的权利，1914年最终得到了吉长线。后来，日本与俄国协商，把1896年《俄中协定》的第六条解释成“在铁路地带有排他的行政权”。

日本的势力范围终于扩展到了满洲的全部和山东全境——尽管名义上日本在华盛顿表示放弃后者。通过这种办法或者向中国政府借款的方式，日本垄断了其影响所及地区的铁路，并利用铁路掠取其经过省份的真正权力。

日俄战争之后，两国握手言和，同意在满洲问题上采取同一步骤共同对付中国。他们的友好关系一直维系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原已答应在和平会议上倾力支持日本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党却不予承认。因此，日本对苏俄深恶痛绝，这也是日本扶植远东共和国

---

① 原注：日本人后来修建了这条铁路线。

境内的白匪烧杀掳掠以及同法国交好的原因。

中国的革命党刚萌芽，日本就加以扶持。他们有时扶持纷争中的一方，有时双方都得到支持，这完全取决于谁能为其所用，能延长内战，并从政治上削弱中国。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孙逸仙几次到日本，甚至有证据表明早在 1900 年时就有日本人资助他。然而，当革命真的爆发之后，日本就想帮助清政府，但由于别的国家的缘故，最后没有成功。那时候，日本的政策和后来的一样，仍然是要阻止中国南北统一，把革命限制在南方。而且日本崇尚君主制，不愿意看到中国皇帝被赶下台，全中国变成共和制，他们愿意看到他失去南方数省，削弱一定的势力。普利把日本在中国革命时的行为记载如下：

> 日本元老在 1911 年 12 月 18 日发了一个通告，假借惯用的"为了远东和平"的名义，认为干涉中国的时候已经到了。之后，又给日本驻京公使伊集院发了密令。12 月 23 日，伊集院明确地告诉袁世凯，日本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中国的共和政体。……当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时，日本外务省派了一位名叫松井（现为日本驻法国大使）的外务省资深参事官到北京，辅助伊集院磋商维持清朝的事宜。同时又派外务省的法律顾问丹尼森到上海与革命党领袖周旋。松井的任务是帮助满清，反对革命党，但把满洲作为维持帝制的交换条件；丹尼森的使命是扶助革命党，让北京政府承认南

方的共和国，让该共和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以国内铁路、矿产的独占权作为交换条件。革命党人断然拒绝了丹尼森的提议，还将这项提议寄给驻京俄国公使。这样，真相毕露，日本政府自然是竭力掩饰。

然而，英国人的政策是扶植袁世凯，反对清政府和孙逸仙，结果成功了。袁世凯当上了总统，一直到1915年，他坚决地反对日本，日本也因此而竭力反对他。所以他的当权，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大受挫折。如果西方列强仍然能在远东大行其便的话，那么，形势的发展无疑对日本就不那么有利；但大战爆发后，日本又看到机会来了。至于是怎样利用的，请看下一章。

第八章

“大战”中的日本与中国

中国在外交上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日本的侵略。日本的国力本来没有中国强，但1864年之后，日本很快从我们这里学走了我们用老练的杀人方式教给他们的一切。于是，日本在1894年把中国作为试验新式武器的场地，这与俾斯麦当年在丹麦的做法如出一辙。那时，中国政府仍然抱着一贯唯我独尊的心态，全然不知败之将至。中日两国为争当朝鲜的宗主国，而引起了争端。那时，没有中立国愿意出面干涉。日本很快就大获全胜，但为了达到吞并朝鲜的目的，又不得不与俄国进行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战争大部分都在满洲进行，满洲是俄国与中国交好的回报。战后，日本取得了旅顺、大连和北面以奉天为界的南满。“大战”结束后，俄国分崩离析，日本又占取了整个满洲的其余地方。

满洲的主权从名义上来说仍属于中国；中

国人在满洲有行政机构、军队和巡阅使。但日本人在满洲也有自己的军队、铁路和工厂，完全控制了满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国的巡阅使不敢造次，如果失去了日本人的欢心，用不了一个礼拜就得下台。山东的情形也是这样。

山东问题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在“大战”中的所作所为。1914 年，中国本可以接受协约国的建议加入同盟，合力将德国人赶出胶州湾。但是日本人不同意，他们自己出面干预这件事，而坚持让中国保持中立（直到 1917 年）。等到攻克了青岛之后，就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于是中国的问题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根据 1915 年 1 月的原文，“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内容是关于山东。日本要求中国预先同意日本可能最终与德国达成的有关山东省的协议，日本有权修建铁路，开放港口（未指明）予以通商；其他列强不得享有日本在山东的任何特权。第二号是关于南满东部和内蒙。日本实际要求把这两地变成保护领地，控制铁路，日本企业享有完全的经济自由，其他外国企业不得染指。在第三号的内容中，日本要求垄断长江流域[1]部分地区的矿山和钢

[1] 原注：关于这个问题乔治·格利森在《日本之我见》第 174—175 页写道：“这一条款涉及到在汉阳的钢铁工厂，汉阳、武昌和汉口构成了长江上游的商业中心，人口达 150 万。汉冶萍公司拥有大冶铁矿的大部分，该矿位于汉口以东 80 英里，河流交汇，铁路纵横，该矿 67% 为铁，堆成了几座高 500 英尺的铁山，即使每年开采 10 万吨也足够开采 70 年（这大概言过其实了）。煤从 200 英里外的萍乡用船运来，1913 年，萍乡的 5000 名矿工挖出了 69 万吨煤，日本人估计这些煤若每年产量为 100 万吨，也至少可开采 500 年……

“因此日本人竭力进入并控制这个在中国中心的重要地区，虽然大不列颠多年来一直把这个地区视为其贸易领地。”

铁工厂，而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势力范围。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即中国不得将任何港口、海湾或岛屿转让给除日本之外的任何国家。在第五号，也就是最过分的那个部分的内容中，日本要求中国政府雇用日本人做政治、经济和军事顾问；一些重要城市的警察由中日共同管理，而且人员配备应多数为日本人；中国的军火50%应向日本采办，或者购自将要建在中国的中日合办的军械厂，这家军械厂由日本专家控制，使用日本材料；日本有权在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修建铁路；日本应有权在台湾对面的福建优先发展工业；最后，日本还要求有权在中国进行宣教，传播他们所推崇的道德规范。

很显然，这些要求意味着中国将完全丧失自由，欧美国家将无法参与重要区域的工商业，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也将大受影响。但我们一门心思在打仗，自顾尚且不暇。尽管这些要求对我们的商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尽管远东在对此大声疾呼，尽管美国与日本激烈交涉，全力反对，但在中国代表团于凡尔赛会议上说明之前，劳埃德·乔治对于“二十一条”竟一无所闻。日本的要求是些什么内容他无暇了解，但却有空于1917年2月与日本签订一项密约，允诺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对山东的一切要求。根据英日联盟的条约，日本应当将“二十一条”告知英国。事实上，日本却只通报前四号，而隐瞒了最重要的第五号，这显然是违约了。但这件事劳埃德·乔治恐怕也是到了凡尔赛后才偶然获知的。

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进行了磋商，有几处作了修改，但最后还是屈服于日本下的最后通牒。关于汉冶萍煤矿的要求有所修改，这大概是为了讨好我们英国。

而尤其令人憎恶的第五号则修改为互换经过仔细推敲的含糊不清的公文。就这样，中国政府于 1915 年 5 月 9 日接受了这些要求。美国当即照会日本政府，称对此决不承认。那时候美国还是中立国，因此还能进一步为实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有所作为，例如保护弱国。但到了 1917 年，它也加入到“大战”中去，就不得不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于同年 11 月签订了《石蓝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尤其是与日本的属地接壤之处。”这个协定的其余部分虽然很长，但不过是些空话。

现在我要谈谈中国缘何会介入这场战争。中国参战先是听从美国的主意与德国断交，后又受日本人指使对德宣战。不要忘记美国同德国断交之后，威尔逊总统劝说那些中立国采取统一步骤，也与德国断交。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大力推行，终于成功。1917 年 2 月 9 日，他说服中国就潜水艇问题向德国发了一份规劝的公文。后又于 3 月 14 日再次劝说中国与德国断交。至于对德宣战则是到 11 月 14 日。美国人在这些事件中耍的阴谋颇值得研究。

中国因为日本也是协约国，所以一直不愿加入其中去反对德国。英法俄却一直希望中国的参与（我很快就会谈到其中的原因）。“大战”初期，似乎还有某种暗示，就是中国以参战作为让我们承认袁世凯当皇帝的条件，但由于日本人反对，没有成功。日本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一来仇恨袁世凯，二来担心中国加入后就会受到协约国的保护。1915 年 11 月，驻东京的英、法、俄三国公使

请求日本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石井子爵[1]说:"日本认为,中国的事情对于日本有重要的利益,不能有所放松。如果中国组织起精良的军队参战,那么日本决不能漠然处之;如果四万万人在经济上取得独立,那么,日本也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三国的提议只能作罢。我们必须了解,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人经常诋毁协约国,因为它认为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日本人在报纸上骂英国人胆小鬼,军事上无能,通篇都是攻击英国人的文字。

但是,在美国与德国断交后,形势对中国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于日本不像我们一定要屈从,它不是协约国,而是中国最要好的友邦,所以中国愿意听从美国的劝说于1917年3月与德断交。芮恩施博士相当谨慎。他虽劝中国与德国断交,但不作什么承诺,只希望将来能对中国有所帮助。当时美国不知道协约国与日本已有密约,所以确实是抱着这样的希望的。然而,协约国却不能借口自己在催促中国对德宣战前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能够继续得到日本的支持,出卖了中国的所有权利。

1916年5月,日本人告诉俄国说,德国希望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同年7月,俄国与日本签订一项密约(后来被苏维埃政府公诸于世),由此俄日两国背着协约国单独结成了联盟。彼此约定任何一方不论与谁作战,另

---

① 译注:石井菊次郎(Kikujiro Ishii,1866—1945),日本外交官,1897年来华,任使馆二等参赞,次年任头等参赞。义和团运动后回国在外务省任职。1908年任外务次官,1912年任驻法大使,1915年任外务大臣。1917年以特使资格赴美,与美国国务卿蓝辛交换关于侵略中国的换文《石井蓝辛协定》。1918年任驻美大使,1920年又任驻法大使。著有《外交余录》(1930)和《外交随想》(1967)等书。

一方应当援助。另外还达成共识，“中国对双方都有着重大利益，要保护中国，以免陷人反对俄国或日本的第三国的政治支配。”这项密约最后一款还约定，“签约双方要严守秘密”。这就是说，不可将该密约告诉协约国，甚至不能让英国知道。英日联盟第三条规定：“缔约双方一致同意，无论哪一方在未与另一方磋商前，不得与第三国单独签订违背本约序文所载目的的条约。”其中提到的“序文所载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以及中国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

正当美国劝说中国与德国断交的时候，我们于1917年2月16日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这样写道：

> 英国政府很乐意接受日本政府的请求，现特保证，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对于山东及赤道以北德属各岛的要求。至于日本政府则在和会上同样支持英国对于赤道以南德属各岛的要求。

法、日在此期间在东京所移交的公文很能表明法国对于山东的态度。2月19日，日本本野男爵在致法、俄两国大使的公文中说：“日本帝国政府拟在和会谈判中，要求德国将战前在山东的领土权和特别权益以及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德属各岛尽行移让。”法国大使于3月2日答复如下：

>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打算在和会谈判中支持日本政府对于山东以及太平洋中赤道以北

德属诸岛的要求，同意支持日本对于德国战前在上述地区的权利的要求。

另一方面，白理安[1] 要求日本做到：督促中国与德国断交，并应达到下列程度：

第一、将护照交给德国外交官，令其出境。

第二、所有德国人离开中国。

第三、像意大利、葡萄牙那样，扣留停泊在中国海港中的德国船舶，并将其引渡给协约国处置。

第四、没收德国在中国的产业，取消中国境内的德租界。

俄国大使于 3 月 5 日对本野男爵给法、俄两国的公文也作了答复：

俄国大使馆现对日本外务省 3 月 17 日的来文作如下保证：关于日本希望继承德国在山东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诸岛（现为日本军队占领）的权利一事，俄国将予以支持，日本政府可以完全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支持日本，但不像英、法那样要

---

① 译注：白理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于 1909—1911，1913，1915—1917，1921—1922，1925—1926 及 1929 年任总理，并多次任外长等职。主张法德合作，鼓吹"欧洲联邦"计划，为《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发起人之一。

求回报，想必是因为一年前的那份密约的缘故。

日本在同英、法、俄签订了这一系列密约之后，认为中国参战已无关紧要了。中国参战无非是为了恢复山东的主权。现在这个希望已不可能实现，日本很愿意美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这个希望劝说中国参战。虽说不到和会结束，日本对美国总有一些担心，但自从 1917 年签定了《石井蓝辛协定》之后，这种担心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日本发现可以利用中国的参战加剧内讧，这种做法是符合它一贯的对华政策的。如果中国人这时候不受到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的话，那么，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政府还是有希望的。袁世凯死后，继任的黎元洪尊重宪法，重新召集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他反对与德国断交，更反对宣战。但是，总理段祺瑞是军人，竭力主战。他汇集内阁劝说两院大多数议员赞成断交，总统被迫让步。

然而，在宣战这个问题上，各方舆论不一。正是由于威尔逊总统敦促中立国一齐与德断交，断交才在中国占了上风。但在 6 月 5 日，美国公使却遵照华盛顿的指令向中国递交一份公文，认为国内的统一比参战更为重要，目前以保持和平为上。参战问题如果没有威尔逊总统的举措本来是不会如此紧迫的，而日本人则正好加以利用，以挑起中国南北争端，促使中国的军人干出违反宪法的举动。孙逸仙和其他南方的政治家都反对宣战，孙逸仙在 3 月 7 日写给劳埃德·乔治的一封公开信中谈了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完全无懈可击。内阁在 5 月 1 日决定参战。但是，依据宪法，宣战一事必须得到国会的许可。军人们试图强迫国会通过，但是议员们多数反

对战争。当这一招不奏效时，他们就以武力威胁总统，强迫他非法解散了国会。国会的多数议员就跑到广东，照常行使国会职权，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合法的政府。北方的军人一派犯下了种种违法非法的行为，还不得不对付他们中的一人于7月间搞的一次只有5天的复辟。[①] 总统辞职，其职由一个比较能接纳军方的意见的人继任。[②] 他的政府有时没有国会，有时就召集一个完全听命于政府的非法的"北方国会"。军方随即宣战。就这样，中国为争取民主反对武力而卷入了战争。

中国对于"大战"的胜利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即便有也少得可怜。但这并非协约国本来对中国的期望。它们对中国的期望，完全表露在前文所引法国致日本的公文中。我们希望在华的德产被没收，在华的德国人被驱逐，尽力阻止在华的德国商业的恢复。德产的没收，按计划进行了，不仅是公产，连私产也被没收了，所以在华的德国人一下子都成了贫民。至于驱逐德国人，则因为战时船只被征用而没有实行，一直延至战后。有时限令德国人在24小时之内离境。船上拥挤不堪，而途中又经过热带，在华的德国人无论怎样困难，都无一例外地被驱逐，哪怕是孕妇，英国官员明知其必死于途中也一并驱逐。这些都是战后实行的保护英国商业的措施。有些善良的中国人就以保护落难的德国人，使之不受协约国的虐待为己任，要不然的话，他们还要遭更大的罪。

"大战"中实行的没收私产的做法，是《凡尔赛条约》

---

① 译注：指张勋的辫子军复辟。

② 译注：指冯国璋。

所批准的，开了国际惯例上的一个先例。从这一点来看，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是一样的。李佳白博士在他的《中国，被控制的还是自由的》一书中对比了两种说法。其一是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同意宣战的演说："我确信我们的参加并非一时的冲动；我们能够严守我们为之发誓而战的正义与公道。"其二是战后美国参议员希契柯克在与威尔逊总统谈了一天而了解了《凡尔赛条约》的内容之后，说："我们从这个条约中得到了很多。虽然违背了种种国际法准则和条约，我们处置了德国在美国的十亿元财产，这些都是《凡尔赛条约》所批准的。"协约国以主张正义为名劝中国参战，也获得了同样的好处。

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由于中国参战而得到不少的利益。日本的收获则稍有不同。

北方军人虽然控制着北平政府，但他们的权力完全依赖日本，所以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其他列强忙于战争，为了争取日本的中立把中国的权利出卖给了日本。因为 1914 年 11 月日军攻克青岛之后，就不能将其视为交战国了。中国南方政府与北方的自由分子都反对把持着政府的那帮人。1918 年 3 月，中日缔结海陆军条约。米勒提供了这些官方从未公开过的文本。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就可以满蒙军事上的需要为借口派兵到中国，控制东清铁路，进而控制北满，最后从总体上控制华北。要达到此目的，防范布尔什维克就是一个现成的借口。

之后，日本更是步履轻快地往前迈进。1918 年借给中国的款项高达 24600 万（约合 2500 万镑）。中国内讧双方都不惜出卖国家的自由来换取一党之胜利，这种做

法与欧洲参战各国无异。但协约国获胜后，欧美就有余力来牵制日本了，这真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欧美的牵制直到《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方才生效。在和会上，英、法因为与日本有密约不能不支持日本；威尔逊总统为了他的国际联盟计划得以成功不惜一切代价，而日本如果得不到山东就不愿加人国联。有关这个问题的章节是蓝辛记述和谈的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最后，《凡尔赛条约》第156条规定："德国放弃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并转让给日本。"这件事太不公平，所以尽管威尔逊总统给予了承认，但参议院却不批准此条约。于是，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又被重提。中国在凡尔赛的代表团抵制对德和约中有关山东的所有条款，后因得到中国新青年的舆论支持而拒绝签字。他们无法理解加入协约国的报答竟是一个省被他国占领。所有其他的协约国都同意这种不公平的做法，这就好像如果美国在战争中帮助了我们而我们则将其弗吉尼亚州吞并掉，或者法国以同样的借口吞并英国的肯特郡。

同时，"少年中国"知道可以通过这一事件调动公众舆论，提高反日呼声。1919年至1920年，北京政府为亲日的安福系① 所掌握，但在1920年夏，由于中国新青年的思想影响了驻京士兵的缘故，安福系大败，其领袖藏匿于日本使馆中。从此以后，北京政府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对日本唯命是从，却转而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日本

---

① 译注：安福系，指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1918年，皖系政客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并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称该"国会"为"安福国会"。1926年，段祺瑞垮台，安福系瓦解。

为了能使其在山东的地位得以巩固，无所不为，但仍时常担心美国重提此事。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日本急不可耐地同中国交涉，想在开会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明智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欺诈性让步，坚持要无条件归还山东。在华盛顿，中日双方都同意接受英美的联合调停。美国的舆论监督使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不敢动摇让步。就我所知，英国代表所持观点与美国相同。虽然最终交涉的结果对日本仍有一些让步，但如果美国在山东的利益还能再维持 5 年，这些让步算不了什么。这个问题我在下一章讨论华盛顿会议时会更加详细地说明。

有一个问题，华盛顿会议想对此不闻不问，但在远东却有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俄国问题。外交界一贯狡黠，在日内瓦会议前都假装对俄国无所谓，而只对布尔什维克感兴趣。如果苏俄到会，实在让美国为难，因为在与日本争论时，美国发现自己不得已地与俄国结成同盟，日本对俄国的不友好态度无以复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叛乱的时候，协约国一起占据了海参崴。没多久就相继撤兵，只有日军仍驻扎在那里。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包括海参崴）成立了一个国家，称为远东共和国，首都在赤塔。这个共和国实际上是个布尔什维克国家。因此，日本先后放任小股廓尔察克[1]军人，比如谢米诺夫、霍法斯、恩杰等人反对此共和国，虽然这些人都失败了，但日本仍然占据着海参崴及其大部分海域，尽管他们屡次宣布愿意撤兵。

布尔什维克政权成立之初，北满旁落于日本人之

---

① 译注：廓尔察克（Alexandr Vasilievich Kolchak，1873－1920），沙俄海军大将。

手。东清铁路由半是中国人，半是反对苏俄的俄国人组成的机关管理。东清铁路是经过满洲而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联接的。1914 年时，从北京到欧洲，还时有铁路连通，但现在却没有了。在远东做生意的欧洲人都觉得不方便。从北京到伦敦，以前只要两个星期，现在却要延长到五六个星期。一开始人们都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在作祟，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反布尔什维克的人在管理铁路。与此同时，美国的各色人等也注意到了这条铁路，想使之成为国际共管的事业。对西伯利亚铁路感兴趣的美国人，不得不与俄国亲善，他们的动机与导致范德利普让步的动机相似。如果日美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布尔什维克肯定会乘机夺回海参崴，恢复俄国昔日在满洲的地位。据《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报道，外蒙古的版图几乎与英法德三国加在一起相等，这个地区已经被苏俄的兵力和宣传所占领了。

布尔什维克得到了中国年轻学生的热烈响应。如果它能渡过现在的难关，那它就大有希望成为使亚洲脱离列强摆布的进步人士众望所归的解放者。苏俄没有被华盛顿会议邀请，所以他们没有签署任何条约，有可能不偏不倚地破坏日、美、英的野心。美国对于他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减弱过，只不过他的野心不在于土地而在于经济。如果美国在远东取得胜利，那么，中国必将美国化，虽然政治上的自由可保无虞，然而经济上、文化上的束缚将来就难以摆脱了。俄国的势力可能就没有这么强大，然而他将来或许能为中国争得一些真正的自由。但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可能。这一点不能忘记，因为如果大家都不愿意记住这一点，而且如果世界仍然将俄国视

作败类，那么，远东问题无论怎样解决都不可能长久。至于苏俄对于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尚难以预料。

第九章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以及同时在华盛顿召开的中日之间的会议，使远东的情况多少有了一些变化。具体的变化下一章再说，本章将讨论华盛顿会议关于远东的决议，以及这些决议对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地位的影响。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订立了“四国协约”，英日同盟随即告终。这四强组成的大联盟下又分为两派。英美一派代表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法日一派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但局势还不太明朗，因为英美对俄国问题上意见有分歧，还因为美国不准备参与欧洲的重建。但在远东，英国愿意与美国联合而不是与日本联合。也许我们可以希望这将使我国对中国的政策比以前更宽容。我国已宣布要归还威海卫，如果不是因为威海卫对我国毫无益处且两年后租期即满的话，这种慷慨大度的做法就更加感人了。但就租借的条件来说，即便租期未到，

但如果俄国失去旅顺的话，威海卫也应当立即归还。

华盛顿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一致同意太平洋中除了某些指定的岛屿外，不得有军事设施。如果这一约定得到坚持的话，那么，除非我国不与美国联合，否则美日之间就很难发生战争。美国靠近日本的地方如果没有海军基地，那么，美国就无法调遣自己的部队遏制日本海军。美国海军部本来打算在关岛建立一流的海军基地，现在放弃了这一计划，这可以看作是美国希望同日本保持和平而表现的诚意。

中国得到了各种小利益。修正海关进口税率表，降低5%的关税，废除外国邮政局，只有日本人坚持中国邮政局必须使用若干日本人。虽然中国的邮政完善，而日本邮政的糟糕却臭名昭著，但日本人还是厚颜无耻地认为中国邮政局不用日本人就搞不好。日本在中国开办邮局，其主要用意是为吗啡流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这一点可以从日本邮包不许中国海关查验得到证明。日本将吗啡大量运人中国并在他们控制下的满洲种植罂粟，这些都是日本渗人中国的令人担忧的现象。

当然，诸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等等都在华盛顿会议上被重新承认，但这些都是空话，于事无补。

对于中国来说，在华盛顿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关于山东的条约。1914年，日本赶走了德国人之后，便占据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在山东铁路沿线驻扎军队，并以“二十一条”攫取了在山东全境发展工业的优先权。日本人由战胜而拥有铁路，借铁路又控制了山东全省。日本人如果要增派军队，就发给土匪一些枪械，然后借口

平乱，他们有必要出面干涉。这些情况，《凡尔赛条约》都认为是合法的，但美国和中国都不签字，所以，华盛顿会议提供了一个重提山东问题的机会。

然而，日本人开始时似乎能够如愿以偿。中国人想将山东问题提交会议讨论，而日本人希望同中国人直接交涉。这一点关系重大，因为日本人自签订《石井蓝辛协定》以来，要让列强在实际上承认中国是日本的非正式保护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必须做到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不受别国干涉。华盛顿会议同意日本的提议，不讨论山东问题，而由中日两国自行交涉。由此看来，日本虽取得了胜利，但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因为另外还约定，如果两国交涉出现僵局，则由美国代表休斯、英国代表阿瑟·鲍尔弗爵士出面调停。果然，两国的谈判不久便陷入停顿，只是这时英国似乎不愿再像以前那样全心全意地帮日本，而美国政府却出于维持和平的考虑流露出劝中国让步的意思。但美国的舆论对山东问题异常热心，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得到完满的结局，那么，参议院将不批准华盛顿会议上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因此，在最后关头，美国政府就力劝日本让步，我国代表也是同样的态度，只不过出力没有美国那么多。于是，最终便有了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签订的条约。

根据此项条约，除了日本人的私产和山东铁路之外，中国恢复山东的各项权利。山东铁路是问题的难点，因为只要日本人控制着铁路，那么山东全省就又在其控制之下了。中国代表提议，用商人在爱国运动中募集来的钱款（为赎款的一半）立即将铁路赎回。日本代表不同意。最后的做法是中国被逼向日本贷款，15 年内还清，

或5年内还清。路款定为5340万金马克，再加上日本在管理期内所投入的维修或改进的费用，减去一定的折旧。铁路于条约签字后9个月之内交还中国。但在借款还清之前，日本仍有一定的管理权：中国必须选派一个日本人为车务长，会计师由中日各一人担任，都受中国局长管辖。

从文字上来看，5年之后，各项财产都将归还中国。然而能否实行还要看5年后是否有世界强国来敦促日本履约。休斯和阿瑟·鲍尔弗爵士两人既然力劝中国同意这个折衷方案而不立即赎还山东铁路，那么美英两国自然就有责任监督山东问题条约的执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期望中国最终能够完全独立管理山东铁路。

总的来说，中国人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大出意料。至于由于此次会议引起的国际上的新局面我将在下一章提及。现在有必要考虑一下某些没有在会议上讨论的远东问题，因为没有讨论，这就给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变化。

满洲与内蒙古的问题没有在会议上提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在这两个地方的地位，如果中国或俄国或者两国合力都不能反抗，那么，这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美国人除非与日本在别的地方有磨擦，否则是不会过问这个问题的。

西伯利亚问题也没有解决。因此，除非俄国人仅靠自己的实力能牵制住日本，日本在海参崴附近沿海各省的勃勃野心还是没有受到遏制。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一直处于半战争状态，一时恐怕结束不了。虽然日本屡次宣

称要撤兵，但与此同时却屡次增兵。日本与赤塔政府在大连举行会议，不时宣布已有条约签订或即将签订。但日本于 1922 年 4 月 16 日退出了会议。4 月 27 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两方面中止会议的声明，日本的声明如下：

日本使馆宣布日本外务省对于大连会议 4 月 20 日所发出的公文。

为回应赤塔政府多次表达的愿望，日本政府决定参加谈判。第一次会议于去年 8 月 26 日召开。

日本的要求有：取消共和国内反对日本人的共产主义主张；禁止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撤销武装军备；在西伯利亚实行门户开放；废除对外国人发展工业的种种限制。为早日撤军，尽快签订条约，日本尽可能满足赤塔政府的愿望。从会议一开始，赤塔政府便力催庙街事件[1] 的从速解决。日本最终答应于基本条约成立之后立即处理。日本进一步向赤塔政府保证，在解决该事件的过程中日本并没有侵犯俄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意思；在事件解决之后，迅速撤回在萨哈连的日军；赤塔要求日本移交所保管财产也将如愿以偿。

---

① 译注：庙街，又称庙尔。在黑龙江口北岸，历来为中国领土。1850 年沙俄侵略军潜入黑龙江流域，筑寨于此，以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Nicolaievsk)。1858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庙街便被沙俄侵占。

在西伯利亚的第11师，本来应该于4月间去换防，但如果大连会议有令人满意的进展，那就没有必要去换防而可令其回国。因此，日本通知赤塔方面，如果基本条约能于一定的时间内制订，那么，这些部队将立即撤回，并且提议于4月间签字，这样就可以省去11师换防的手续。对此，赤塔方不仅提议赤塔的军队不等日军撤回就应派遣到海参崴，而且还催促日本应就其全部军队撤回开列一个时间表。

日本通知赤塔说，详细的协定签订之后，赤塔给日本一定的期限，日军会在短时期内全部撤走。与此同时，日本起草的条约，赤塔应当签字。

日本在谈判期间始终保持真诚、和解的态度，尽管如此，赤塔代表并不谅解日本的这种让步精神，提出种种要求，不仅不同意日本的提议，还宣布要退出会议回赤塔。赤塔政府如此的态度，可见其没有交涉的诚意。日本政府不得不命其代表离开大连。

俄国的声明也同时刊载于《泰晤士报》：

4月16日，日本人中断了与远东共和国的会议。远东的代表离开大连。早在3月30日，两国代表对于总条约的各点内容都有定议，但当讨论到军队撤回这个问题时，日本代

表提出了一项允许日本继续干涉的计划。

3月30日至4月15日，日本代表拖延在军事问题上的交涉，反而责怪远东的代表不信任日本政府。俄国的代表宣称：只要能得到日本撤军的确切的文字担保，就在总条约上签字。

4月15日，日本代表发出最后通牒，限远东代表在半小时内答复：对于总条约附加的禁止远东海军增加和远东境内保留一个日本的军事机关等新条件是否愿意签字。至于军队撤回问题，日本代表在呈送的公文中答应如果“不是为难以预料的事情所阻”，一定撤兵。对此，俄国代表拒绝接受。4月16日，日本代表宣告大连会议中止，其代表启程回东京，而日本军队则仍驻扎在3月29日条约所确定的界线内。

读者相信这份或那份声明完全取决于各人的立场，中立的人肯定知道真相其实在两者之间。至于我本人则相信俄国的声明。但即便是从日本的声明来看，大连会议的中止，显而易见是因为日本不愿从海参崴及沿海各省撤兵。日本所答应的不过是将来撤兵的空话，与格拉德斯通[1] 同意撤回埃及驻兵一样毫无价值。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美国参议院没有批准《华盛顿

① 译注：格拉德斯通(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间四任英国首相。

条约》的时候，赤塔在大连会议上处于优势。而当批准之后，日本认为远东的种种问题没有列入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内容，它就可以自行处置了。所以华盛顿会议所作决定的实际效果，是使日本在远东共和国谋求它失去中国的补偿。这大概早就为华盛顿会议中的外交家们所预料到了。

人们将看到，仇视苏俄是日本政策的一部分。这也是日、法两国交好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两国都保护国家资本主义，而与美国的摩根公司、英国劳埃德·乔治所提倡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好相反。这大概是由于法日两国以军火为最重要的收人来源，而英美则以工商业为主。有兴趣不妨计算一下，近年来法日两国用武力搜刮来了多少的煤和铁。英美两国煤和铁蕴藏丰富，这也就造成了不同的政策。不请自来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盛顿散发文件，证明法、日在来参加会议之前已经结为秘密联盟。虽然法、日当局加以否认，但大多数人仍信以为真。但不管怎样，法、日必定会走到一起，既然现在英日联盟已经告终，英法联盟也只是表面亲热。华盛顿会议、日内瓦会议已经埋下了将来战争的种子——除非出现奇迹，这些“文明”国家将自相残杀。

第十章

远东当前的各种势力与发展趋势

远东的情况如此复杂，因而很难猜测华盛顿会议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更难知道我们究竟应该期望什么样的结果。我将逐一讨论今日远东的各种势力，这并不是想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是要对中国作一个细密的观察。我将探讨美国、日本、俄国及中国的利益与愿望，看一看哪些利益与愿望是与全人类的幸福一致的。[①]

首先谈一谈美国。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角，也是当今世界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大国。美国的舆论主张和平，同时坚信美国是智慧和善良的，而别的国家都是愚鲁和凶恶的。这种观点的消极部分在此不作讨论，其中的乐观成分足以引起我们的疑问。美国人除了信仰和平之外，还有工商业、新教道德、体育、卫生和伪

① 原注：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除了印度问题外，大致与美国相同。

道德，伪道德可以看作英美文化的主流。我在远东所遇到的美国人，除了极个别的之外，都以宣传美国文化为己任。我所说的伪道德，并不是指像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交涉时刻意为之的虚伪之举，而是那种层次更深、不为人们所觉察到的伪善，它构成了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支柱。大家都知道拉布谢尔是这样评论格拉德斯通的：与其他的政治家一样，他总是有一张牌藏在袖子里；而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是，他认为是上帝把那张牌放在那里的。这种典型的英国态度，在萧伯纳等人的嘲讽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净化。但是在美国，这种态度仍然像我们50年前那样盛行，那样坚信不移。格拉德斯通时代的英国比今天的英国更有一种道德力量；而此时的美国比起其他国家（俄国除外）更是如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格拉德斯通的道德狂热，发展到他的继承者的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美国也必定会有同样的发展。因此，当我们想要估量一番美国的影响时，我们不得不斟酌一下，这样做的话，将来我们肯定会失去高尚的理想。

高尚的理想本身也未必能给信奉它的人带来纯粹的幸福。高尚的理想与遇事忍耐、“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做法格格不入。只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可以容忍，因而使它的居住者不那么好斗和精力旺盛。艺术或沉思冥想很难容于这个喧扰的氛围，就像要在春季扫尘的喧闹之中写就一本书那样不可能。激发在春季扫尘刷污的思想，本身是非常有用和可贵的，但这些思想若没有其他东西加以丰富，则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十分凄惨纷扰的世界。

乍一看，上面这些话和华盛顿会议的问题稍微扯远了一些。但如果要较好地理解美日之间的冲突，这番话却不觉多余。我认为美国是迄今为止与中国最友好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中国最大的仇敌；美国比别的国家更积极地推进世界的和平，而日本则只要有战胜的机会往往不惜诉诸武力。正因为如此，我更希望我国政府与美国相互提携而放弃黩武的英日联盟。但我并不希望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日本的仇视，也不希望是出于对美国的善意而去盲目依赖。因此，我将试图陈述日本的情况，虽然从现在来看，日本不如美国那样强大。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现今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海军政策与世界的利益是一致的，与它本国的利益也十分吻合。先来谈谈海军问题：如果美国拥有同我国一样多的海军装备，那么，它的势力将会使我国海军部不敢与之作战，这样美国就控制许多海域了。[①] 对于日本的海军装备，美国人不肯让步；法国的潜水艇只能吓吓我们，美国人对此并不放在心上。如果这几个国家能控制海上，那么，限制海军装备不仅仅是降低经费，而且各国都同样有好处，美国并不牺牲什么。其次，探讨一下中国问题。美国对于中国的野心表现在经济上，它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的工商业开放门户。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对于美国这种本身物产丰富而经济发达的国家来

---

① 原注：美国从华盛顿会议后经常根据会议中商定的海军比例，去劝说国会拨给更多的海军军费。但是，增加海军军费并不符合美国的民意。不过，如果以和平为名义，政府就能从不情愿的纳税者口袋里得到所需要的款项。参见《泰晤士报》驻纽约记者发回的专电，刊于《泰晤士报》1922 年 4 月 10 日，又见 4 月 17 日和 22 日。

说不如开放门户有利。因此，尽管美国对中国以及对海军实行宽大政策，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有理由期待当事情的发展与美国的自身的利益有抵触时，美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

事实上，每当事情的发展涉及到美国的利益或偏向时，宽大的和人道的原则就没有任何份量了。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巴拿马运河的通行税，二是与俄国通商。根据条约，美国不得歧视经过巴拿马运河的英国船只，但众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一项优待本国航运的议案。即使总统最终否决这项议案，这项议案的地位也足以表明，在履行条约义务方面，众议院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持与贝恩曼—霍尔威格相同的观点。在与俄国通商这件事上，英国最先与俄国有贸易往来，而美国则一如既往地仇视布尔什维克，并且冈珀斯假借美国工人的名义，大骂我们"与杀人者握手"。由此来看，美国的政策很明显并非都是以名誉、人道主义和宽大为前提的。事实是：美国只有在不违背本国的利益，包括资本的利益时，才采用这些美德，但它却未能看到这些美德也同样适合其他情况。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只需再举一例就够了，因为这个例子与中国有特别的关系。美国《自由人》周刊1921年11月2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现我摘录如下：

> 11月1日，中国政府欠芝加哥某银行的550万元的债款到期，无力偿还。美国国务院曾经给这笔款项的协商提供过方便，现在答应在紧急情况下由政府出面帮助银行，于是

就发了一封电报给北京政府，威胁说久借不还会对中华民国在财政上、政治上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属于新银团的几家美国银行答应向中国政府贷款，以偿还芝加哥银行的欠款等旧帐，以及于12月1日到期的欠款。国务院完全赞同这一提议。这就是说，美国的金融界与政治家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们合力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局面之后，在紧要关头很漂亮地挺身而出，把中国从自己手中救出。假如中国政府迫于无奈与新银团打交道的话，就为日后把中国变为美国的财政保护国打下了伏笔。

这里应该补充一下，北京政府经过多次的磋商，决定不采纳新银团的条件向其贷款。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上述引用的《自由人》周刊的结论如下：

如果这件事得以实施，那么新银团的银行就不啻是中国的主人了，而其中也只有美国的银行能完全利用这种局面。

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之初，新银团企图假借会议的力量在中国推行国际共管，对于这一企图英国假装不知道，但美国政府却是很明白。我发现《日本周报》1921年11月17日那期上有一则题为《中国之国际共管》的专电，报道美国想在中国建立国际共管一事。顾维钧对《费城公报》说："我们对于提议国际共管的动机

充满怀疑，并且我们十分怀疑共管的可行性。中国将激烈反对华盛顿会议计划提供给中国的任何国际援助。”他又说：“国际共管于事无补。应该给中国以时间和机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各国不应该误解或夸大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骚动。”对于这番明智的话语，凡是中国人的朋友都会表示赞同的。在同一期《日本周报》上——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周报——我发现如下的文字：

> 有人引用辛博森的话：“新银团有计划在中国实行国际共管。拉蒙特先生代表新银团向中国政府贷款1600万元，但拉蒙特同时坚持要求中国用这笔贷款支付摩根公司得到的湖广债券中由德国发行的部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拉蒙特得知此事后竭力否认：“辛博森一派胡言，辛博森此人讲述反对新银团管理一事时，简直是发疯了。我们并不想管理中国。我们迫切希望华盛顿会议能产生一个解决的办法，给中国人以充分的机会来把握自己的命运。”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拉蒙特如此怒不可遏，肯定是由于被点到痛处了。如果不是要有所隐瞒，怎么会对一个知名作家而且是中国人的好友直呼“辛博森此人”呢？

我并不认为针对新银团的证据是确凿无疑的，也没有篇幅把各种证据罗列出来。但是，任何激进的欧洲人听了拉蒙特关于新银团不想管理中国的言论，都觉得似

乎有点自相矛盾。向将要破产的政府贷款，目的肯定是为了要参与管理，因为即使没有芝加哥银行一事，就以摩根公司来说，如此不考虑所贷之款能否得到利息的善举，是不可能让人相信的。虽然新银团在中国的代表声称情况确实如此，但这只不过更引起中国人的怀疑而已。

1921 年 11 月 30 日的《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布雷斯福德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平的新手段》，恐怕这篇文章还是有预见性的，即使该文在写就时并不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如果美国人在远东取得成功，我估计将发生以下情况：中国不得不整顿秩序让外国发展工商业；一个被西方人称为良好的政府将取代今天的随心所欲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多的财产从中国流入投资国，其中主要是美国；出力流汗的无产阶级将得到发展；基督教广为传播；美国民主取代中国文化；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除了被美国的富翁视为有购买价值的以外，都将遭到毁坏；中国人对外来侵略逐渐觉悟；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将会有一秘密社团把在华的白人赶尽杀绝。上述情况无可避免，因为以人的本性来看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所以，西方人想管理中国的目的无非是使富人更富而已，但他们肯定会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中国有个良好的政府。“良好”这个词解释起来挺困难，而“良好的政府”解释起来就方便了，所谓“良好的政府”就是能够让资本家赚大钱的政府。

中国人温文尔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他们的青年改良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使中国复兴，而且其结

果肯定胜过我们碾碎一切的大机器文化。将来，等到"少年中国"成功后，美国不需要破坏中国的精神也同样能与中国通商并获利。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无政府的时代，以找到正确的轨道；世界上的大国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在 1861 年至 1865 年也有同样的经历。当时，英国企图加以干涉，想取而代之设立一个良好政府，所幸没有成功。现在，列强都想干预中国。美国对昔日来自旧世界的干涉恨之入骨，但对自己的新银团干涉中国却视而不见。我呼吁美国人应该承认别国的人民和自己一样，不要再感谢上帝，自己不是被逐出教会的人。

我之所以这样责难美国，是想为日本辩护几句。

日本原本不愿与列强有纠葛。日本人闭关锁国，希望世界能任其自便不加干涉。但这却不合白人的心意，尤其是不合美国的心意。正是海军准将佩利率领的舰队，让日本人感受到了外来侵略。日本人不久就明白，对付白人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俯首称臣，二是拿起武器与白人作战。日本人选择了后者，效仿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美国的机器和这几个国家的先进的现代制度，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军队。白人之中除了英国人都吃惊不小，把日本人叫作"黄猴"。但自从日本战胜俄国后白人都对它刮目相看，在其攻克青岛、掌握了中国的大半主权后，日本更是有资格在凡尔赛会议上与列强平起平坐。西方各国之所以重视日本，完全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军备而徒有其他长处恐怕仍然难免被白人轻视。

白人在与其他任何不同肤色的民族交往中造成的种族歧视之深，没有亲身经历的欧洲人恐怕是很难想见

的。我曾经见到一些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与英奇[1]一样有教养的中国人，他们所受到的白人的无礼，哪怕英国的公爵对清道夫也不至于如此。日本人因为有强大的海陆军作后援，白人不敢施之以这样无礼的态度。作为个人的白人不再敢欺侮个体日本人，这个重要事实意味着白人对整个有色人种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如果日本战败而失去强国的地位，那么，一般有色人种也将受连累，白人的骄傲又要旧态复萌，而与工业文明大相径庭的东方文化也将失去这个最后的幸存机会。

日本的文化从物质上来看除了工业并不是很发达外与西方是相似的，但从思想上来看则全然不同，尤其是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区别更大。日本人在每一个乡村学校里宣扬崇拜天皇为真神的思想，成效卓著，这种崇拜还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民众的支援。日本这个国家的目的不全在经济上，还有皇朝的、土地的等一些中古时代的观念。日本人的道德观不属于功利派，比较高尚。孝是基础，又因为视天皇为百姓的父母，所以忠也包括在内。13世纪的欧洲对于皇帝和教皇两者关系的解释纯粹出于迷信而缺乏现实主义的思想，日本人也是如此。但是，欧洲的皇帝和教皇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们之间的争斗会促进思想的自由；日本从1868年后皇帝和教皇就都集于天皇一身，两者之间没有冲突也就不会让民众产生怀疑。

---

① 译注：即威廉·拉尔夫·英奇(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英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曾任圣公会伦敦圣保罗教堂主任牧师，专门研究古代哲学，以其悲观主义闻名，著有《基督教神秘主义》等。

日本与中国不同，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家。同样一个命题，中国人在未证明真之前就采取怀疑的态度；而日本人则在未证明为假之前深信不疑。我就没有听说有谁提出证据来否认天皇的真神地位。日本的宗教与《旧约》中犹太人的宗教一样为国教。它的国教——神道教是1868年之后创立的，通过学校的教育加以宣扬（以前也有称为神道教的，但现在的神道教已面目全非）。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性的宗教不同，神道教是部族的宗教，只要求日本人信仰就够了。佛教与神道教同时并存，同为日本人信仰。日本人在婚礼上采用神道教的仪式，而葬礼则采用佛教的仪式，这是因为佛教更适宜于这种悲恸的场合。尽管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但日本的佛教就像英国的基督教一样有浓烈的国家色彩。有不少僧侣娶妻，而且在有些寺庙中僧侣的职位是世袭的。寺庙中的显贵人物让人想起英国的大主教们。

日本即使采用了机器化生产，仍能使他们的美感的天性蕴含其中。大家都抱怨日货低劣而不知道他们有将艺术品味应用在工业中的非凡能力。如果日本足够富有的话，或许能用美国纽约的最新技术建造出威尼斯那样美丽的城市来。现代工业所到之处往往伴随着许多丑恶现象，如果有哪个国家能使这种浪潮消退，实在值得我们感谢。日本人富于感情，意志坚强，工作勤奋，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但他们也有相关的缺点：缺乏幽默感、残忍、偏执、不善自由发挥。当然，并非每个人都那样，你可以碰到许多非常优秀的日本男女。从总体上来看，日本文化中最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强健与果断。

在日本，工业发达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也

随之发展。在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些空谈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但由于没有工人组织，他们的理论几乎没有发展的余地。而在日本，工会的发展很快，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见解都十分活跃。将来，日本工业化程度增加，社会主义或许能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但现在还不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与别的国家的一样，他们都不相信国家灌输的种种迷信。他们经常为此受到政府的迫害，但据一位知晓内情的美国人告诉我，其程度远不及美国。

真正的实权仍然在几个贵族家庭手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依照宪法直接对天皇负责而不对国会或首相负责。因此，他们的政策即使不为外务省同意也仍可以坚持。例如，外务省答应从海参崴撤兵，但陆军省仍可按兵不动，这样的局面在宪法上却没有补救的办法。这就可以解释有时日本政府缘何对外失信。自然有政党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政府，但现在的政权如果不在外交上遭到极大的失败，这个政府恐怕无法得到实权。如果华盛顿会议从外交上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不仅从山东，而且还要从海参崴撤兵，那么，日本内部的政治或许会大有改观。

日本人深信自己在国际上没有朋友，而美国更是他们誓不两立的仇敌。人们推断，日本政府认为与美国的战争终不能免。他们的论据是，美国的经济扩张不能容忍太平洋上有这么一个工业发达的强敌与之竞争，或迟或早，日本人要么饿死要么与美国人拼死于战场上。武士道的精神会选择战死而不是饿死。海军大将佐藤说：美国人缺乏武士道精神，再加上他们孜孜求利，无法忍

受长期征战的困苦，必败无疑。这种胡说八道真是浪漫之至。在现代战争中，武士道精神毫无用处，而且美国人的勇敢坚毅不下于日本人。如果两国交战，哪怕历时10年，最终必然是日本败北。

人们经常想到1914年之前英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德国人效法我们，试图建立殖民帝国，日本也是这样。当别的国家采用这些同样的手段时，我们认为这些手段十分邪恶，美国人也同样如此认为。德国人发展其工业，他们的竞争遭到我们的仇视；日本与美国争夺远东的市场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德国人被我们的联盟国所包围，他们认为四面受敌，而我们认为这纯粹出于自卫的策略。同样，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将我们英国人拉到自己一边，日本人也觉得孤立无援（法国的同情除外）。德国人最后差不多是由于自己的恐惧所逼，对全世界宣战，但最终失败；日本人恐怕也难以避免重蹈覆辙。大战前德国的种种做法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大家对此都很清楚，我在此不必赘述，因为这些也同样适用于日本的情形。不过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德国人的目的是称霸全球，而日本只想成为远东的霸主。

美日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由经济上的原因引起的，但经济上的竞争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狂热追求。日本仍然信仰天皇的神圣权力，而美国则信仰商业的神圣权力。我有时想以对外贸易的扩张未必于国家有好处来劝说美国人，但终归觉得没有用。美国人也同样深信自己的宗教、道德和文化远胜于远东。尽管欧洲人大都持这样的观点，但我却认为荒谬之极。日本人竭力保存自己的文化，力图免为欧美文化所侵蚀，从这一点

来说我们应当同情日本人。美国人比欧洲人有更深的种族歧视观念，但日本人却一定要证明黄种人并不比白种人差。从这一点来说，正义和人道主义都在日本这一边。所以从经济上、外交上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来看，我的感情倾向于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

但不幸的是，日本人由于缺乏忍耐力和傲慢的缘故，常常误人歧途。他们应当考虑到中国也同样要向白人要求正当的待遇；那么，他们就能成为自己一向自诩的亚洲反抗欧洲的斗士，中国就会表示感激，并且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中国的友邦，那么，中国一定会全力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比欧洲人更加轻视中国人，他们并不想打破人们认为东方民族低劣的想法，而是想将自己视为属于西方。因此他们招来中国人的憎恨也很正常。但这种行为使得最善良的美国人也相当仇视日本。如果美国除了这些最根本的原因外并无理由仇视日本人，那么，日本人将会在美国找到许多斗士；事实表明，他们实际上一个也没找到。但这还不太晚，日本现在仍然可以得到中国的善待和最善良的美国人的尊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并采用更民主的宪法；但如果这两件事办不到，那么，日本将会像德国那样招致失败。日本的失败将成为世界的大不幸。

美日如果发生战争，这本身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而战争的结果就更加可怕了。日本文化将遭到毁灭，中国文化也将为西方文化所征服，而美国必然会用武力在全世界推行帝国主义。所以，应想方设法避免美日之间的战争。要避免这场战争，日本必须变得更加自由；而只有现政府垮台日本才会更自由。所以，不仅是为了日本

也为了中国的利益考虑，如果英美运用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归还山东甚至除了旅顺及其周围地区以外的整个满洲，局势就会好多了（之所以将旅顺除外，是因为除非通过战争日本是不肯归还的）。我们与日本的联盟在日俄战争之后为日本的种种不端行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并不比我们坏多少，只是某些仅允许列强犯下的罪行日本在早期就犯下了。我们之间的联盟成了日本罪过的一个助因，现在这一联盟的告终成了日本改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来探讨一下俄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位置。欧洲人似乎以为现在的俄国已经老朽没落，其实不然。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正在挨饿，工业也呈停滞状态，这确实不假。但在一个组织得高度严密的国家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俄国仍然能够在波斯和阿富汗偷偷逼近我们，在外蒙古偷偷逼近日本。俄国仍然能在亚洲各国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这些宣传之所以能够产生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允诺帮助亚洲人民摆脱欧洲的羁绊。在中国，除了年轻的学生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工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等到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逐渐恢复实行资本主义时，中国学生对它的信仰自然也会减少。而且在俄国实行的布尔什维主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理由如下：(1)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在一个中央集权巩固的国家才能实行，而中国政府的力量极其薄弱，有联邦制的趋向。(2)布尔什维主义对政府的要求十分高，个人生活受政府干涉较多。而中国的个人自由倾向较重，无政府主义或许倒能够在这个国家得到成功的应用。(3)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私人贸易。但在

中国，这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读书人)。从上述原因分析，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信条在中国不可能有大的进展。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不是一种信条的话，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用以说服阿富汗的阿米尔或蒙古游牧民族的论据，虽然证明很成功，但却与用以和兰斯伯里先生讨论的十分不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亚洲的扩大并非是一种特殊的布尔什维克现象，而是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执行这种政策的人比沙皇政权的官员们更加精力充沛，更加聪明，也更加清廉一些。而且，他们与美国人一样，不仅推崇帝国主义的扩张，还自认以解放人类为天职。这种信仰给布尔什维克的帝国主义注人了活力和成功，产生了在亚洲扩张其势力的念头，若不是新廓尔察克人向外求援恢复了王位，这种扩张恐怕短时期内不会停止。

因此，国际局势如果从某些方向发展，苏俄将设法重获满洲，恢复到以前能左右北京政府的那种状况，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得到了北京，它就能控制满洲。但是，当日本没被惊扰时，要成就这桩大事恐怕很难办到，而如果日本与美国或英国发生战争，俄国就可乘机而行了。因此，俄国要在10年、20年之内恢复日俄战争前在中国的地位，这个设想完全有可能。我们必须记住：俄国人具有殖民扩张的天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就一直不停地向东扩张。虽然这种势头在过去的7年里为许多灾祸所遏制，但不久恐怕又要抬头了。

我认为，俄国成为亚洲的霸主并不足为虑。它的势力不至于强大到能像英国或美国或日本那样欺压他国。再者，俄国人具有亚洲人的眼光和性格，能与亚洲人平

等交往、相互理解。但是，英语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亚洲能联合成一体，这个集团恰能强于保护自身而弱于攻击他国，这就是和平。因此，如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整个人类的利益都求之不得的。

那么，中国的利益又何在呢?对中国来说，最十全十美的事莫过于收复满洲和山东而又没有外来干预。中国的混乱局面或许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平息下来，而最终产生一种适宜的制度。而如果以外力结束这种局面，这就意味着建立一种有利于外国的工商业而不适合中国人需要的制度。17 世纪的英国，18 世纪的法国，19 世纪的美国，现在的俄国都经历过数年的内乱，这是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外来干涉只能严重影响事情的最终解决，而不能缩短这一过程。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西方的政治思想扫除了几千年的帝制，但仍然未能有坚定的制度来取而代之。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我们并不了解。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然而，要想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对中国有利，这样的希望非常渺茫，作出对中国有害的决议却大有可能。在满洲，现状仍然维持着；在山东，虽然日本作出让步，但这种让步究竟能有多大作用还有待时间去证明。美英法日四国一致同意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而不是相互竞争。贷款的新银团将控制中国的财政，因而它将是中国的真

正政府。因为这四国中，只有美国富余的资本最为雄厚。所以它将控制着新银团。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所以它肯定会设法把中国人变成肌肉基督徒[①]。财政家是美国文化中的骄子，所以中国的管理必须使美国的金融家赚大钱，而这些美国的金融家又将在中国遍设大学、医院、基督教青年会，还会派人购买中国的艺术品来装点自己的宅邸。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将直接地或间接地为托拉斯大亨收买，因而没有人为激进的改良方式大声疾呼。创建这种制度，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也会有人鼓掌欢迎，认为这是和平和自由的胜利。

然而，如果想通过资本主义而得到和平与自由，不啻是缘木求鱼。英法日美四国的协议或许是可以保障和平，但在距和平更近的同时，却把自由推得更远了。所谓和平，就是本来互相竞争的几个公司联合起来，但这只对以前在竞争中获利的公司有利。不违反门户开放政策也有可能管理中国。这种原则只不过是担保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有发言权，因为美国是财政上商业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兴趣在于实现一些有利于中国的利益的事，也做一些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事。比如，美国为了自身通商和投资的利益，希望中国能建立巩固的政权，人民的购买力增加，不受他国的侵略；但不希望看到中国自己拥有和经营路矿，也憎恨任何试图使中国经济独立的尝试，尤其是当这些尝试以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时。美国控制着的大学里接受教

---

① 译注：肌肉基督徒，主张除坚定信仰外应使肉体强健，过快乐的生活。

育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很有可能记录在案，如果被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或有激进的思想，那么，他们将找不到工作。高尔基访问美国时遭到了驱逐。这样的伪道德，美国人也同样要加之于中国。美国式的整齐将取代中国的美丽。一言以蔽之，他们坚持要求中国尽可能转变成“上帝自己的国家”，但就是不允许中国保留发展本国的工业带来的财富。中国人完全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可与其过去所贡献的媲美的新文化。但美国人的摆布会阻挠中国，因为美国人自信他们的文化完美无缺。

资本主义如果取得胜利，它将以组成托拉斯的方法减少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但工人之间的竞争却依然如故。在某种程度上，工会制度减弱了发达工业国家中工人的竞争，但却更加剧了不同种族之间工人的竞争，尤其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①] 在现有经济制度下，亚洲的廉价劳动力使得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本地白人颇受影响。然而，熟练工人流入人口稀少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则是人人受益。就社会主义来说，如果流入的人口生产比消费多，同一个社会的人就受益了，因为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增加了。但就资本主义来说，如果一

---

① 原注：1922年4月5日的《泰晤士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是该报驻墨尔本通讯员发回的专电，它很能说明白人工人对待亚洲工人的态度：“造船商和联合贸易的代理人对首相休斯先生抱怨，4艘英联邦的船都是在安特卫普修理的而不是在澳大利亚，而且还有2艘船也在黑人工人每天只挣8安那的印度进行修理。当代理人谈到黑人工人时，休斯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并对拜访者说：‘该死的黑人，滚到一边去。不要对我说那些黑人。’他推开那个代表快步走出了房间……”我一般并不赞同休斯先生，但这一次我却能深切地体会到他的感情，暂且把“该死的黑人”一句想成是赐福吧。

个人生产多而消费少，就会成为他人的仇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造成了没有效率的工作，而激起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总体利益的冲突。黄种工人在美国及英国自治领内遭到排挤，就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利益冲突的一例。亚洲移民问题，足以成为将来数百年的大问题，这只能用社会主义加以解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乃至世界的利益相一致。

世界上的资本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资本的过度集中很容易榨取其他国家的财产。这样的制度显然无法维持长久的和平，只能使贫穷的国家最终彻底屈服。中国一定要明白决不能让工业利润流入外国人之手。假如俄国今天由于贫困而屈服于外国资本，那么，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俄国必然起而反抗称霸世界的金融帝国。所以我并不认为华盛顿会议所创设的新银团能够建立永久的世界制度。相反，当亚洲完全吸取了我们的经济制度时，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将表现为亚洲与西方之间的战争，这其中美国是欧洲和资本主义的领袖，俄国则是亚洲和社会主义的领袖。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亚洲将为自由而战，但很有可能来不及保存对人类有特殊价值的亚洲文明。确实，经历这样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所有的世界文明都难逃厄运。

总之，能够左右世界的，除了足以引起公共注意的问题，就是大金融家。亚洲的劳工在美国、加拿大被排挤，无疑是由于民众的压力，但这并不符合大金融家的利益。但能使民众如此激动的问题实在不多。在此类问题中，只有极少数的问题能像这样简单明了地反映出资本家的利益。比如亚洲移民一例，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

度才使工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发生冲突，使他们不能容忍他人。当今的经济制度使个人的利益在重大的事情上与全体的利益相左。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国家利益同世界利益很少有统一的时候，即便有也是很偶然的。也许可以想象，要在现存制度下实现世界和平，只能让强国联合起来欺凌弱国。华盛顿会议正是产生了这种联合，但从长远来看，弱国仅存的一些自由将更加减少。

正如社会主义者一再指出的那样，现在的经济制度的弊端是：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利，而不是为了消费。一个人或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制造产品，是为了销售，而不是消费。由此而在国内的劳工问题及与国际上的关系引起了竞争、侵略和其他恶果。中国如果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商业，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价格增高，但同时大部分原材料也因此涨价；这种做法人为地刺激外国货的需求，使中国受制于外国供货商，也使得现在的快乐心境遭到破坏，而狂热地去追求纯粹的物质需要。若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里，代表消费者的机关将会控制生产，所有买卖的竞争将为之停止。到那时，不论是屈服于剥削而得到和平，还是征战不息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但终究无法使和平和自由兼而有之。现今美国政策如果能够成功，在一定的时期内或许能得到和平，但决不可能给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带来自由。恐怕只有国际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两者兼得；但是，由于反抗资本家压迫的运动时常爆发，即使单就和平而言也要等到国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建立才能有保证。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的对比

正如我们前几章所言，在现今中国，我们的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有着密切的接触。只是接触的结果，到底是产生胜于这两种文明的新文明，还是破坏固有的文明而代之以英国的文明，这一点还是问题。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只是因为我害怕我们是不可教育的。

本章将着重讨论中西交往带来的纯粹文化方面的问题。再接下去的三章将讨论中国内部条件的问题，最后一章则讨论在目前困境中

未来的希望。

两种文明各自独立发展了如此长久之后再接触的，除了16世纪的西班牙与美洲之外，中国与欧洲恐怕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了。考虑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完全隔绝之后仍能并不怎么困难地互相理解，实在令人称奇。为了弄清这一点，值得先追溯一下这两种文明的历史渊源。

西欧和美国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是同质的，我们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与伦理；(3)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我们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元素的代表。遗传至今，仍各行其是，互不相关。从希腊文化中，我们继承了文学、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社交上优雅的礼仪；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到了狂热的信念（及其好朋友，名叫"信仰"）、更为狂热的道德热情（包括原罪观念），还有宗教的不宽容和我们民族主义中的一部分；从科学那里，如同应用在工业主义中一样，我们得到了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的信念：我们得以像神一样去操纵未科学化人种的生死，由于科学，我们得到了经验的方法，并已获取了几乎所有的真知。

除了希腊间接地对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有影响之外，这三种元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看不出有任何作用。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文明的帝国。埃及和巴比伦影响了希腊和犹太的文化，因而间接地成为我们文化的源泉。正如这些文明产生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冲积土壤一样，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即使是孔子时

代，中国的版图也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南北的范围。尽管在物质和经济上，中国与埃及、巴比伦的情况相似，但在精神面貌上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老子、孔子虽然同处于公元前6世纪，但已具备了今日中国人的个性特点。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原因的人，就难以说明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面貌何以不同。我也提不出可取而代之的理论。我认为，科学目前尚不能完整解释民族性格。气候和经济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说明全部问题。可能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的性格，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

中国最早的圣人是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真正而确切的名字，只是意为"老哲学家"。(据传说)他与孔子同时代，但稍早一些。我对于他的哲学比对孔子的要有兴趣。他认为每个人、每个动物乃至世间万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的方式方法。我们都应该服从这个方式。所谓"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但老子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如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①] 这段文字。我想，他是这样想象的：死是由于离开了"道"，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按照自然去生活，就可以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后来，道教仅仅退化为一种巫术，几乎只关心探寻长生不老之药了。但是，我认为，希望逃脱死亡，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子的著作，或者说被认为的老子的著作，篇幅很

---

① 译注：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

短，但他的思想被他的弟子庄子发展了，庄子比他的老师更让人感兴趣。他们都提倡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他们贬低政府，贬低对自然的干涉。他们抱怨当时忙忙碌碌的现代生活，将之同"古之真人"平静的存在进行了比较。道的学说颇有些神秘主义的味道，他们称万物虽众，但却同道，如果都能遵循道，那就天下无争了。这两位圣人虽然远在两千多年前，但已具备了现时中国人那种幽默、克制和含蓄的特点。他们的幽默，可以用庄子对"善治马"的伯乐的阐述来说明，因为伯乐驯马每十匹要死五匹。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相比，他们的克制和含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特点，还是当今中国有教养人士谈话的特点。社会各阶层都喜欢逗乐，从不放弃任何开玩笑的机会。受过教育的人，其幽默是机敏而巧妙的，欧洲人往往不解其意，却给中国人增加了不少快乐，他们含蓄的习惯就更加明显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告诉我他对政治学理论有点学术上的兴趣。那时我刚到中国，只理解字面意思，后来才发现，他曾经担任一省之长，多年来一直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中国的诗往往缺乏激情，也是由于崇尚含蓄。他们认为智者应该表现出平和，虽然不乏激情的一刻（实际上中国人易于激动），但他们也不愿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的浪漫主义运动使人喜欢的刺激，据我目前所知，在中国文学中找不到。他们古老的音乐（其中有些很动听）音量很低，刚刚能听到而已。在艺术上，他们崇尚精细；在生活中，他们追求公理。中国人并不赞赏粗鲁的莽汉和不加限制的感情表达。刚刚远离西方尘嚣的人，一时难免乱了方寸，不知就里；等到时间久了，就能

逐渐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美满可贵，所以在中国住的时间最长的外国人就是最热爱中国的人。

道教徒虽然作为巫师而得以代代相传，但却为受过儒教教育的阶层所排挤。必须承认，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他的作品中大都是各种繁文缛节以及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得体。然而，与其他时代其他人种的教主相比，人们必须承认他具有极大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主要是消极的。他的体系，由他的追随者发展之后，成为一种纯属道德而非教条的体系；这个体系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它却理所当然地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中国人的礼节也不仅仅是因袭传统；就算遇到从未碰到的情况，也会很自然地做到礼让。这种礼节也并非限于某一阶层，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也是如此。我们羞愧地看到，中国人用礼节在对待白人的蛮横无礼，他们并没有自我贬低到去用粗鲁回敬粗鲁。欧洲人经常视之为软弱，但这其实是真正的力量。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

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外国的因素，那就是佛教。佛教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取得了巩固的地位。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而不悖。日本的情况也相似，大多数日本人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然而，佛教与孔教在气质

上总有些不同，所以同时信两教的人，肯定会有所偏向。佛教，就是我们从“宗教”这个词所理解的宗教，有神秘的教理、救赎的途径和来世的生活。佛教认为痛苦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信仰的人必然失望，失望和痛苦只有信奉经典的真理才能得以解脱。儒教却没有这些东西，它认为人生来就是与外界融洽的，所需要的只是指导如何生活，根本不需要鼓励人们生活下去。而且，这种伦理上的训诫，不是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者宗教的教条，它完全是世俗的。所以孔、佛两教并存的结果，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就趋于孔教。孔教一直被尊为国教，成为考试的依据，进身的阶梯。所以，中国的政治一直操纵在有文化的宗教怀疑者之手。他们没有西方执政者的那种活跃和破坏的素质。实际上，他们只是严守庄子的教诲而已。其结果是：老百姓除了内乱之苦外，一直是安居乐业的；属地享有自治权；中国虽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

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希腊文化也可以找到，但我们文明中另外两个元素：犹太教和科学，中国文明中没有。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仅上层社会没有宗教，全体人民也同样没有。虽然有相当明确的伦理制度，但不过激、没有迫害性、而且没有“原罪”观念。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中国才有了科学，有了工业主义。

那么，这个古老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接触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是考虑政治上、经济上的结果，而是考虑对中国人精神面貌方面的结果。把这两个问题分

开是困难的，因为与西方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会受到政治接触、经济接触的本质的影响。然而我希望能尽可能单单讨论文化问题本身。

中国很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不仅因为这些学问可以增强国力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而且有很多人觉得学问本身就是一样好东西。中国人向来重视学问，只是以前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古典文献。现在，他们普遍意识到西方的知识更有用。每年前往欧洲学习科学、经济、法律、政治理论的留学生不少，尤其去美国的就更多了。这些人回国之后，大多成为教师、公务员、记者和政治家。他们迅速地将中国人的面貌现代化，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

中国传统文明变得不再进步，不可能在艺术和文学上产生多大价值。我想，这不是由于人种的退步，而是由于缺乏新的素材。西方知识的输入正好提供了它需要的刺激。中国学生的能力很强，思想异常敏锐。虽然高等教育深受经费紧缺、缺乏图书馆之苦，但不缺一流的人才。虽然中国文明中一向缺少科学，但并没有仇视科学的成分，所以科学的传播不像欧洲有教会的阻碍。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 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事实上，“少年中国”这种对科学的热情，令人不断回忆起 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中国人向我们学习，不像日本人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追求伦理和社会价值，追求知识上的兴趣。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 1914 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

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然而，向往西方智慧的习惯仍然很迫切，有些年轻人甚至以为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正中下怀。他们肯定会大失所望，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必须用一种新的信念来拯救自己。日本人效仿了我们的短处，保留的也是自己的短处，但不可能指望中国人作出相反的选择，效仿我们的长处，并保留自己的长处。

可以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老子是这样描述"道"的运作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人们可以从这些话里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概念，正如爱好思索的中国人所获得的一样。必须承认，中国人的人生归宿与大多数白人自己设定的人生归宿截然不同。"占有"、"自恃"和"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趋之若鹜。尼采把这一切归结为哲学，而他的信徒绝不限于德国。

但是，有人或许会说：你是在把西方的实践同中国的理论相比较；但如果以西方的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比较，结果就会相反。当然，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占有"，虽然是老子希望我们抛弃的三者之一，却也是一般中国人心灵的欲望。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也爱财，或许不如法国人，但肯定超过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有权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这一切都是无可否认的。

如果就"自恃"、"支配"这两个罪恶来说，我注意到中国人在实践上肯定超过我们。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

喜欢虐待其他人种。中国在国际上的贫弱，大多数人都以为政治腐败是唯一的原因。其实，“不恃”、“不宰”的美德应该与政治腐败一样负相同的责任。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如果受其他民族逼迫，去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不可能。那样，中国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一尝成为帝国的滋味。但现在，中国人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泊了。

中国历史上虽然征战连绵，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我不知道还有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一个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新兵，威利先生把这首《新丰折臂翁》译了过来。他们的和平主义扎根于他们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正如他们的绘画所展示的，他们乐于观察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不愿将它们按部就班。他们没有决定西方民族那样的进步理想，去让我们活跃的冲动合理化。当然，进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十分现代的理想，它要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今天，那些守旧的中国文人交谈时仍然用他们最早的圣贤的书面语。有人对他说，这样下去几乎不会有进步，他肯定会说：“予等已臻完美之地位，何故再求进步耶？”欧洲人初听之下，肯定会认为他过于懈怠。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则不得不反省我们的所谓进步也不过是一场不息的变更，根本没有把我们朝着向往的目标带近一步。

试着比较一下中国向西方寻求的东西与西方向中

国寻求的东西，倒挺有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知识，他们认为这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其实未必）；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其理一以贯之"，所以就放任我们，而不加以干涉。中国人是不错的商人，但他们的经商之道不同于在中国的欧洲商人，不会动辄采用租界、垄断、铁路、矿产等特权的办法，并设法以本国的兵舰作后援。中国人照例不是好的战士，因为不是师出有名，他们有自知之明。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的理性。

我认为，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像的。我们自认为宽容，但只不过比我们的老祖宗显得宽容一些罢了。但是在政治上、社会上仍实行各种压迫，称不上宽容。更严重的是，我们深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其他民族。如果遇到像中国这样的民族，就认为对他们最慈善的举动莫过于让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这真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从这一点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是迅速地退步了。毋庸讳言，中国的弊病正趋于另一个极端；但是，正由于这个道理，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

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

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可以教我的却越来越多。欧洲人在中国住久了都有这种观点。只有去了不久或那些一心去赚钱的人不这么看。这只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我们所珍视的军队和工业，他们却很薄弱。但是，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的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并视之为乐土。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容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人令人费解，城府很深，不可理喻。如果我在中国有了更多经历之后，或许也会持此观点；但就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时间，却找不到任何依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与中国人交谈，如同与英国人交谈，他们回答我，也同英国人回答一个他们认为受过教育并非全然无知的中国人差不多。我不相信“难以捉摸的东方人”这样的神话。我深信，如果中国人与英国人、美国人一起参加互相欺骗的比赛，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次会有九次取胜。不过，毫无疑问，白人也往往被欺骗、被愚弄，但远远比不上驻伦敦的中国官员所受的欺骗和愚弄。

中国人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是，他们总能得到外国人的好感。欧洲人都喜欢中国，无论是到中国旅游，还是侨居多年。虽然英日订有联盟，但就我所知，在远东的英国人没有谁会像

喜欢中国人一样喜欢日本人。久居中国的英国人会渐渐获得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标准。初来乍到的人会震惊于明显的罪恶：乞丐、极度贫穷、疾病流行、政治混乱腐败。每一个踌躇满志的西方人一开始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根除这些罪恶，当然也确实要根除。

但是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受可以避免的不幸之害，对于白人的热心也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困惑的旅行者的心灵逐渐袭人一种奇怪的踌躇；愤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反省一向不假思索就采用的格言是否有错。兢兢业业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明智？为了防备将来可能发生的灾害而失去许多现时的快乐是否称得上深谋远虑呢？虽然一直在建造大厦，却一直无暇去住，我们将如此度过一生吗？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而置贫苦、疾病、混乱于不顾。但是，作为这些罪恶的补偿，与工业国家不同，他们仍然保存着欣赏文明的能力，逗乐的闲暇，以及沐浴阳光进行哲学讨论的快乐。中国人，所有阶级的中国人，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种更爱逗乐，他们从世间万事中都找到欢乐，一句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的。作为欧洲人，我们会用这段

时间去担心汽车是否在合适的地方等着。富有的中国人会开始讨论类似天体的运行是圆是直之类的问题；他们也可能讨论一个真君子是完全否定自我，还是也会有私字一闪念。

人们会碰到一些白人，他们往往不把中国视为文明国家，并受此种错觉之苦。这些人可能全然忘却了文明的构成要素。的确，北京还没有电车，电灯也少得可怜。的确，美景俯拾皆是，但欧洲人急切地开挖煤矿却使它们可怕起来。的确，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记不住可从《惠塔克年鉴》查到的东西，却善于作诗。一个欧洲人在介绍住所时，会对你说铁路交通便利；他相信任何地方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便于出入。但一个中国人不会提到关于火车的任何事情；你要是问他，他可能会答错。他只会说有一个古代皇帝的皇宫，唐朝一位著名诗人造的湖心亭，适合隐居避世。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观，使得西方人把中国人视为野蛮人。

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需 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而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西方人无法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是基于各自完全不同的传统。但人们会逐步认识到这个观点无论如何不荒谬。事实上，它是一脉相承的价值观的逻辑结果。典型的西方人希望自己成为尽可能多地改变所处环境的原因；典型的中国人则

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这个差别就是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大相径庭的深层原因。

我们在西方崇拜“进步”,“进步”成了一种伦理伪装,去伪装成为变心原因的欲望。比如,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改善了世界,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机器带来了巨大变化,因此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之所以喜欢进步,十有八九是由于喜欢权力,欣赏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一声令下,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为了得到这种快乐,一位美国青年拼命工作,等到有了几百万时便成了一个胃病患者,只能靠吃吐司和白开水来维持生命,成了为客人准备的宴席中的旁观者。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仍然自我安慰:我能掌握政权或制造战争或阻止战争,以便于投资。正是这样的天性促进了西方国家的“进步”。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们要少得多。他们的雄心与我们形式不同——但不见得好,而是欣赏权力的偏好。这种偏好造成的自然结果是,贪婪成了中国人的缺点。金钱是享乐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得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去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当然,很明显,这样的当权者,其危害仅限于他们管辖的省份,比起我们自己的政治家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不惜将整个欧洲大陆闹个天翻地覆,对这个世界的伤害显然

小得多了。

中国政治的腐败和混乱，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不是世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企图，中国政府比起我们“有效率的”政治危害更小。现代各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十有八九是有害的，所以政府干得越糟越好。中国政府虽然懒惰、腐败而愚蠢，反而有一定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上其余地方却全然丧失了。

和别的地方一样，中国的法律也很糟。有时在外国势力的逼迫下，宣传共产主义的人会像在英国和美国一样遭到逮捕。但这是一种例外。事实上几乎有这样的规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较少受到干涉。[1] 个人不必感到须被迫听从长官，像 1914 年以后的欧洲和 1917 年以后的美国。人们依然独立思考，并敢于公开自己的想法。在西方，个人主义已被消灭，但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市场，虽然有误用者，但也不是没有好处。自我尊重与个人尊严，可能体现在每一个中国苦力身上，而我们可能只有少数金融寡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如果你不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如果你和中国人交谈时违反了礼节，如果他不怪罪你，肯定会置之一笑，把你的话当作戏言。

---

① 原注：这已经使那些试图在上海建立十分严厉的审查制度的外国人感到困惑。参见《上海出版业地方法规》，董显光，《远东评论》，1922 年 4 月 15 日。

我在中国教书时，有一回认为学生们还不够用功，就把应该对英国学生说的话对他们说了，但马上意识到我的话过头了，他们都强装笑颜，甚为不安，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委。中国人的生活，即便是最现代化的人，比起我们也要有礼得多。这当然影响效率，但同样(更重要的是)也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诚。如果我是中国人，就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礼让。但是，对备受西方野蛮之苦的人来说，中国的礼让就显得十分怡然。它与我们的坦率相比孰优孰劣，我尚难权衡。

中国人与英国人有个相似之处：喜欢妥协和尊重舆论。一种冲突很少会演变为极端野蛮的个案。他们对待清朝末代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当一个西方国家改制为共和之后，往往要割下这位被废黜的君王的脑袋，至少也是流放外国。但中国人则保留皇帝的称号、华丽的皇宫、服侍的太监、还有几百万的年饷。他不过是一个16岁男孩子，却能安居于紫禁城中。有一次内乱，他曾被恢复了几天名义上的权利；虽然不久就又被废黜，但却并不因为他被人利用而受到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一旦形成便是真正的力量。人们一致认为，1920年夏安福系失败，就是由于为舆论所不容。安福系亲日，从日本得到大批贷款。仇视日本是中国政坛最强大最普遍的情绪，它是由学生的激进的演说中煽动起来的。安福系的兵力开始是占优势的，但那些士兵一旦了解到打仗的原因后，立即开了小差。安福系的对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占取了北京，改换了政府。

公众舆论的影响，也对教师罢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离开北京时有了点转机。北京政府由于腐败，总是

财政吃紧，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工资，教师最终以罢教向政府索讨，并组织了一个和平请愿团，有不少学生也跟在后面。他们与士兵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教师和学生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重伤，舆论为之大哗。因为在中国，对教育的热爱是深广的。各报大呼革命。政府刚刚给了个来京索讨的督军900万元腐败支出。政府拖欠几十万的教员工资，找不到任何借口，不得不屈服。我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公众感情决不会由于教师的缘故而沸腾到这种程度。

中国人的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清楚地感到外国的威胁。他们完全知道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种种行径，也意识到英国人在香港竭力破坏广东政府在南方引进好政府的计划，也明白世界列强无一例外地用贪婪的眼睛逼视着中国未开辟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他们知道日本的例子，发展野蛮的军国主义，铁一般的纪律，以及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强烈掠夺欲望。但是，中国人既不效仿日本人去抵制外来势力，又不听命于外国势力而无所作为。他们的思考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是万年。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满洲地广人稀，大可殖民。日本人想要有殖民地作为其多余的人口的生存空间。但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比日本人多出百倍，不管满洲目前的政治情形怎样，满洲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人面临困境，满洲很

快就会回归中国。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于民族习惯的坚韧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虽有内战但只是表面现象——是以蔑视武力手段，等待他们的压迫者那丧心病狂的精力在互相残杀中耗尽。

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曾经遇到有些中国人，他们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亚于我们的教授，但并不因此失去平衡，也没有失去与自己人民的联系。对于西方的坏东西——兽性、不安、欺压弱者和纯物质的贪欲——他们都心如明镜，不愿接受。而对于那些优点，尤其是科学，则照单全收。

中国旧的本土文化已近死亡；中国的艺术和文学已有所不同。孔子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接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我们的文明正好投其所需。然而，中国人却又不照搬我们的全部，这也正是最大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如果中国不采用军国主义，将来所产生的新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的各种文明更好。

以上说的都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和别的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但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

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到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在我离开中国之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请我指出中国人主要的弱点，我推辞不过，说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他听了之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评判恰当，进而探讨补救的方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一例，正直是中国的最大优点。

中国人的冷漠必定会让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为惊异。他们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我们用百分之一的精力能使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缓解。例如，我们禁止奥地利与德国联合，禁止它的人民移居外国或者从外国得到工业原料。结果造成维也纳人饥馑而死，只有取悦我们的人，才从慈善机构得到食品得以维持生存。中国人既无置维也纳人于死地的力量，也不会有慈善的赈灾之举。我在中国的时候，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儿女卖与他人，如果卖不掉，杀掉也无所谓。赈济灾民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然而，必须说明，白人这样做也只是抚慰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如果中国保持现在的这种生育率和耕作方式，饥荒必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次饥荒中靠慈善事业幸免不死的人，下次恐又难免。

要永久地解决饥荒问题，必须改良农业，迁移人口，节制生育。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关心救助当下的受害者。中国人的冷漠或许就是出于问题太大，无从着手这个原因。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作

这种解释：如果有一条狗被汽车撞成重伤，过路人十有八九对狗的哀号会觉得可笑。可怜的情形不仅不能激发一般中国人的慈悲，相反却感到快感。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从他们的历史，从1911年革命前的刑罚来看，中国人并不缺乏残忍的成分，只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罢了。不能不提的是，所有列强都实行残酷的刑罚，只是用虚伪进行了掩盖。

怯懦似乎是我们对中国人第一个坏印象；但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的缺乏勇气。虽然督军与督军之间的战争中，双方都溃不成军，但先知道对方溃败的就算胜利。这也表明中国的士兵并不妄动。战争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雇佣兵如果不是为了重要的理由，并不卖力。但如果是为重大问题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战，那么中国人是以善战而著称的，若再有优秀的指挥官则更加英勇善战。然而，如果把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相比又称不上勇敢，只不过他们的被动的忍耐力极强。如果要隐瞒什么，哪怕酷刑甚至死亡也无所畏惧，更加好斗的民族可能对此不屑。虽然中国人缺乏主动的勇敢，但从他们轻易地就会自杀这一点来看似乎比我们更不怕死。

贪婪则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都会犯贪污罪。随便哪个苦力，如果能得到几便士，甘冒大险。与日本作战这么困难，就因为政界中很少有人能挡住贿赂的诱惑。这个缺点可能出于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经济状况改善了，道德水准必定会提高。但是，我不相信中国现在腐败的情形比18世纪的欧

洲更厉害。我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哪一位将军比马尔伯勒更贪，或是哪个官吏比杜伯瓦更贪的。所以，中国工业状况的改善，首先要使百姓像我们这样廉洁——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十分廉洁。

上面所谈的中国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对知识抱有主动和怀疑的态度，但感情上未免有些迟缓。但相反的一面，中国人易于激动而致群情激愤。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此为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义和团就是一例，对欧洲人的影响尤大。他们历史上此种暴动不胜枚举。正是性格中的这一因素，使他们变得让我们无法揣度，难以预测他们的将来。可以想见，将来有部分中国人成为狂热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仇日派、基督徒，或者一个终将称帝的领袖。我认为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国人尽管平日习惯于谨慎，但也是世界上最鲁莽的赌徒。有不少皇帝就是由于浪漫的爱情而失去皇位，尽管浪漫爱情比西方更遭鄙视。

总结中国人的性格，是不容易的。使欧洲人吃惊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还保存着非工业的古代文明。而这一切在日本、欧美大资本家的压迫下恐将最终消失。他们的艺术已声势渐微，后起者只不过是二流西洋画的仿制品。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大多无法欣赏本国的绘画之美，只是轻视地说它们不遵守透视规律。

旅行家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的自然魅力将无法保存，将来工业发展必然会使之毁损。但有些东西会保存下去，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

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西方人究竟是能让中国人保留这种美德，还是使中国出于自卫而采用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须拭目以待。

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很容易将中国误解为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一个文物博物馆。文物的保存固然很重要，但志向高远、渴求进步的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鉴赏文物的馆长。但是，对于欧洲旅游者爱不释手的东西，即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也不能免俗。在中国的欧洲人除了感兴趣的动机之外，还非常地保守，因为他喜欢每一样特别的、与欧洲大不相同的东西。但这种态度终究是局外人的态度，他把中国看作一个可欣赏的国家而不是可生活的国家，他更看重中国的过去，而不为中国的将来考虑。所以，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自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不愿意中国只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先古遗物的幸存地，就像牛津和黄石公园，而是希望中国能博采世界各国之所长。因此，他们竭力倡导高等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运用和借鉴西方知识而同时又不

崇媚西学，这是达到该目的的首要途径。这种举措很令人感兴趣，它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恐怕是我们这个令人失望的时代中最有希望的。

中国的旧式教育是让学童先死记硬背经书，及至稍长才作一些有意义的讲解。这就是中国18世纪时典型的教育模式。中国现在30岁以上的人即使受过最完整的新式教育，在幼年时也都是在旧式学堂里开蒙学读写。直到现在，这样的学校仍占有优势，初等教育大都也是由此来完成。孩子们每天要背诵几段经书，而且还要在班上大声复诵。他们的齐声朗读常常震耳欲聋。(我在北京时就住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隔壁，我的体会确实如此。)这种方法教会了很多人读书；人们发现在城里做苦力的有不少能断文识字的。但是，相比之下能写的人就少多了。全国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既能读又能写。

自从1905年颁布了废除科举、改良教育的敕令以来，用现代知识培训教师的师范学校得以设立，初等教育因此而得到并且将得到更多的改造和扩充。刁敏谦所著《中国觉醒了》一书中第4页，列有中国近年来学校、教师、学生增加情况的统计表：

	1910	1914	1917	1919
学校数量 …	42,444	59,796	128,048	134,000
教师人数 …	185,566	200,000	326,417	326,000
学生人数 …	1,625,534	3,849,554	4,269,197	4,500,000

这段时间正是中国革命和内乱的时期，教育能有这样大的进步实在是很惊人的。

由于国内局势纷扰，经费短缺，有不少普及全民初

等教育的计划，除少数地区有小范围的实施外，无法大力推广。但一旦巩固的政权建立，教育普及的计划就可以实行了。

旧时的经书教育当然不仅仅局限在初等教育的范围内，中国古典文学卷页浩瀚，而古代的文章又十分艰深难懂。即便是勤奋研读的饱学之士也大有研究的空间。中国对这种学问历来很重视。人们对这些学者的意见尤其是关于政治的看法往往会加以采纳，尽管他们一向不问天下大事。他们令人想起兰姆[1]在一篇关于假期中的牛津大学的散文中所描述的那些人——博学、可爱、诚实，但在现代世界里却浑然没有方向，他们会用11世纪时一个哲学家说过的话来支持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于他们所代表着的这种高等教育，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这与欧洲人对传统教育的争论是一样的，最后的定论也是相同的：有高深知识的专家是十分需要的，但为一般受教育的人设置的普通课程应当以现实的需要为重，尤其是科学、现代语言，以及当代的国际关系。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改良家们几乎都持这种观点。

中国另一种教育模式则是由传教士所首创的，现在几乎都把持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在中国教育界所占的地位是靠退还庚子赔款得到的，这一点众所周知。太多数列强，如果他们的说法可信的话，那时候他们都只要求赔偿实际损失，但是美国所要求的（并且得

---

① 译注：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著有《伊利亚随笔》等。

到的）数字还远大于实际损失（这是评论家的说法），他们把多余的款项很慷慨地退回，用于在中国办学和选派学生留美。美国人的这些举动，从政治上、商业上来说都有充足的理由。越来越多受过美国影响的中国人在国内担任要职，而他们都深信美国是世界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好的。

美国在中国所建的学校，可以我所参观的三所为代表：清华大学（距北京约十余英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办）和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位于西山之麓，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筑①，全部是用庚子赔款造起来的。其氛围同小型的美国大学相似。校长是中国人，但完全是一副美国腔。教员既有美国人也有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近来后者人数逐渐增多。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我在清华的时间不长，对它的教学无从评价。但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觉到完美。与美国的学校一样，清华非常重视英语。中文与欧洲语言有根本区别，中国学生如果只懂中文，即便读的是最好的译文也无法了解欧洲人的思想，所以学习某种西方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英文则是所有西文中在远东最为通晓最为有用的。

清华的学生学习数学、科学和哲学等。总的来说，他们学习的是大学里的基础课程。成绩出色的学生就被派

---

① 原注：应该说，与人们在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学校里看到的优秀建筑一样棒，如国立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堂。

到美国读博士学位。回国之后，有的当教师，有的做公务员。他们办事的能力、清白的人品和精湛的技艺，无疑大大有助于国家的进步。

协和医科大学的建筑相当宏伟，是中国建筑的美丽与欧洲建筑的实用两相结合的有趣尝试。绿色的屋顶是中国式的，而四周墙壁和门窗则是欧洲式的。这个尝试虽然称不上完全成功，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各种最新的科学仪器都很齐全，但与学校无关的人是不能借用的，这颇有点像美孚公司的独占性。协和医科大学除了医学外，还教授其他学科，比如英国文学，而且还教得相当不错。要造就一个达到欧洲同等学术造诣的中国医生，这些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精通一门欧洲语言对掌握医术以及其他种类的欧洲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自然，健全的医学知识对中国十分重要，这个国家卫生状况差，流行病时常发生。

北京大学可说是中国人受治外法权之害的一个例证。中国政府（至少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本来已经建成了一个设备齐全、师资水平高的大学，称作“北京大学”，但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决定把自己的学校也叫北京大学，所以先前成立的北京大学不得不改名为“国立大学”。这就像一群旧式中国人在伦敦搞了一个专门教授孔子教理的学校而迫使伦敦大学将校名让给他们一样。治外法权的弊端虽然很多，但一时恐怕不能废除，所以我不愿讨论这个问题。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已形成了一派。[①] 在北京就有个“归国留学生俱乐部”，那是个很有魅力的地方。欧洲人一向讲留学生的坏话，但却毫无充分理由。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特别是那些到日本的留学生并不为到欧美的学生平等对待。我有一种印象，美国比起其他国家来说给它的学生盖上了更明显的印记；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生被所在国同化的程度远不及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那些想变得现代和追赶时尚的人来说，摩天大楼和花花世界看起来是那样的浪漫，因为这一切与自己的故乡是如此地不同。比起中国的旧传统来说，保守的欧洲人所珍视的古老传统只不过是新长出来的蘑菇，无法吸引中国人。人们时常想起《伊厄瑟恩》中英国乡绅与土耳其巴夏的一段对话，巴夏称赞英格兰：“呜——呜，一切都乘轮船，呼——呼，一切都坐车，”而那个英国人则说：“告诉那个巴夏，英国的小地主，感谢上帝，还是英国的小地主。”

美国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从总体上说颇可嘉许，但外国人指导的教育不能完全适应中国人的需要。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很多地方胜于西方。不少欧洲人最终明白

---

① 原注：刁敏谦(同前引书，第 27 页)从《留美学生名人录》中摘引了 596 名中国留美学生所从事职业的分类情况。以下是从业人数比较多的工作：教育部门，38 人做管理工作，197 人做教师；政府部门，129 人做主管官员(此外还有 3 名议员和 4 名法官)；95 名工程师；35 名医生(包括牙医)；60 人从商；21 名社会和宗教工作者。据估计，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学位的总人数达 1700 人，在英国的达 400 人。两者数目相差甚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处理庚子赔款上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做法。1916 年，中国有 202 名学生在英国学习，刁先生也根据他们所学的科目作了分类统计(第 28 页)。学习人数比较多的科目有：医学：50 人；法律和经济：47 人；工程技术：42 人；矿业：22 人；自然科学(包括化学和地理学，这两门是单独分列的)：19 人。

了这一点而美国人却始终不知。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尽管他们自认为是），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是美国主义呢？我想，美国人会这样回答你："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在实践中，所谓的美国主义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因为这更易于隐蔽），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伏尔泰——这个顽固的愤世嫉俗者——说过，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通，但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充满活力"的习惯相适应。美国的影响必定会将这两者排除无遗。如果美国的影响通过卫生得以盛行，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将挽救许多中国人的生命，但同时又使许多人不值一救。所以，美国的教育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中国优秀的教育家现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创办了一些既新式又是中国人自己管理的中小学和大学。在这些学校中，部分教员是欧洲人或美国人，但教学的精神却与基督教青年会不同。人们无法不认为白人办学校，毫无私心在其中。他们通过有关国家的商人和制造商，有意或无意地为资本家渗入中国培养现成的工具，这似乎倒是常有的事。中国人所设的新式学校和大学则不然，不像别的国家，这些学校不是培养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判断他的想法是否正确要看他的才智而不是对入侵者是否有用。这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才智过人而又处世公允。我在主持一个有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参加的研讨班时，学生的讨论锐利而不过激，其直言不讳而又无所畏惧的程度，别处恐怕见不到。我对接触到的南京的"科学社"和其他类似

团体也是同样的印象。中国的莘莘学子渴求西方的学问，同时也深知西方的缺点。他们要变得科学一些，而不是机械一些；要学习工业的知识，而不是资本的知识。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许多优秀的中国教师也是如此。他们尊重西方的知识，但却把西方人的骄傲悄然搁在一边。就现在的情况而论，纯粹为中国人所设的新式学校，如国立北京大学，从教学等各方面来看，有待改进之处很多：图书馆的设备欠缺，英文教学还不完全，要动脑筋的课程不多。但这些都是新学校常有的不足之处，比起学生养成的对生活的人道主义观念来说并不重要。而且，这些不足之处大都是由于经费紧张所致，政府——由于其势弱而为列强所青睐——不得不把经费分一部分给彼此交战、掠夺国家的督军们，就像欧洲发生的战争那样——因为得把中国比作整个欧洲，而不是组成欧洲的小国家之一。

学生们不仅自己富于公共精神，而且还是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1919 年，学生们反对《凡尔赛条约》将山东割让给日本，刁敏谦在"学生运动"一章中有详尽的记述。而且他们的作为也不局限于政治。现摘录刁先生的一段文字(第 146 页)：

> 学生们唤醒国人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帮助商人们抵制日货，之后他们便把精力放在启发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兄弟姐妹身上。他们散发传单，举行通俗的演讲，让兄弟姐妹们看清楚国内外的真正形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己出钱办起

了免费学校。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任何溢美之辞都不及的，因为学生们通常也在这些学校里任教。各地以极大的热情认可这种做法，据估计，仅在北京一地就有5万儿童因此而受益。

还有一件事情使我大感惊异，那就是在中国人所管理的新式学校里男女受同等的待遇。女生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地位比在英国剑桥大学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而且大学里还有女教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培养女教师的地方，也是最优秀、最进步的一所学校，女生中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不禁愕然。

中国现在有一场男女同校的运动，而且在初等教育中尤为突出。主要原因是学校太少，如果女孩不与男孩同校，就无处求学了。我与杜威教授及其夫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南长沙由督军招待的宴会上。在饭后的发言中，杜威夫人对督军说，湖南必须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督军以颇似政治家的口吻答复道：此事要认真考虑，但湖南的情况还不成熟。然而，这件事明显没有超出实际政治的范围。那时候，我刚到中国，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国家，第一次听到男女同校的提议，颇感惊异，但后来才知道我们所空谈的改良，在中国却能得到实行。

由传教士和保守的白种人控制的教育界并不能满足“少年中国”的需要。中国人既然抛弃盛行了几千年的本国迷信，要让他们再吸取为所有进步人民所不屑的欧洲迷信，那实在是太可笑了。只有在由中国的进步人士

所主持的教育中，年轻学生的复兴精神才有活动的余地。中国人要用这样一种敢于怀疑和发问的自由精神建设一种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

我在北京时正巧碰到国立学校的教师们罢教，他们罢教不是要求更高的薪水，而是要求付给薪水，因为他们已经几个月没领到分文。一些学生也跟着教师们去向政府请愿，但是遭到军警的驱逐，许多师生被棍棒打得送进了医院。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怒，差一点酿成了一次革命，政府仓皇地与教师们讲和。这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们有中国的刚健、活力和公共精神支持着；而把持着政府的那帮匪徒则有日本人的金钱和欧洲人的阴谋作后盾。美国在其中进行调解。人们也许可以广义地说，由督军操纵着的深受英国和日本影响的旧式教育代表着保守主义；美国及其商业和教育机构代表着自由主义；而中国本土的现代教育，从实际上而不是从理论上来说，代表着社会主义。顺便说一句，它单独代表着学术自由。

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忍受外国人的压迫。他们不会为了获取军事力量而一并采纳我们的缺点，但是，为了发展智慧，他们愿意吸取我们的优点。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开化的原因。

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中国还远不是个工业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非常大。也许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将会有迅速的发展。中国的未来既取决于这种发展的方式，也取决于其他单独的因素；中国面临着的许多困难，很大一部分与目前的工业形势有关。因此，我将首先描述一下这种形势，然后再讨论将来的种种发展趋势。

铁路和矿产是一个国家工业的基础，所以首先谈一谈中国的铁路，然后是矿产，最后是其他工业部门。

铁路刚修建时，清政府就像剑桥、牛津抵制新生事物一样，竭力加以反对。1875 年，外国人建造了短程的淞沪铁路，北京政府惊恐异常，把它破坏了。1881 年才开始修筑了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直到中日战争（1894—1895 年）结束之前，铁路在中国并无多大进展。中国

战败后，世界列强纷纷争夺特权和势力范围。比利时修建了重要的京汉铁路；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独占权，但只修建到了长沙；俄国则修建了东清铁路，将北京和西伯利亚以及欧洲连接起来；德国建造了从青岛到济南府的胶济铁路；法国在南方也造了铁路；英国也想得到长江流域的铁路专利权。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归了外国人。但自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列强觉得要小心对待中国人。不可太过分，以防他们忍无可忍发起怒来。从那以后新建的铁路，所有权都归中国政府，但主要的管理仍归外国人，因而中国政府的所有权失去了大部分意义。此时中国人也认识到，铁路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才能由自己来管理却是一个真正问题。1908 年，清政府批准修建京浦、沪杭两条铁路，由外国贷款资助建造，但由中国政府管理。同时，中国还赎还京汉铁路，自己又建造了京张铁路。由此，中国铁路干线中除了满洲铁路（即东清铁路）和胶济铁路，差不多都由中国人管理。满洲铁路主要为外国势力所把持，现在看起来是永远收不回来了，这只有等中国打败日本才能恢复；而满洲现在也渐渐陷于日本人之手。胶济铁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条约，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原因，5 年之后即可由中国赎回。如果这样的话，中国除了失地以外的铁路管理权在不久的将来都可收归己有。这是目前的形势中最有希望的事，也是对中国人精明强干的特殊赞誉。

辛博森竭力提倡中国的铁路应归其国有，我对此深表赞同。他在华盛顿会议上帮助争取山东铁路，并且促成大家对铁路这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他在 1919 年初写道：

中国的恰当治理和新共和国的建立，铁路的修建是关键之所在……1911 年爆发了革命，中国人接受了民治政府这一西方观念，它排除了外国蚕食满清帝国的危险。然而，他们还留有一个精巧的利器。这利器就是铁路。俄国用她的满洲铁路教给了日本这个新方法。根据 1905 年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不仅继承了满洲铁路较富的一半，而且还倚仗着经济侵略、警察控制和驻扎部队实行这个新方法。由于这种新方法的实施，日后的满洲修筑了高度发展的铁路沿线地带，其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外国属地以颠覆中国。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日本正把这新方法移用于山东……若不迅速加以遏制，日本的势力将蔓延到中国腹地……到直隶以外和内蒙古（这样就包围了北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阻止这一势头。做法很容易：世界各国承认中国领土上的所有铁路都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必须由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局直接管理；站长、乘务员和警察皆须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人的技术帮助限于一定范围之内；从现在起，外国人在铁路上仅有筑路的特权，每段竣工之后即须交还铁路总局。

如果就山东铁路达到的协议能够得到忠实的执行，这种变通——我与普特南·威尔都承认其重要性——

将能于5年后实现。但是，我们可以预见，日本将用尽一切可能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从煽动中国内乱到派遣日本秘密特务伪装成中国人暗杀日籍雇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因此，一直要等到中国人实际掌握了山东铁路，我们才能感到放心。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不会经营铁路。京张铁路就是中国建造的，技术水平比外国人毫不逊色。其他由中国人所管理的铁路也管理得相当好。下面关于1919年铁路的数据引自刁敏谦：国有铁路已开通的为6027公里，在建的为383公里，私有和省有铁路为773公里，外国承建的铁路为3780公里，共计10963公里（约合6852英里），所谓外国承办的铁路主要是指在满洲和山东的铁路，可以肯定，中国丢失了前者，而后者还有可能收回。因此，外国人承建铁路的问题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尽管把满洲分离出去也足见外国铁路作恶的力量。关于主要国有铁路的财政统计，刁先生在1918年列了一个表：

铁路线	开通公里	完成年份	投资收回率
北京—沈阳	987	1897	22.7
北京—汉口	1306	1905	15.8
上海—南京	327	1908	6.2
天津—蒲口	1107	1912	6.2
北京—绥远	490	1915	5.6

随后几年（我没有关于这几年的确切数据）的铁路建设并不十分红火。

我找不出任何表明中国人不胜任管理铁路的证据。

相反，由于各国所造的铁路规格不一，无法互通，中国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加以修正。中国迫切需要建造更多的铁路，尤其以开辟西部和联通粤汉铁路为当务之急，这些铁路的前景无可限量。

矿业与铁路同等重要。如果一国的矿产业由外人来管理，那么它的工业建设、兵器制造就不得不仰人鼻息，中国矿产业现在的情形远不能令人满意。

驻北京的美国商务参赞安立德① 在1919年早些时候写了篇文章，评价中国的矿产：

> 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煤和铁中国都非常富有。但中国的煤矿资源利用甚微，1917年还进口1400万吨煤。中国估计现在每年产煤2000万吨，但煤的蕴藏量比美国还高，美国1918年的煤产量为65000万吨。至于铁矿，中国估计有4亿吨铁可供提炼，另外还有3亿吨可用土法加工。1917年，中国的生铁产量估计达50万吨。中国的钢铁工业正大踏步向前发展，此后几年生铁与成钢的年产量可望达几百万吨……中国的锑和锡也特别丰富，最近几年间这些矿的开采和熔铸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应该为国家的幸福保护

① 译注：安立德(Julean Herbert Arnold，1875—1946)，美国领事官。1902年来华，历任驻上海副领事、驻汉口总领事等职。1914—1917年为驻日、华两国的商务参赞。1920—1941年专任驻华商务参赞。曾代表美国出席1918、1922、1926—1927年三次中国关税会议。编著有《中国商务指南》(1919)、《中国工商手册》(1926)、《欧美人对远东问题的解释》(1926)、《中美关系之蠡测》(1932)等。

好自己的矿产财富。

据1919年《中国年鉴》，1914年煤的总产量为6,315,735吨，铁的总产量为468,938吨。与上述安立德所说的1917年煤2000万吨，生铁50万吨相比，3年之内进步很大。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近年还保持着同样的增长速度。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煤和铁的发展迅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煤、铁的发展是否由本国所主持。日本缺乏矿产，它迫切地从中国寻求矿产，这对日本很重要。原因有二：第一，日本的新增人口不愿意移居亚洲大陆的属地，所以只能在本国发展工业；第二，钢铁是推行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东西。

中国人颇为江南造船厂和上海的工程技术而深感自豪。这个由政府设立的造船厂能够建造新式的船只。最近为美国政府造了4艘万吨轮。S. G. 陈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

> 所用材料除了钢材由美、欧供货，其余大部分都出自中国（中国的钢产量很低，而且根据以前签订的合同，中国必须供应日本一定数量的钢材，因此留在本国的钢材相当少）。

要了解中国的铁矿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此事需要解释一下。对于那些对现代政治有兴趣的人来说，这番解释颇有价值。

1919年的《中国年鉴》列举了中国的五大铁矿，并附有介绍。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铁矿是大冶铁矿，由汉

冶萍公司开采，读者应该还记得汉冶萍公司是日本“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该矿的总量年鉴估计为5000万吨，主要采自两个矿点，一个含铁量为65%，另一个为58%至63%。1916年共出产603,732吨(以后产量大幅度提高)。年鉴写道：“日本人投资于汉冶萍公司，根据1915年中日两国签订的条约(是在强迫中国接受修改过的“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政府承诺：不把该公司划归国有，并且不得向日本以外的国家贷款。”必须补充的是，汉冶萍公司有一个日本会计师和一个日本技术顾问，生铁和矿质在一定价值以上的必须卖给日本帝国钢铁厂，且所订的价格又远远低于市价，只有剩下的那些劣质产品才能在中国市场上见到。

《中国年鉴》列出的第二个铁矿是铜官山铁矿。年鉴中对此矿的介绍如下：“铜官山铁矿位于长江边的安徽省铜陵县，离芜湖55英里。1904年，英中公司获得开采权。1910年此矿作价52,000镑转让给一家即将组成的中国公司开采。”因此这些矿现在在中国人手中。该矿的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但从这个卖价来看，规模不会很大。汉冶萍公司的总资本是2000万元，远远大于52,000镑。这是《中国年鉴》出版时，五大矿中唯一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的铁矿。

下一个是安徽省的桃冲铁矿。“这个出让给了日本中日实业发展公司的铁矿不久将由东方钢铁制造公司进行开采。该矿的蕴藏量据说有6000万吨，含铁量65%。计划每年产生铁17万吨，钢铁厂年产钢条10万吨，锻铁厂年产75000吨。”

第四个矿是山东的金岭镇铁矿，“通过铁路与衡山

煤矿场连接在一起。"我估计该矿将与铁路一起售还中国。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是本溪铁矿，它"是南满九个矿区中矿产藏量最高的矿之一，中日政府交换公文(1915 年 5 月 25 日)，准许日本人在这一带矿区勘探及开采。其层脉从辽阳一直延伸到本溪，其规模与大冶铁矿不相上下。"我们所应该注意的是此矿落入日本人之手也是日本人下最后通牒强迫实行"二十一条"的结果。年鉴又写道："日本海军购买本溪铁若干；1915 年，大阪铁厂定购本溪铁 15000 吨；同年，大阪军械厂接受本溪铁的投标。"

从上述情况来看，在铁矿方面，中国已经让日本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想要把它排挤掉非常困难。然而，中国必须要大规模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否则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其他对世界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要中国的铁，目的在于侵略和压制中国。我知道孔子从来没有谈到过铁矿[①]，所以旧派的中国人不知道保存它们的必要性。现在虽已醒悟，但为时已晚。至于补救的方法我将在后面谈到，现在先看一看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

有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将永远是农民。中国主要生产茶叶、丝绸、棉花、谷物和大豆。从棉花的产量来说，中国占世界第三位，居首位的是印度，再后面是

---

① 原注：有人坚持认为《福音》中没谈到过这个问题，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曾有一位著名的英国牧师在书中指出，建议不要贮藏飞蛾和铁锈去腐烂那儿的财宝，因为"飞蛾和铁锈到不了洛克菲勒的油井边，小偷折断并偷走了一根铁轨。耶稣最鄙视的就是聚敛钱财。"

美国。当然，中国的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但中国如果要保持国家的独立，工业就相当重要，而工业现在正是我们的话题。

刁敏谦在书中写道："据官方估计，1916 年底，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共有 56 万，矿工有 406,000 名；此后便没有发表过正式的报告了……估计现在共有一百万左右。"工人的工时长而工资极低。有几家刁先生认为特别先进而值得赞赏的纺织厂，工人的日工资仅 1 角 5 分到 4 角 5 分。工业发达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也会随之发展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刁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统治阶级的代表来看，那么，政府对工人的政策是颇不开明的。刁先生具有美国资本家的眼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深受美国人和保守的英国人的影响(他是伦敦大学法学博士)。但我所接触到的"少年中国"大都信奉社会主义，而且中国的传统并不认同强权和残暴，由此我们可以希望中国政府对工人或许不会像美国或日本那样野蛮。

中国具有发展纺织业的潜能，现有若干新式工厂，已经具备形成像英国兰开郡那样的纺织区的条件。所欠缺的，只是企业太少。

造船业在上海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如果能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造船业必然会有极大发展。

1919 年出口货物总数不足两亿英镑，约合 6.3 亿银两，进口的总数稍多一些。这种统计，以银两的计算较为准确，因为如果以英镑计算，汇价涨落不定，很难确定。而银两则不是货币，是银的一种重量单位，其价值随着银价的高低而变动。《中国年鉴》中进出口货物的统计

如下：1902 年中国的进出口分别为白银 3.25 亿两和 21.4 亿两；1911 年分别为 48.2 亿两和 37.7 亿两；1917 年分别为 57.7 亿两和 46.2 亿两；1920 年分别为 76.2 亿两和 54.1 亿两。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人均的外贸量仍很小，但发展的势头很快，就好像革命、内乱同经济的发展毫无影响一样，西方人看了无不大为惊讶。

从中国路矿情况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中国政府想要保持独立所必须采用的。铁路国有化显然是符合愿望的，虽然这样一来新路线的建设难免要受到影响。如果铁路不在政府的手中，即使最初不是由外国人管理，但最终还是会由外国人所控制。这样，外国人就可以钳制中国的自由。我认为，我们可以希望中国的执政者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此采取行动。

至于矿产业，中国人应该加紧发展，因为由外国人来发展只会使中国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所以，中国应该制定这样一条法律：以后凡将矿产或矿产的利益出售给外国人或以矿产作为抵押都是非法的。但这一条法律恐怕会由于治外法权的缘故不被外国人所承认。租界领事法庭恐怕也不会轻易予以认可。但从日本治外法权的先例来看，这种事情能否实行，靠的完全是国力。如果列强对中国有顾忌，那就会承认中国的法律，否则他们不会认真待之。如果现在出于快速发展矿业之需而把全中国的矿产都收为国有，这恐怕也不是个明智之举。应该对真正由中国人经营的矿产给予各种奖励，比如让地质学家和矿产专家对他们加以指导，但政府要保留两项权利：第一，政府可以用公平的价格购买任何矿产公司；第

二，任何矿山如私人矿主不能开采，政府有权直接进行开采。国家应该广泛行使这些权利，及至将来矿产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使国家不再担心能否保持独立，那时候就可以把全国的矿产都收为国有，有外交纠纷的大冶铁矿除外。大冶也必须尽早收回，只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收回，现在还无法预料。我一直假设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有序的政府，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任何旨在抵御侵略的政策都只能是空谈。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与发展中国工业有关的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再次阐述。

曾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士称，中国人不善于经营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大型股份公司。虽然中国政治腐败，但在经营上素以诚实著称。但那些成功的经营往往由一个家族来组织，很少有超过这个范围的。而这种经营方式因为任人唯亲而迟早要归于失败。这是欧洲人的评价，我对此没有经验，无从判断，但相信这种情形同孔教及家族伦理有关，新思想、新教育可以很快地使之改变。许多中国人在美国接受经营培训；吴淞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商业大学，“少年中国”的爱国思想使许多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士以发展中国的工业为己任。从中国人的脾气和传统来看，更适宜于从事商业而不是工业，但与西方接触之后引入了不少新的习惯、新的思想可以弥补本身的缺陷。因此，如果中国的政治状况不是太糟糕的话，那么，将来几十年间工业当有长足的进步。只不过工业的发展一定要由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来主持，这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恢复中国的独立——的一部分，对此我将在最后一章里加以讨论。

第十五章

中国的前途

在这一章里，我把自己设想成为一个进步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地位，我将提倡什么样的改革并用什么样的程序来实行它呢？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是：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是既有其幸又有其不幸："一次大战"是中国的不幸，因为日本可以乘机在东亚为所欲为；沙皇俄国的垮台是中国之幸，因为日俄的秘密联盟为之告终；英日联盟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英国人为了履行条约上的义务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利益而去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日美不和是中国之幸——但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议，山东问题虽暂时取得了胜利——但这从长远看来又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会使得美国今后不愿再像从前那样反对日本。我在第十章里就已经阐明，如果中国不自强，那么无论日本是崩

溃还是在远东称霸，对中国都极为不利，而这两种情况都极有可能出现。况且，世界列强的利益与中国的幸福和中国文化的昌盛是无法相容的。因此，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

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我在本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出一头，但是，中国人为了保持国家独立而降到与我们相同的程度，这无论为他们自己考虑还是为我们考虑都不是好办法。然而，在这件事上，采取一个折衷方案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他们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我们的“恶”，那么，不仅会为我们所轻视，而且会更增加外国的蹂躏。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只是采用的程度——必须以能维持国家安全为限。

中国首先应当注重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像义和团那样盲目地排外，而是秉着开明的态度，向他国学习但又不受其支配。日本的侵略残酷地教会了知识分子和商人这种思想倾向。爱国主义的危害性，在于当它达到了足以抵御外侮的程度之后，会转而导致侵略外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值得担心的是，中国在变得富强以保持自身独立的过程中，或许会因其强大而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应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以保家卫国，而不是入侵异族。有了这个附加条件，我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复兴所必不可少的。寻求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的传统美德和西方的技艺结合的一条途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政治上的独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应该说，中国要想政治独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1)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国人支配下发展工业；(3)普及教育。这三点都必须同时着手，但上述排列次序则表明实现这些目标的缓急。我们都已经清楚，工业建设同国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无政府状态没有起色，那么，工业建设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教育经费也就没有着落。因此，建立有序的政府是实行其他改良的先决条件。至于工业和教育紧密相联，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但我认为工业更显重要，因为如果中国人不抓紧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外国人就会站稳脚跟，到那时候再要把他们赶走就很困难了。所以，我决定按上述次序来讨论这三个问题。

一、建立一个有序的政府。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混乱状况没有什么改变。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战争爆发在即。前者一向被认为代表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尽管《泰晤士报》把吴佩孚称为"开明的领导者"，但事实很有可能证明他不能使人满意。如果他赢了，他固然有可能履行诺言召集国会，但他同样有可能不这样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军阀的惠爱就像外国的慈善一样不能依靠。中国的进步人士要获得胜利就必须自己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我发现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目前正在磋商一个联合计划，包括召集国会和结束军阀争霸的局面。一个统一的局面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需要为之牺牲一些信念。假如所有的宪政主义者都能团结在某项计划之上，那么，他们就能左右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在中国是很有影响的。或许他们迟早能拥戴一位强有力的将军作为合法的

元首，并限制其纯粹以武力治国。或许他们能够由此使形势有利于他们推选出来的人士，1920 年 7 月的情况也是如此。学生们的动乱使得形势有利于吴佩孚反对安福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人民和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一旦实现和平，就要保证被遣散的士兵的工作和未遣散的士兵的军饷。由这个政治问题又牵扯出一个极其困难的财政问题，因为不把中国仅存的一点独立拱手于外国，是不可能筹得外国的借款的。（美国新银团声称：中国向他们借钱，他们是不会来管理中国内政的。我不相信，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详见第十章。他们或许无意管理中国，但实际上势所难免。）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只有想办法激发商人们的爱国心，在国内募集款项。中国国内的钱其实很多，只是有钱人不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土匪当政的政府。

将来如果起草永久性宪法，中国自然会采用联邦制度，我对此深信不疑。各省将赋予很大的自治权力，海关、军队、外交、铁路则归中央掌握。省界的观念在中国是很强的，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 1912 年时没充分考虑到这种观念实在是个错误。

在宪法拟定甚至通过之后，尚不能靠宪政主义固有的威望，还需要对舆论加以引导。另外，由真正进步的人士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委员会，他们集体作出决定，然后让所有成员执行，该委员会要力求杜绝腐败和在政治上营私舞弊的陋习，只有这样才能为舆论所信任，任何一个委员对此稍有违背就要被开除出会。要成为国家利益的保护者，就必须反对所有谋私利者、投机分子和媚外者。只有这样才能有权威去表扬或弹劾政客，起到监

督执政者的作用，才能对公共舆论甚至军中人士施加影响，"少年中国"的活力、爱国心、廉洁完全能组成这样一个委员会。但是，如果爱国之心不组织进这样一个委员会里，那么，以其势单力薄将无法解决今日中国复杂的政治问题。

外国对中国主权的种种侵犯，迟早必须消除。中国要收回租借地，自己掌握关税等其他权利，免受治外法权之苦。但是，中国人能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而又不得罪外国人（日本或许是个例外）。如果在恢复之初就得罪外国人，那形势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不是好办法。俄国的处境要强于中国，尽管俄国因为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触怒了世界，吃了大亏。倘若中国建立起有序的政府，开发自身的资源，那么，用外交手段就能收回大部分的权利，其余的部分要等以后有适当的机会再说。

二、发展工业。关于这一点我在十四章已经详细阐述过了。这里再从总体上加以讨论。我已经说过，铁路应归国有；政府应该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经营状况良好的矿山。为兴办工业而签约借债，必须注意工业的管理权应为中国人所有。中国如能建成巩固而有序的政府，外国资本家即便没有管理权，只要有适当的抵押，也会愿意借款给中国的。对于新银团所想要拥有的独占权，应该采取各种外交手段加以阻止。

假如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中国的工业应尽可能多搞些国有工业。在经济落后而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许多好处：（一）国家借款比私人容易；（二）国家比私人更易于聘请外国

技师;(三)国家可使重要产业不为外国人管理和控制。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国家从一开始就经营工业,可以免除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西方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以致资本家权势过大,各国人民备受其压制和误导。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但是,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目前所欠缺的活跃和进取的精神也应当增加。我相信"少年中国"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将无愧于此项重任。我们必须知道,上述的新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这些新观念,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都必将失败。

为了发展工业,中国人应当大力培植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前者尚可,而后者较欠缺。为此可以引进一些外国的熟练工人(例如德国工人)。让他们指导中国想发展的新兴工业而需的工人。

三、教育。中国要真正实行民主,就必须普及教育。如果大多数国民不能看书阅报,就无法真正地实行民主。虽说教育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是培养政治意识所必须的,而中国农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中国人对此也不是不了解,但由于经济拮据,无法普及初等教育。这样的结果是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而实际仍为寡头政治,因为没有文化的大众无法拥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政治见解。然而,即便有了良好的政府,如果工业不发展,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这样庞大的教育经费仍是一个问题。今日中国发达的工业几乎都为外国人所操纵,所

获利润成为日本人战舰和英美百万富翁的高楼和美食。如果想要将这些利润用于中国的教育，中国人就一定要自己管理的工业。这也是发展工业比发展教育更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教师的数量太少，无法在每个乡村都建立学校。但还是有很多人热心于教育，希望以有限的资金和尽快的速度造就尽可能多的教师。而中国的教育家也表现出强烈的公共思想和奉献精神，欠薪数月仍然坚持教学就是一个明证。

我认为，中国应该自己管理教育，这就同由中国人管理自己的工业一样重要。就目前而言，有几门课程仍须由外国人来教，将来就不需要了。只要外国教师不太多则不足为害，就像路矿上也需聘用一定数量的外国工程师一样。只有外国人插手管理才足以造成危害。在教会学校和其他外国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多半会丧失其本国的特性而倾向于西方文化。这使得他们不适于参与国事，并使其道德水准下降。此外，他们对于纯粹的中国事物比那些在新学校里受教育的少男少女要保守。总的来说，欧洲人对于中国比现代的中国人更为保守，所以无形中把这种倾向也传达给了他们的学生。外国学校的影响减弱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

对于那些想在专业上有更高建树的学生，他们需要到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深造几年。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留在国内接受教育是上策。因为那些留学归来的学生多少带有留学国家的腔调，尤其是美国。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委员会应吸收所有真正进步的人士，但这个委员会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从各国例如从日本、美国

和德国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意见不合，等到本国的大学教育增加之后，这种困难就自行克服了，当然在今天这仍是一个较严重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困难，留学生团体首先必须出现有影响力的领袖，其次必须对某一文化有明确的设想和追求。领袖既需智力超群又需具有实干精神。从见识上来说，中国的文人历来有较大的影响力，有为的改革家若能激扬文字就可以得到多数"少年中国"的拥戴。中国现在确有如此才能的人，举一个我认识的人作例子：胡适博士。他学问精深，长于文学艺术，性格活跃，积极致力于改革。他所写的白话文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中国人。他主张吸取西学之所长又不沦为西方文化的奴隶。

至于我所设想的留学生社团所需要的实干的政治领袖所应当具有的才能，又与知识上的领袖所不同，或许这两种才能不可能为一个人所兼而有之，因而需要像列宁和马克思这两种才能大不相同的人士。

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还应该同世界有重大关系。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新青年所应该定立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所谓实际问题有两个：一个由国内情形所引起，另一个由国际情形所引起。前者包括教育、民主，减少贫穷和饥饿，个人与公共的卫生等等；后者包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修正条约、收回港口（在这方面可把日本作个例子）、建设强大的足以抵御日本的军队等等。要解决这两

个问题，必须要采用西方科学，但没有采纳西方的人生观的必要。

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而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来唤起中国新青年，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附　　言

正当上述文字在出版社等待出版之时，中国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人。张作霖溃不成军，撤回了东北，并宣布满洲独立。这也许正中日本人下怀，但未必能得到其他各国的首肯。因此，张作霖也将会失去东北，这并不是不可能。并且，他将不再是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一个因素了。

目前，吴佩孚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他的意图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在中国的英国人，多年来一直与吴佩孚关系甚好，无怪乎我们报纸上登载的专电都染上了这种色彩。据《泰晤士报》报道，他已经宣布重新召集被解散的国会，目的是恢复中国的宪法政府。这个措施南方会同意的，而且如果他坚持自己这个主张，只要动用手中的权力就可以结束中国的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5 月 30 日发回一份专电，报道说“吴佩孚宣布，如果以前

被解散的国会重新召集起来并为国民的利益服务，他将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并向任何反对者开战。”

5月18日，这位记者又发回报道，称“吴佩孚正鼎力支持统一运动，并且在采取行动的问题上与陈炯明达成了一致。”陈炯明是孙逸仙在广州的同事，目前正在与孙逸仙打内战。陈炯明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一心想为他的政府征服全中国，据说是拥护宪法的。这份报道接着披露了吴佩孚与陈炯明双方达成一致的计划：

> 应该建立当地的自治政府，官员应由民众推选产生；从属于省理事会的区级理事会负责创建辖区内的警察；省主席应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督军负责；应该建立国家军队，军队的管理和军饷的发放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各省的治安和秩序，应该由各省的警察和宪兵负责，而不是由督军或军队负责；全国上下应该一致同意重新召集被解散的国会，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宪法；中央政府征收各种税收，再由中央政府发放规定的款项给各省开销；其结余应该上交给中央政府，一如清朝的做法；还应该植树造林、建立工业、修筑公路，并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让人们继续务农。

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计划，但不可能知道其中有多少可以实施。

与此同时，孙逸仙仍然在与吴佩孚交战。据英国报

纸称，孙与张结成了同盟，但看来他们之间只不过是有着对吴的共同仇恨罢了。孙的朋友坚持说他是个真正的宪政主义者，而吴不可信任，但陈炯明在改革者中的声誉要比孙好。在中国的英国人都对吴大加赞赏，而对孙仇恨在心；美国人则对孙大加赞赏，对吴公开谴责。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比如《泰晤士报》5 月 15 日刊登的一篇发自香港的专电，就起到了如下效果：

> 我得知中国南方总统孙逸仙的部队（据称正从广州向北挺进）是一群暴民。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所穿军装也只不过是些破布片。没有纪律，而赌博和抽鸦片却非常盛行。

然而，5 月 30 日的《泰晤士报》却不得不承认这支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攻下了“江西最重要的堡垒”，还缴获了 40 门野战炮和大量的军火。

形势要等到更多详细的消息寄到才会弄清楚。人们希望广州政府通过这次对陈炯明的胜利，与吴佩孚达成协议，并且有实力强迫他遵守这些协议。人们同时希望张宣称的东三省独立不会被日本当成借口，进而完全吞噬这个国家。如果吴佩孚坚持上述摘引的宣言，广州政府便不会有任何爱国的理由去解释为何不应与他合作；另一方面，广州方面的军事实力也使得吴必须谨慎行事，坚持自己的宣言。现在的机会，对中国的统一和结束

督军的暴虐，要比打败陈炯明之前好得多了。但这只不过是个机会而已，中国的未来仍然是个问题。

1922年6月21日

译后记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数理逻辑、逻辑实证主义、自由教育思想,以及他的和平主义思想,都曾吸引过无数中国学人倾注的目光。而在现实人生中,他积极入世,投身和平主义,几度引来极大赞誉,可以说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罗素曾于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应邀在中国讲学,其时罗素的不少著作已通过翻译、介绍而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所熟悉。他的著名的“五大演讲”:《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虽不为人全部理解,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素结束在华讲学回英国之后,根据他的“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先是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后于1922年出版了这本《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

见解。直到晚年，罗素仍然十分重视此书，特地为1966年本书重印写了一篇《前言》，坚待书中的基本观点，并在其自传中提及此事。

《中国问题》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然而，罗素却是立足于中国的立场谈中国的现实政治：关注中国军阀纷争的政治格局，剖析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指出中国经济、铁路交通、工业（尤其是矿业）的发展前景，呼吁中国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他所说的"少年中国"(Young China)，是指"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他们在国外或中国国内的现代学校里接受过或正接受着现代教育。与此同时，罗素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有其独到的见解。

在罗素的全部著作中，《中国问题》并不十分抢眼，但它系统地反映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知识关怀、社会关怀，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对在他之后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罗素因此而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问题》不仅体现了罗素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尤其是中国之行）对罗素的影响。可以说，罗素给中国作了"五大演讲"，中国也给罗素上了深刻的一课。罗素与中国的这次思想碰撞，其结果十分"让人为难"：对"五四"时代的中国来说，罗素是超前的，因此罗素在中国只可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却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知音。鉴于此，双方不免有点互相失望，这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罗素在1965年11月为本书写的《前言》中所

说的那样，书中谈及中西文化及中国人性格的部分，“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而罗素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虽然当时的时事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历史——至今仍不失为一份经典的“科学预言”。因此，解读罗素的《中国问题》，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来说，将不仅有助于了解“五四”，还将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现实。

可惜的是，本书的中译本只有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所出赵文锐译的《中国之问题》。该译本虽然出版及时，且经梁启超先生署检，但这本“罗素近著”（梁启超题）过于贴近当时的时代，原书中不少涉及时事的内容没有译出，其余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删。对于当今读者来说，其语言习惯于今相去甚远。故此，有必要重新翻译《中国问题》，介绍给当今的中国。

本书根据1922年版本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直在寻找1966年的版本，直到翻译工作完成，方才见到。幸好两者相比，只多了一篇《前言》，因此译出后依原样放在书前。这样，这个译本除了原作的《索引》部分之外，全部悉数译出，可称为第一个全译本。限于时间和学识，译文中不尽人意之处，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6年11月6日

说的那样，书中谈及中西文化及中国人性格的部分，“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而罗素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虽然当时的时事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历史——至今仍不失为一份经典的“科学预言”。因此，解读罗素的《中国问题》，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来说，将不仅有助于了解“五四”，还将有助于深刻地理解现实。

可惜的是，本书的中译本只有 1924 年上海中华书局所出赵文锐译的《中国之问题》。该译本虽然出版及时，且经梁启超先生署检，但这本“罗素近著”(梁启超题)过于贴近当时的时代，原书中不少涉及时事的内容没有译出，其余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删。对于当今读者来说，其语言习惯于今相去甚远。故此，有必要重新翻译《中国问题》，介绍给当今的中国。

本书根据 1922 年版本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直在寻找 1966 年的版本，直到翻译工作完成，方才见到。幸好两者相比，只多了一篇《前言》，因此译出后依原样放在书前。这样，这个译本除了原作的《索引》部分之外，全部悉数译出，可称为第一个全译本。限于时间和学识，译文中不尽人意之处，谨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6 年 11 月 6 日